

目 錄

“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回忆片断

-德穆楚克栋鲁普 (1)
- 德穆楚克栋鲁普与傅作义争夺鴉片过境稅.....任秉鈞 (21)
- 云继先部百灵庙武装暴动經過.....任秉鈞 (24)
- 綏境蒙政会始末記.....經革陈 (29)
- 德穆楚克栋鲁普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結
.....哈斯瓦齐尔 (39)
- 回忆在伪蒙疆政府时期.....奇天祥 (55)
- 奇子祥刺杀奇文英的前前后后.....刘映元 (82)
- 我刺杀奇文英的前因后果.....奇天祥 (90)
- 关于刺杀奇文英案两文的补充.....奇尙斌 (118)
- 奇文英的一生.....白凤岐 (125)
- 国民党反动派在河套地区的最后掙扎
——我任伪安北县长期間的片断回忆.....王元魁 (147)

- 記傳部印刷厂伪造人民币事……………潘佳緒(168)
- 記蔣雁行任“綏远都統”期間的几件事……………关鍾麟(173)
- 我所知道的“长头发教”……………溫立中(192)
- 汪容昌和他創办的蒙文书社……………白彥巴图(203)

“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回忆片断

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四省，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淪陷，从而日寇又向西部各盟旗伸其侵略的魔掌，于是与热河接壤的錫、察两盟便首当其冲，以致人心动荡，惶恐不安。适在这年冬，蒙古各盟部旗联合駐京办事处处长兼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吳鶴齡，将他一手制定的“蒙古各盟部旗組織法”呈請国民党中央政府明令公布，我当时是苏尼特右旗扎薩克亲王兼錫林郭勒盟副盟长，錫林郭勒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丹(索王)因病請假，由我代理盟长职务。我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托滂江电报局长徐茂候代拟电报稿，盖上盟长大印，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拍发，反对吳鶴齡的这个“組織法”。同时我派錫林郭勒盟駐张家口办事处处长补英达賴赴北平面見陆海空軍副司令张学良，洽請撥給枪枝弹药等物，并联络包悅卿、賀喜业勒图默尔根

（号顯伯，即小卓王）、达密林扎布（太仆寺旗前任总管）等，以蒙古旅平同乡会的名义也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一面反对吴鶴齡的“組織法”，一面吹捧我“素孚众望，洽順輿情”，应出任蒙旗宣撫使。包悅卿、达密林扎布二人并到南京活动，宣传我握有五千騎兵，是蒙古具有实力的人物。大吹大擂了一番。

这两次电报的拍发，和包悅卿的吹捧，引起蔣介石的注意。一九三二年秋，蔣派他的亲信桂永清（当时任軍官訓練班主任）和軍政部到察盟以枪換馬的余玉琼、彭秉离等前来我旗（苏尼特右旗）訪問，这时包悅卿也由南京北返，陪伴桂永清一同前来。桂永清对我是恭維备至。包悅卿曾将蒙古旅平同乡会电請派我出任宣撫使事和桂永清談了，桂对包悅卿說：“我看德王是个年青有为的王爷，宣撫使是老年人干的事，他干这个干嘛，依我之見，应当組織軍队，扩充实力，在蒙旗先組織一个騎兵师或旅，当一个中将师长或旅长，不比干宣撫使好嗎？”包悅卿当将此話轉告我，我当下表示首肯。桂就給蔣介石打电报，并将电报原稿交由包悅卿轉与我看，全文記不清了，仅記得有“将来收拾蒙事者必属此君（指我）”一語。桂对我这样重視和吹捧，使我感到无上的欣慰。嗣他又表示想去看索王，我就派我的专用汽車把他送到烏珠穆沁右旗。他回来向我說：“我看索王凝神注目看人的神气，靜听別人談話的态度，是一个具有成見，十分固执的人，可能对你作些新的事情有障碍，希望你注意及之。”

当他临行时，又对我說：“靜候佳音吧，蔣委員長可能召見你。”

果然他走后不久，蔣介石就电召我前往武汉相見。我接到电报后，认为机不可失，就偕同补英达賴、韓凤林、丁我愚等前往武汉。路經北平时，曾去面見張学良，張即指示鐵路局为我等一行特备专車一輛，并派蒙旗处处长袁庆恩率同宪兵四人护送。到武汉后，行营招待我們住在璇宮飯店，次日即前往行营見蔣。关于桂永清所說組織蒙古騎兵之事，未作詳談，囑我和秘书长楊永泰、參謀长曹浩森接洽。我見蔣后，就令韓凤林拟具蒙古騎兵师編制計劃和所需要的武器，送交行营办公厅。嗣又由楊永泰和曹浩森接見我，說給我“蒙古保安統監”的职务，我当下想到，索王是錫林郭勒盟保安长官，我如担任保安統監的职务，地位就在索王之上，可能引起索王的不滿，不如担任蒙古騎兵师长又实惠又相当。当向楊、曹表示不愿接受說：“我此次来見委員長，不是专为要官而来。”話虽漂亮，言甚刺耳，楊永泰聞听之后，馬上表現不甚愉快的神气，沒有再作什么回答，我就辞出归寓。

嗣聞招待我的韓副官說：“蔣委員長要去长沙視察工作。”我为了表示拉近乎，亲到长江岸上送行，不意到岸送行者，仅有武汉警察局长陈希曾。接着楊永泰、曹浩森等宴請我，还邀請我坐飞机环繞武汉上空，又招待我參觀汉阳兵工厂、长江上的軍艦、黃鶴楼等名胜古迹和武汉大学各处。

当时武汉小报上曾登有“带着油松大瓣子的德王，在武汉大出风头”的消息，被行营给以停刊多日的处分，表示对我的“尊重”。参观各处后，行营秘书邓文仪前来璇宫饭店见我，说：“关于编制蒙古骑兵师事，委员长指示以后再行考虑，至请发武器一节，答应拨给机关枪四挺，步枪数百枝，可在此具领，另拨迫击炮两门，须到南京军政部洽领。”我遂派丁我愚前往行营军械部门领到机关枪四挺，所发步枪数百枝，因系破旧之物未即具领，请再补发新的枪枝。

在武汉告一段落后，留下丁我愚洽办未完之事，我就偕同朴英达赖、韩凤林等返北平，依据蒙藏委员会关于“重选盟旗代表，改组办事处”的命令，进行组选代表，反对吴鹤龄之事。这时除锡林郭勒盟已确定郭尔卓尔扎布、朴英达赖为代表外，乌兰察布盟也确定拉希色楞为代表，伊克昭盟确定僧格林沁为代表，并均已先后到达。其他各盟旗代表就在北平酝酿组选，结果又确定贺喜业勒图默尔根、多尔吉为哲里木盟代表，呼、昭两盟因既已淪陷，又无适当人选在北平，没派代表参加。组织就绪后，代表等就赴京请愿。国民党中委白云梯、克兴额等想利用晋京代表请愿的声势和蒙旗地方实力的支援，特慫恿军政部长何应钦来电邀我赴京洽商蒙事。蒙藏委员会总务处长陈敬修也来北平迎接班禅赴南京，特到嵩祝寺见我，表示欢迎我和班禅同车南往。这时吴鹤龄已被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解除了蒙事处处长职务，调任参事闲散之职，并命令他重选蒙旗代表，改组办事处。吴鹤龄在

这种压力之下，感觉对他不利，就匆忙地由南京赶来北平，請于华亭（蒙名罗布桑卓珠尔，系吳岳父之喇嘛弟弟，后还俗为鎮国公）出面奔走联络，托班禪的堪布和烏兰察布盟的德瓦根敦等为我们居中調解，吳鶴齡偕同于华亭曾亲到嵩祝寺和我見面，接着又由班禪出名宴請我俩，堪布們代表班禪陪同我倆聚餐，劝我倆合作。继又由德瓦根敦、拉希色楞等出面在擷英番菜館邀請我倆宴会，进行調停，但我倆均未表示接受。

我和班禪同乘专車到达南京后，一面見何应欽洽办請拨武器之事，一面和晋京請愿代表商洽进行反对吳鶴齡、改組办事处之事。桂永清更是时来看我，陪同我往見以关心边事自居的考試院长戴季陶，桂以“蒙古通”自居，向戴介紹說：“我曾亲到錫林郭勒盟各旗訪問，知道錫林郭勒盟各旗王公均唯德王馬首是瞻。”

吳鶴齡托請巴文峻出面調解，巴曾到中央飯店見我說：“吳鶴齡业已表示愿意奉令改組办事处，他只担任卓索图盟代表，其他各盟旗代表均由新代表担任。”我没有接受巴文峻的調停，并內定补英达賴为新的办事处处长，准备接收。后来因白云梯与石青阳爭权夺利，改組办事处之事就被擱浅下来，我表示要整装回蒙，以相对抗。

为时不久，蔣介石由武汉返京，先在勵志社宴請我和各代表，继又叫桂永清通知，在軍官学校单独召見我，届时由桂永清陪同我前往見蔣。寒暄后，桂永清就把建立中央軍官

学校张北分校计划递上請蔣閱看。蔣略加翻閱即放在一边說：“現在決定在张北設立分校（张北分校后来沒有办成），特派桂永清按照黄埔的精神办理，培养蒙古方面的軍事干部人材，好做編制蒙古騎兵师的准备。”继又說：“蒙古王公制度是可以存在的，希望不要为此操心。”

現在回想起来，桂永清到我旗訪問时为什么向我建議組織蒙古騎兵呢？嗣到武汉見蔣时为什么楊永泰又提出給我蒙古保安統監呢？后在南京見蔣时为什么又提出建立张北分校呢？据我現在的看法，蔣介石这样重視我，是有原因的，对我职位問題上前后有了变动，也是別有用心的。因为在民国十九年閏、馮倒蔣失敗后，閻錫山特派赵太东、仲躋翰二人由蒙人道布頓（曾任察哈尔一个旗的总管）当翻譯，想通过我旗前往外蒙，被我旗防卡盘查扣留。我曾将此事告知察哈尔省主席刘翼飞，我想刘翼飞定告知张学良和蔣介石。从此蔣介石对我可能有了印象，想爭取我作为他統治蒙古的助手，并认为我旗是通往外蒙的要冲，有組織蒙古騎兵进行“防共”的必要，同时在蒙古組織起一部分武力，对于附近的杂牌軍隊也发生牵制的作用。所以蔣介石特派桂永清亲到我旗察看情况时，有向我建議組織蒙古騎兵之事。嗣到武汉見蔣时楊永泰又提出要給我蒙古保安統監名义，不給蒙古騎兵师长的实权，是想利用我作招牌，不愿叫我掌握实力，所以后在南京見蔣时又提出建立张北分校的计划，而叫桂永清为他培养軍事干部掌握实权，叫我担任空洞的保安統監的具

体措施。記得在北平解放，我到南京时，桂永清已当上了海軍总司令，特在他的家里招待我宴会，并請国防部五个厅处长、国民政府一个管軍事的局长和白云梯等作陪，他情不自禁地流露說：“如果依照我从前的計劃，在內蒙組織起来五万騎兵，东北不会叫共产党拿去，也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接着他又向我介紹在座的厅处长：这位是主管軍械的，那位是主管电台的，說我如有所需要时，請向他們各位进行接洽好了。通过这一段談話，足証蔣、桂有意叫我組織騎兵，是以“防共”为第一要义的。其后我在阿拉善旗发动“西蒙古自治运动”，前往广州請愿时，桂永清特又給我机关枪四挺、步枪二百枝，也是想利用我在內蒙組織“反共”力量，为他們效力，作垂死的掙扎。

在南京見蔣后，我即将韓凤林留下在軍官訓練班当教官，并以需用軍事人材为名，向高級教育班交涉要出了正在受訓的蒙古学生云继先，又向軍政部洽領迫击炮二門及补发武汉行营許可的步枪几百支，还到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参观，和正在求学的蒙古青年做了接触，以期对我有深刻的印象。这时我对于改組办事处之事已感冷淡，又不愿再陷入白云梯等爭夺权位的旋涡里，遂分別到各机关訪問，各机关首脑也分別宴請我，这样应酬聯絡了几天。这时外蒙的逃亡者迪力瓦还在南京，我和他常相过从，有一次我問他：“內蒙搞自治可以不可以？”他答說：“外蒙既可以进行独立或自治，內蒙为什么不可以自治。”这几句話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不

愿再在南京作无味的政爭，就借同一部分代表北返。另一部分代表参加了办事处的改組。吳鶴齡的处长改称主任，这一場政爭就这样結束了。記得当时报纸上登載着“德王等晋京請愿未遂，拂袖返蒙”的消息。我这次竟落了一个乘兴而往，負气而归。所以到北平后，又和旅平蒙古知識青年作了广泛的接触，招收了二十余名蒙古学生，由云继先和于福賡、云敬圣帶領着，随我一同返回苏尼特右旗，着手培养人材和力量，各作待机而起的政治資本。从这一段經過中，說明我武汉見蔣是想取得蒙古的軍权，赴京請愿是想取得蒙古的政权，但均未如愿以償，于是便想归来搞自治，实现我的政治野心。

我回旗后，即在西营盘成立了蒙古干部学生队，委派云继先、于福賡二人为教官，把从北平招来的学生一律編入該队受訓，把从武汉和南京所領到的武器拨归該队应用。这时我认为即使中央軍校张北分校成立起来，毕竟是国民党中央的系統，一切須受他人的监督，不如自办一个学生队，訓練自己的干部方便。不久，陈紹武、陈国藩、霍宝书、烏鵬、王泽春由綏包一带前来苏尼特右旗，丁我愚、亢仁等也相继前来。我正招致青年来归，当然力表欢迎，推誠相与，常相聚談，共同研究討論怎样对待当前紧张时局下的蒙古問題，决定由錫林郭勒盟联合烏、伊两盟发动内蒙自治。这时我儼然以青年領袖自任，以期出問蒙事，掌握大权。

二

我虽然罗致了一部分蒙古青年做为我的臂助和基干，但自知我的职位不过是副盟长，声望不高，年纪又轻，不能领袖群伦，号召各盟旗参加，必须得到年高、“爵尊”之王公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锡林郭勒盟进行自治，首先必须取得盟长索王的赞同和楊桑（楊桑曾任过锡林郭勒盟盟长）等老年王公的谅解。楊桑向以我的前辈自居，认为我好大喜功，时常流露不满之意，曾有“锡林郭勒盟出了一个苏尼特王，不知什么时候闖下乱子，锡林郭勒盟前途殊堪忧虑”之語，盟长索王对我也是不满的，因此，必须设法说服他们同情自治，最低限度不致出头阻挠自治。經我反复思维，认为通过班禅来说服他们是个最妥善的方法。这个方法还是郭道甫和我谈过的。

記得在一九二九年我随同班禅去沈阳面见张学良洽拨武器，曾与郭道甫（这时郭任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见面，常相过从，他曾对我說：“外蒙和内蒙情况大致相同，为什么外蒙独立成功？是因为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内蒙历次抗拒开垦或独立运动都归失败，是因为各自为政，形同一盘散沙，沒有中心信仰，以致历次运动无一成功。现在听说班禅的堪布们正請中央用武力护送班禅回藏，一时尚恐不能实现。趁此机会，应

当联合各旗集資在蒙地为班禪建庙，請班禪留在內蒙，做为宗教領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他这个建議，我很以为是，返归錫林郭勒盟后，即和盟长索王商量，索王也极表同意，当派我和松津旺楚克（浩济特左旗扎薩克郡王）代表錫林郭勒盟前往北平聯絡各盟旗王公商洽为班禪在內蒙建庙，挽留班禪在內蒙长期居住，各旗王公一致表示贊成。适这时班禪在北平，郭道甫也来平公干，我們就去面見班禪，确定在錫林郭勒盟和哲里木盟各建一所庙。嗣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哲里木盟已經淪陷，遂将各旗集資十万余元，在我旗和烏珠穆沁右旗为班禪建庙二所，在一九三一年并請班禪前来我旗过冬，一九三二年夏在錫林郭勒盟各地唸經。因此，既取得班禪对我的好感，也使錫林郭勒盟各旗王公对班禪有深刻的印象。

迨至一九三二年，我正和青年們研究进行自治，設法說动索王同意时，班禪由烏兰察布盟百灵庙前来我旗，并要去貝子庙、烏珠穆沁右旗等地唸經，我认为机不可失，遂請班禪帮助我，同他前往烏珠穆沁右旗，說服索王。在我們沒有到达之前，听说日本关东軍参謀田中久曾带同蒙語翻譯金永昌前来劝說索王赴“滿洲国”参观，并要求在烏珠穆沁旗設置特务机关，安装电台。索王因“九一八”事变后，曾派人到过呼伦貝尔盟海拉尔向凌陞探詢日本对蒙旗的情况，凌陞曾答复索王說：“日本最厉害，我們与任何人合作都可以，但不能与日本合作。”因此，索王对日本存有戒心，遂应付

說：“你們日本有力量你們就設，要征詢我的意見，我是不同意的。”并推托身体肥胖，动轉維艰，不能前往，可派协理胡因里前往奉天、长春等地一行。田中久等走后，我陪同班禪到达烏珠穆沁右旗，索王对我提起田中久前说要挟設置特务机关和电台一节，甚感头痛，乏于应付，問我怎办，我不敢同他直接談自治的事，答复他說：“班禪佛爷正在此地，何不請求佛爷指示明路。”索王就同我去見班禪，請示对策。班禪即答复說：“前次德王和我說的联络錫、烏、伊三盟会商蒙事很好，現在正是时候了，积极去做就对了。”索王当下也表示贊成，于是第一步說动成功，就請索王以盟长名义做出公文，盖上盟长大印，派我代表錫林郭勒盟去見烏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后又加派烏珠穆沁旗的协理若乐格尔扎布一同前往。我遂偕同亢仁、丁我愚、阿乐騰格尔勒等馳赴百灵庙，先派員与云王送去公文并向云王表达請其出而倡导自治之意，云王当时还徘徊不定。恰于此时，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峻等一行前来宣撫，經由四子王旗等地到达了百灵庙，亢仁当将我等候云王前来研究倡导自治問題告巴，我也請巴去劝說云王早来。巴文峻虽然身負宣撫蒙旗归向国民党中央的使命，却对內蒙自治也尽心贊助。他在南京时，曾参加过参謀本部边事研究組，討論过这一問題，知道地方自治性质的內蒙自治，尚在国民党中央許可之列，遂允前往劝說云王，云王这才表示愿意与我共同倡导自治，当率同其弟根敦扎布和仕官們沙拉巴多尔济、那逊瓦齐尔等

前来百灵庙。这时烏珠穆沁右旗台吉若乐格尔扎布亦赶来参加。遂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百灵庙举行了第一次自治會議，八月二十四日发出通电。当时潜伏在我旗庙上冒充喇嘛的日本特务人員笹目却向韓凤林說：“你們发动自治太早了，时机还未成熟，不如我們日本軍的力量到达这里时，再进行发动自治为宜。”足見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們向国民党中央要求自治，不感什么兴趣，而是企图在日本的卵翼之下进行自治。九月二十八日召开了第二次自治會議。其后黃紹竑、赵丕廉来百灵庙，經過許多周折，虽然爭得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一般称百灵庙蒙政会）的組設，但我們极不滿意。当下决定除通知各盟旗选定晋京代表要求許可內蒙自治外，并派陈松山（蒙名布仁巴雅尔）前往包头面見孙殿英，請其支援自治。据他回来报告說：“我見孙殿英后，力表內蒙自治絕无其他背景，純系蒙人迫切的要求，以期把各盟旗团結起来，实行御侮图存，請大力支援。孙殿英甚表同情，并說就是內蒙自治有外人背景，也沒有什么关系，他仍尽力支援。”同时我又派韓凤林前往北平日本大使館分支机构，探詢对內蒙自治的态度。韓凤林回来报告說：“我到北平曾見着日本大使館的柴山武官，請支援內蒙自治，他說現在中日之間存在的問題很多，不断发生冲突，但仍保持邦交，內蒙自治系中国內政問題，日本不便出面干涉，言下頗为冷淡，对內蒙自治似乎不感什么兴趣。”我听到韓凤林报告后，认为柴山武官是日本的外交人員，不便表示对內蒙自治的态度，乃又派

补英达赖前往伪满面见溥仪，并通过溥仪的介绍与日本关东军吉岡安置参谋接洽，托辞购买枪支，探询日本关东军对内蒙自治的态度，没有得到明确答复而归。

三

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仅领到开办费两万元，用以维持办公和职员的生活，每人支給十五元生活费，仅够伙食之用。这样勉强维持，终非久远之计，即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请领经常费和建筑费，但尽管函电交催，亦无结果。我为了解决这个面临的迫切问题，特密派陈绍武前往廬山面见蒋介石，一则报告日本人进出西蒙，请示如何对待，再则请拨经临各费及枪械电台等物，以济急切需要。结果得到蒋介石的答复，准予拨给经常费每月三万元，建筑费十二万元及枪械电台等物，囑向南京有关部门洽领。至于怎样对待日本人进出西蒙问题，蒋介石答复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相机办理。并囑陈绍武转告我，他不久即来綏远巡视，请我和云王前往相见晤谈，还叫陈绍武给我带来他的复函一封，内容也是和对陈绍武所说的大致相同。

不意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韩凤林被捕事件，这个事件发生的原因，据我了解有三：（一）在蒙政会成立之后，我派韩凤林为保安处第一科科长，云继先为第二科科长，朱实夫为第三科科长。当由蒙政会下令叫各盟旗选送蒙兵，贛成

保安处組織保安队，并派韓凤林随同本会委員托克托胡前往南京与有关机关接洽保安队的編制和請发經費及武器事項。韓、托走后不久，錫林郭勒盟各旗就迭送蒙兵前来，我就責成朱实夫主持組織訓練。因为烏珠穆沁右旗的蒙兵，不慣基本訓練的約束和語言隔閡的关系（朱实夫不懂蒙語、蒙兵不通漢語），对朱实夫有了不滿情緒，群向宝道新反映，宝对该旗蒙兵表示同情，反說朱实夫应当迁就蒙兵的生活习惯，在訓練上不必操之过急，这种說法当然引起朱的不滿。迨韓凤林返后，朱就将这事的經過向韓叙說，希望得到韓的同情和支持，不意韓对朱却未表同情，反說宝道新的意見对，这又引起朱对韓的不滿。接着我又发表韓兼保安队的总队长，朱实夫想取得总队附的职位，我也沒有給朱发表，这是我对人事安排上失当。朱主持訓練保安队一場，落一个費力不討好，連一个总队附也沒到手，当然更为不滿。在这以前，蔣介石蓝衣社的特务李才桂率同工作人員以“内蒙旅行团”名义前来百灵庙偵察情况，当时因韓凤林赴京，我就派朱实夫接待他們。韓凤林返后，李才桂才来拜会我，我对他說：“你如有事，可与韓凤林接洽，因为我事情多，誠恐招待不周。”但是韓凤林却沒有很好的接待李才桂，招致李才桂的不滿。李曾向朱实夫說：“韓凤林这个人态度傲慢，盛气凌人，很难与之洽談。”朱实夫曾将此話告我，却未引起我的注意。并且在百灵庙蒙政会成立后，日本人常来錫林郭勒盟和百灵庙拉攏我，我也叫韓凤林充当日語翻譯（因韓是日本留學生

在士官学校毕业)，朱实夫也可能把这事向李才桂反映。其实韩凤林是个民族主义者，仅仅做了我的日語翻譯，并无拉我投日的行为。記得我曾和他談过：“在当前时局下，我們要利用日本的力量，把蒙古复兴起来，你看怎样？”韓对我說：“我在日本留过学，深知日本的滿蒙政策是不怀好意的，应当十分注意。”李才桂认为韓凤林有拉我勾結日本的行为，便报告了駐在北平的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蔣孝先，当韓凤林赴北平忌戒大烟癮时，就被宪兵三团逮捕，这是可疑原因之一。（二）韓凤林由南京返回我旗时，曾向我报告說：“我在南京充当軍官訓練班教官时，桂永清曾一再拉我入蓝衣社，我坚决表示不肯，愿意回蒙工作。”由此推断，因为韓凤林拒絕参加蓝衣社而遭忌于桂永清，也是很有可能的。記得在韓凤林被捕后，我曾电請桂永清居中营救，桂給我复电仅一句話，說：“我已将原电轉呈委座了”，表示甚为冷淡。这是可疑原因之二。（三）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之后，由吳鶴齡介紹赵汇川，由万福林介紹刘建华前来百灵庙，我都委以工作。嗣我发现赵汇川有曾扩情給他的密电本，他知道被我識破后，反将密电本献出，实以告我，表示忠誠。我曾囑他将蒙政会經費未发、工作人員不安情况密电曾扩情，希他轉以告蔣，促使經費的速发。当时关起义任蒙政会电台总台长，认为赵汇川私发密电，形迹可疑，曾向我告密。我說这事我知道，叫他把电报打出去吧，关起义也就放心了。但赵汇川是否持此密电本或以其他信函方法密告情报，我再未注

意防查。至于刘建华也与蔣介石的特务組織有密切关系，曾給韓凤林餽贈八音子手枪一支，无非是想买好韓凤林，并想通过韓凤林的关系取得我的信任，便中作特务工作。当韓凤林赴平忌大烟癮时，赵、刘二人随同前往，到平后的次日，赵、刘二人亲到韓家說下午来打牌，囑韓在家等候，不意届时宪兵三团的官兵十数人乘坐大汽車前来韓家，即將韓捕去。捕韓的汽車剛經开走，赵、刘二人即赶到韓家，未受株連，此为可疑原因之三。

韓被捕后，蒙政会駐平办事处处长包悅卿曾面見何应欽要求释放，质問何应欽說：“韓凤林究犯何罪，竟被宪兵三团逮捕，什么三民主义簡直是害民主义，什么青天白日簡直是暗无天日。”何应欽矢口否认，允为注意訪查下落，設法营救。但韓終未得释，仅由北平軍分会給韓的家属送去五百元，作为慰問救济之資。在蒙政会成立后，我曾派包悅卿、郭尔卓尔扎布赴平敦請何应欽就任指导长官，何应欽答复不久来綏轉赴百灵庙。适在韓案发生时，何应欽来綏包視察，白海风劝我迎何前来，我很負气地說：“他把韓凤林捕起来，还欢迎他来干嘛？”仅去电报請何前来。何答称急待返平，无暇前来。为了救援韓凤林，我曾迭电蔣介石报告李才桂与韓案有关，要求释放。蔣来电答复說：“韓案发生，蒙胞既然怀疑才桂，显見才桂有不洽蒙情之处，应即撤銷其内蒙旅行团团长的职务。”不久李才桂就离开了百灵庙。

到了是年秋天，蔣介石將到綏远視察，在他未到之前，

先派蕭振瀛帶着金絲猴皮袄等禮物前來百靈廟，邀我和云王赴綏見蔣。我同蒙政會的中上級職員討論研究可否赴綏，多數認為我與傅作義的關係不好，外邊又有謠言，深恐赴綏被扣，勸我不要前往，以防不測。嗣我又與陳紹武單獨商量，陳對我說：“我前次赴廬山見蔣時，蔣對您非常器重和關懷，並且您派我赴廬山就是為和蔣拉攏感情。這次蔣以國家元首的資格到綏巡視，你是蒙古地方長官，正應前往相見，作進一步的拉攏，便中還可商洽解決綏蒙之間存在的糾紛問題，應當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前往，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顧慮，以致坐誤時機。”我也認為既系蔣介石相邀，諒傅作義不會把我怎樣，遂和云王、包悅卿、陳紹武等赴綏等候見蔣。

蔣介石由宋哲元陪同到達綏遠車站時，我和云王曾到車站迎接，蔣下車後首先與云王和我握手，接着蔣又召見我和云王，包悅卿、陳紹武也隨同進見。蔣先問云王：“蒙政會成立之後諸事如何？”云王答稱：“我是年老多病，諸事多虧德秘書長（百靈廟蒙政會成立，云王任委員長，我任秘書長）幫同辦理。”蔣又面向我說：“方才听云王說，你幫助他很好，今後仍希你盡力幫助云王，作好蒙政會工作。”我當將韓鳳林被捕之事提出，要求蔣設法營救。蔣答復我說：“這事我返京後當詳為查問，待到一月後總會得個水落石出。”接着我又向蔣表示，蒙政會願敬獻軍馬三百匹，答謝中央許可自治，關懷蒙古的盛意。蔣也表示接受，談話到此，我們

就告辭歸寓。繼而綏遠各界首腦又舉行歡迎蔣介石訓話會，邀我和云王、包悅卿等參加。訓話會開始時，首由傅作義致詞，繼由蔣介石訓話，蔣訓話後，邀請云王和我講話，云王推托未講，我遂登台致詞說：“自清朝以至現在，國家最高元首只有兩次到達我們這個邊遠地方，前次是康熙皇帝，這次是蔣委員長。但是康熙是為征服我們蒙古而來，蔣委員長是為幫助我們蒙古而來。我們表示竭誠歡迎。”我用蒙語講完後，由包悅卿用漢語翻譯，蔣介石聽了我這套吹捧之詞頗為高興。

我從綏遠見蔣返回百靈廟後，當用蒙政會的經費購買軍馬三百匹，派補英達賴偕同劉建華送往南京軍政部。約經一個月的時間，接到以“北平民眾鋤奸團”名義印發的一個傳單，大意說“韓鳳林是勾結日本，背叛黨國，出賣民族的漢奸，實屬罪大惡極，為全國人民所痛恨，已經作了斷然處置，沉之大海”。我接到這個傳單，經和丁我愚研究，認為這是蔣介石耍了一個花招，不好正面的明確答復，來一個側面的傳單作為變相的通知，由此推斷韓鳳林這個人可能是沒有了。但營救之心仍然未死，在無望中再求萬一的希望，於是就叫丁我愚擬具了一個電報，詳述李才桂前來百靈廟作暗地偵察和不满韓鳳林的情形，以及韓到北平時被憲兵三團逮捕的經過，以云王和我的名義，再電請蔣介石予以釋放，並堅決表示如再不釋放，我等身負蒙政會的要職，連一個職員都不能保護，實在無以對同仁，只好懇請辭職，以卸仔肩。不意這個電報發出後，惹起蔣介石的惱火，當來復電責備我們說：

“君等任意推斷，肆意要挾，尙知國家有紀綱否？”

我為了弄清蒙政會內部與韓案有關人員，特令稽查處主任李鳳城檢查來往信件，發現云繼先給朱實夫來的一封信，其中大意說：“韓鳳林被捕後，秘座（指我）對實夫兄懷疑甚大，應加注意。對保安總隊長一職，務要盡量爭取，我們誰干都可以，務使不要落於他人之手。”同時又據曾在幹部學生隊受過訓的人員向我告密說：“云繼先、朱實夫聯絡在蒙政會任職的土默特旗籍人員，策劃掌握保安隊的官兵，爭取保安總隊長的職位。”因此，我對云、朱有了懷疑，云、朱對我也有了戒心，這就種下了後來云、朱策動保安隊兵變反正的根源。

一九三四年秋天，日本駐在天津的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乘坐飛機前來我旗活動，其目的是想拉攏我進一步靠近日本，我也就以禮相待。他對我說：“你進行蒙古工作怎樣？有沒有困難？如有困難時，可向我說，我當盡量幫助。”接着他又自吹自擂地說：“我到哪裏，中國官員都怕我，因為中國政府的事情都瞞不了我。”我就對他說：“我們蒙政會保安處科長韓鳳林，在北平被憲兵三團逮捕，現在生死不明，希望你幫助調查了解一下。”他很自負地說：“我能有辦法知道，俟我詳細調查一下再行告知你。”過了一個時期，他就將關於探詢韓案的經過，通過駐在我旗的日本特務機關長矢浦轉告我說：“國民黨中央憲兵第三團團長蔣孝先赴廬山向蔣介石請示機要工作時，蔣介石就命令蔣孝先速把韓鳳林設

法逮捕处死，蔣孝先即密电駐在北平的中央宪兵第三团吳团附負責处理。当韓凤林来平时就有特务人員尾随前来，韓到平后即进行逮捕，当天晚上即行枪杀。”后来在伪蒙疆时期，我主持举办韓凤林（蒙名胡克巴图尔）追悼会，追贈以“中将”的头銜。并派赵汇川、刘大光二人前往北平寻找韓凤林的尸体，經過当时伪北平市长袁良的协助，终于找到，另行埋葬。

韓凤林事件发生后，我採納了关起义进行多边外交的建議，派刘建华赴广州和正在搞西南独立的胡汉民、陈济棠集团取过联系，請其支援內蒙自治。刘建华到达广州后，把我大吹大擂了一番，夸张說我在內蒙握有五万騎兵云云，但也沒有什么結果。只是他得了胡汉民贈送的旅費五百元，返回百灵庙时，給我带来一个用象牙鑄有胡汉民、陈济棠、周佛海、蕭佛成等十数人名字的精致贈品和信函一封，仅表示愿意贊助，沒有实际支援。我也认为西南与內蒙古相距甚远，仅能声援，无补实际。

从此，我就进一步与日本帝国主义勾搭起来了。

（陶布新记录整理）

德穆楚克栋魯普与傅作义

爭夺鴉片过境稅

任 秉 鈞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在北洋軍閥和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綏远时期，綏远省历任的都統、主席，只顧个人升官发财，不管人民生活疾苦，利用种种罪恶手段，压榨剝削劳苦大众，以致使这个地区陷于民穷财尽的絕境。

在漫长的岁月里，甘肅省河西走廊所产的鴉片，每年要路經綏远，运銷天津等地。鴉片商人为了貨运安全，一般是不走各县，而是經過烏兰察布盟的烏拉特中旗、茂明安旗、达尔罕旗到达百灵庙，再由百灵庙的达尔罕旗保商团护送归綏（呼和浩特市），装上火車，运往天津。

在傅作义統治綏远时期，“晋綏財政整理处”针对这种“財富”，就专設了一个禁烟善后局，后又改为禁烟稽查处，专收鴉片过境稅。每年平均收入約百余万元，最多可收到二百余万元，至少也收几十万元，总之，这是一項很大的收入。

烏兰察布盟各旗王公，对此很不滿意。他們认为，鴉片

一入綏遠境內即進入牧區，各旗的軍隊負有保護的責任，到了歸綏不過只是裝上火車，綏省府不費吹灰之力，反收巨利，各旗王公出了氣力，反而得不到好處。但是當時處於大漢族主義反動統治之下，也只好敢怒而不敢言。

百靈廟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成立之後，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對於這筆收入，也是垂涎三尺，首先向綏省府提出，要由百靈廟蒙政會派一個“幫辦”到禁煙善後局工作，並請由鴉片過境稅內每年分給蒙政會幾十萬元，但是這兩項要求，均遭到綏省府主席傅作義的拒絕。以後雙方又派員商談，從一九三五年夏季一直談到一九三六年春季，始終相持不下，沒有結果。德王當然不肯就此放手，再派蒙政會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包悅卿、幫辦敷云章，除繼續和傅作義談判外，還到北平向“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告狀。為此，包悅卿和軍分會辦公廳廳長王倫（譯音）爭吵起來，包悅卿以威脅口吻說：“這事若不允許，我們蒙古人就要在滂江集中幾萬騎兵，準備拼命。”王倫也怒目相視地說：“我們怕日本人是真的，你們蒙古人隨便吧。”一場爭吵，還是毫無結果。

蒙政會一方面派員和傅作義以及國民黨中央交涉，一方面在幾個旗的交通要道上設立稅卡，尤其是烏拉特中旗的黑沙圖稅卡，主要是為征收鴉片稅而設立的。傅作義對此當然不能讓步，除派一個加強營進駐黑沙圖，武力制止蒙政會收稅外，還將蒙政會設在伊克昭盟達拉特旗柴登的稅卡派兵搗

毀。卡长狼狽逃回百灵庙，哭訴經過。德王聞訊，勃然大怒，也派蒙政会保安队三百余名，进驻烏拉特中旗政府附近，該旗也自动供給保安队馬匹駱駝和軍糧，以示支持。两軍對峙，相距約四十余里，整整相持了将近一年之久。

就在这个双方爭执的期間，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九軍軍长宋哲元，为了坐收漁人之利，便派蕭振瀛到百灵庙乘机挑拨，他对德王說：“我們二十九軍愿意帮蒙政会的忙，我們从张家口派汽車經草地，直到黑沙图接运鴉片，由张家口上火車。所得利益，咱們双方平均分配。”德王对此极表欢迎。于是在一九三五年冬季，二十九軍就派綠色大汽車十几輛，由佩戴蒙政会保安队符号的手枪队押运，經百灵庙到黑沙图北边，秘密接运鴉片。因防备严密，一般人未曾看見。

由于对鴉片收入的明爭暗斗，傅作义和德王的关系越来越趋破裂了。直到一九三六年春季，云继先在百灵庙武装暴动后，因为駐烏拉特中旗的保安队也一起反正，脫离了蒙政会，才使这个對峙局面基本結束。

我当时担任百灵庙蒙政会财政委员会第一科科长，对于德王和傅作义爭夺鴉片过境稅的事，稍知梗概，惟以事隔三十年，現在既无文献参考，又沒旧日参与机要同事叙談，記叙很难詳实，尚希知者补充指正。

云继先部百灵庙武装暴动经过

任 秉 钧

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简称百灵庙蒙政会），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掌握了蒙政会的实际权力。从此日寇认为德王奇货可居，使用威胁利诱的办法和他加强勾结，同时又驱使蒙汉奸特，或明或暗与之往来，尤其是在一九三五年后半年，蒙奸李守信的蒙古伪军侵占察哈尔北部六县后，日寇关东军更加明目张胆地派遣特务人员（有的利用各种产业部门为掩护，有的披着宗教外衣），借名旅行，来百灵庙进行挑拨鼓动工作，如西苏尼特旗特务机关长盛岛角房和松井原子助（大佐），就是专作德王工作的日寇特务。此外关东军“嘱托”胡克巴都尔、陶克陶、金永昌等人极力和德王拉拢。这是德王投日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是，德王和傅作义争夺统治权的矛盾。蒙政会成立前后，德王就对傅作义有所不满，以后因为争夺鸦片过境税，彼此关系更坏。德王为对抗傅作义，把鸦片改由草地经张家口出境，傅作义则以禁运煤炭去百灵庙为对策。这种互相斗争的局面，更给了日寇以挑拨离间的机会。一面由

駐归綏的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中佐）出面，用駱駝运炭給蒙政会，一面唆使德王創造独立局面，逐漸脫离祖国。同时百灵庙因免除烏拉特前旗石拉布多尔济的扎薩克职务（即所謂西公旗石王事件），与傅作义的矛盾又深了一步。

德王投靠日寇的行动，引起內蒙古西部地区青年云继先等多人的不滿。他們原来要求內蒙古自治，并不脫离祖国投降日寇，因此，对日寇的橫行霸道，企图灭亡蒙古的政策是不滿的。对少数蒙奸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也十分憤恨。云继先部广大官兵的思想感情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德王左右两种势力的斗争，这两种势力的斗争，愈来愈明显，愈激烈。云继先等在會議上和个人談話中，曾力劝德王改变作法，断絕和日寇的关系。但德王野心不死，仍然在嘉卜寺（化德县）招軍买馬，制造“国旗”，酝酿組織“蒙古軍政府”，走伪滿的道路。

时机紧迫，必須在“抗日”、“投日”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云继先等眼看不能阻止德王投日，不得不考虑抗日的道路，于是就秘密磋商，計劃发动蒙政会的官兵举行抗日武装暴动，一方面拉出德王的基本力量，减少他投靠日寇的資本，一方面維護內蒙古西部地区的一片干净土，免得遭到日寇的蹂躪。

一九三六年一月，云继先、朱实夫、任秉鈞、苏魯岱四人，借回家过春节的名义，分別回到呼和浩特，进行武装暴动的策划工作。当时适逢巴文峻也由南京回来，为国民党中

央做德王工作。大家商議的結果，认为不找傅作义援助不行，而傅作义久有破坏德王力量的打算，当然一說即合。我們和傅作义当面决定举行武装暴动的計劃后，先后和綏远省政府秘书长曾厚載、三十五軍旅长金中和，具体研究了暴动方式、行动日期。当时約定在我們暴动的时候，由三十五軍汽車队前往百灵庙附近接我們的部队，曾厚載还和我們編訂了密电碼，专作联络之用。事情接洽妥当后，我們便分別返回百灵庙。

我們回到百灵庙蒙政会后，即分別找有关官兵商洽，不想很費周折。原因是部队里中級以上軍官的思想还不完全一致，黃埔軍校出身的土默特旗人和一部分烏滂守备队教导队出身的青年学生，早有此志。但有一部分人与德王感情較厚，一时还不愿暴动，經過我們深入地宣传解释，既动以私人关系，又劝以民族大义，才使他們抛却了和德王的私人感情。在打通軍官思想之后，再由云继先和部分軍官深入士兵中，进行联系活动。这样由少到多，由上到下，把全部官兵中的骨干力量都联系起来后，便决定了暴动日期和步驟。

在二月二十六日夜間十时，全部保安队武装暴动，按照原定計劃，分成五路出动：一路袭击德王的烏滂守备队，解除武装威胁；一路进攻軍械庫，夺取枪械；一路攻打稽查处的看守所，释放被押士兵；一路搗毁电台，断絕与德王的通訊（当时德王回到苏尼特右旗他的家里）；一路往會計科，打开銀柜，焚烧帳目。暴动工作順利地进行到午夜二时，已按計劃完成任务。就把五路人馬到南营盘集合起来，列队离

开百灵庙向南而行。

当时正遇连降大雪，积雪没膝，我们在冰雪中行军，真是坚冰在须，步履维艰。我们步行五十余里，到二十七日晨六时许，始遇到傅作义所派去的温永栋。他身着便衣，率十二辆汽车来接。因车少人多，不能同时乘坐，只得部分乘车，部分步行。我们刚走至达尔罕旗的黑沙图，便遭到蒙政会派来的乌滂守备队乘汽车的步兵和达尔罕旗的保商团骑兵追袭。他们携重机枪数挺，向我们开火，当时战斗激烈，弹如雨下，约战六小时，我们走至边墙濠，敌人始退去。到下午二时，全部安抵岔岔（村名）。这里距百灵庙已有一百二十多里。接着由岔岔开到二分子（村名）。并电知驻乌拉特中旗的保安队第二中队（陈应权所部）来二分子集合，该部很快地来了二分子。并携来五瓦特电台一架。至此全部官兵约有九百余人，暂编为两个大队，六个中队，两个特务队，成为一支装备较优、战斗力较强的部队。

当我们的部队正在二分子休整的时候，傅作义派三十五军四二一团孙兰峰部秘密包围了我们，并派温永栋诱劝：让我们暂时缴枪，由该军汽车队运送大青山前，等我们防地确定后，即将原枪械交还。官兵对这种不讲信义的办法，很不满意，人人不愿交枪。但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又考虑到将来的出路，不得不尽力忍耐，结果交了多数步枪、部分机枪，手枪却一支未交。在缴枪的时候，官兵愤怒异常。多数将枪枪拉下。缴械后，徒步向大青山前开拔，分驻在萨拉齐县的水

潤沟（村名）和归綏的三两（村名）。傅作义临时給以“归綏县防共大队”、“薩拉齐县防共大队”的名义。不久由国民党中央給以蒙古保安总队的番号，月餉一万元，任命云继先为少将总队长，朱实夫为副总队长。

当部队駐二分子的时候，我們文职人員回到归綏（呼和浩特）向有关方面报告抗日武装暴动的經過，并且商量扩大这一暴动影响的办法，在三月二日，由云继先領銜发出所謂“冬电”，通电全国，声明脫离百灵庙蒙政会。

我們部队自从改編蒙旗保安总队后（国民党中央給以蒙古保安总队的番号，傅作义改为蒙旗保安总队），遭到傅作义的忌恨，处处企图消灭，他除曾繳我們的枪械外，还用各种限制办法，縮减編制，将每班十二人，縮为九人，将国民党中央敷衍所发的月餉一万元法币，改換給綏远省票，且实发九千五百元左右，扣发被服和其他軍用物品。除用种种刁难办法外，有时还派員到部队中，說些挑拨性的言詞（如傅部参議赵金彪的讲话）。同时云继先挪用了国民党中央所发的五千元买馬費，买了面粉，惹起了部分官兵的不滿，致使奸人乘机，煽动几个人行刺，九月下旬云继先被刺殞命，部队分散，有部分士兵又返去百灵庙，走至后山途中，被傅作义派装甲汽車追击，打死多人，部队遂垮台。

綏境蒙政会始末記

經 革 陳

綏境蒙政会全称为綏远省境内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在当时，是一具政治僵尸。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借口，是組織蒙古王公抗日。可是这个組織成立十多年，却一直没有摆脱烏烟瘴气的局面。我因从始至终参加了綏境蒙政会的工作，想想过去蒙古民族的悲惨处境，看看今日内蒙古自治区的欣欣向荣，既感到惭愧，又感到兴奋，决心从思想上結束过去的生活，加强自我改造。

产 生 的 背 景

“九一八”东北四省淪陷以后，得寸进尺的日寇，紧跟着就把魔爪向察哈尔省的盟旗伸展进来。这时候，錫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的德穆楚克栋魯普（德王），乘机混水摸魚，企图捞一笔政治資本，他便于一九三二年的冬天，跑到武汉和南京，见了蔣介石两次。原想得到蔣的重用，不料蔣对他却很冷淡，德王一气而归。回来以后，便和日寇暗地勾搭起来。

一九三三年的夏天，德王突然从百灵庙发出了一个要求内蒙古高度自治的通电。通电一經发表，各方的反映很快，值得注意的是：引起了許多不明内幕的蒙族人士的响应，这些人士中間，虽然都贊成自治，但各人的主张却不尽相同。一类人主张的自治，是不脱离中国的自治，高度也好，不高度也好。另一类人主张的自治，是脱离中国，投靠日本，亡国奴的自治。国民党反动政府，认为内蒙形势已經恶化，便乱成一团，在惊惶失措的情况下，急忙派了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巴文峻赴烏、伊两盟进行宣撫，以期西部盟旗，不受德王的蠱惑。

巴文峻到达归綏（呼和浩特）后，邀我并帶了三个随員去百灵庙。在一个蒙古包里会見了德王，原来德王的通电虽然拍出去了，但是各盟旗的王公，有的在观望，有的因为不知道他葫蘆里卖什么药，疑心很大，因此大都不敢和他接触。就連近在咫尺的烏兰察布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德王三番五次去請，也沒有請到百灵庙来。这时，德王面临一个騎虎难下进退两难的处境。从我們到的那天算起，他孤单单一个人，已經呆了十八天了。

巴文峻对待自治的态度属于第一类，因为他不知道德王和日本人已經有了联系，当他看到德王的这般光景，在狹隘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竟面許帮助，从旁邀請云王出来。接着我們就到了云王府，会見了云王。看样子云王对德王的冒失很害怕，因此，一直未敢参与其事。云王表現害怕，可

以从他提出的两个問題加以証实。云王曾这样問过：

“德王所搞的自治，你們看有沒有可能？”

“我到百灵庙参加这一运动，会不会发生危險？”

巴文峻将內蒙古自治已經是当前不可避免的形势，以及国民党中央也不得不同意的道理，向云王作了詳尽的解释，并說和德王商量商量，也无多大关系。这样云王才轉变了看法，連日召开了几次全旗仕官會議，最后决定偕巴文峻一同来了百灵庙。云王到了以后，德王大喜，几乎每晚都和巴文峻計議，不多几天，果然出現了由云王領銜，再次要求自治的电报。国民党中央收到这个电报，参照上巴文峻的陆續反映，在內外不利形势的压力下，不得不提出一个百灵庙蒙政会全称是內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員会的方案。同时颁发了百灵庙蒙政会的組織条例，条例規定百灵庙蒙政会的管轄范围如下：①烏兰察布盟，②伊克昭盟，③錫林郭勒盟，④土默特特別旗，⑤阿拉善旗，⑥額济納旗，⑦察哈尔八旗。

一九三四年春天，国民党中央派黃紹竑、赵丕廉二人作为全体委員宣誓就职的监誓大員，来到了百灵庙，准备約日举行成立大会。可是当时德王对于这样权力有限的自治，并不滿意。因此在双方談判中，曾經发生过几場面对面討价还价的舌战，听說最紧张的是在大会成立头一天的夜晚，經過一帮蒙古人士劝說到深夜，德王才很勉强地接受下来。

百灵庙蒙政会的成立，給德王增加了进一步勾結日寇的資本，以这么大的一份重礼相送，当然为日寇所欢迎。此

后，日本的大批特务，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渗入了綏东四旗和烏兰察布盟，最远达到烏拉特中旗的黑沙图一带。

一九三六年綏东紅格尔图一战，傅作义的部队挡住了日伪軍西犯，但日寇的特务机关依然設在归綏、百灵庙等地，进行着挑拨离間的工作，暗中唆使德王在行政上、稅收上（主要是鴉片烟过境稅），和傅作义爭夺权利，糾紛不已。这种不正常的情況，一直延續了一年有余，对于綏远省的安全，給了严重的威胁。

傅作义理解到百灵庙蒙政会是产生麻煩的潜在根源，于是提出了一个鏟除祸根、扭轉不利局势的建議，其具体办法是，把百灵庙蒙政会根据省界划分为二。这一建議，很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的采納，一九三六年春天，便明令撤銷了百灵庙蒙政会，同时頒发了察境蒙政会全称为察哈尔省境内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和綏境蒙政会两个組織条例。条例的内容，除了地区和人員不同而外，其余如組織、职权、經費、設指导长官等方面，都大同小异。前者的会址規定在察哈尔省，后者的会址暫設在归綏。

事 前 的 活 动

实现这个分治的計劃，从当时來說，并不是很容易的。因为百灵庙蒙政会成立时，德王将若干大旗王公或者有些声望的王公、政客、青年，几乎一一网罗在内，这些人无疑是

倾向于德王的。因此摆在傅作义面前的难题，就是如何说服綏远省境内的蒙旗人士拥护分治。比如烏兰察布盟盟长兼百灵庙蒙政会委员长云王，就很不同意分治。因此，傅在酝酿分治之前，就分别派人做了一段工作，当时担负游說烏、伊两盟十三旗王公責任的是陈玉甲，爭取綏东四旗总管过来的人是胡凤山和鮑印璽，策动蒙古青年起来抗日反对德王的工作交给了巴文峻，阻止土默特旗青年继续投靠百灵庙的任务，交给了經革陈、任友耕，組織了蒙古文化促进委员会，吸收了不少蒙古青年进来。这样进行了一个时期，几方面的工作都很順利，基本上达到了預期的目的。

原来百灵庙蒙政会选拔委员时，出現了一个分配不均的缺口，即有的王公当上了委员，有的王公什么也沒有捞着，这部分一无所获的王公，难免有埋怨不平的情緒。针对这种情况，傅作义事先就向各旗王公作了如下的保証諾言：

1. 綏境蒙政会成立时，旗不論大小，王公不管賢愚，一律发表为委员。

2. 原在百灵庙有名義的王公，划入綏境蒙政会后，都給以升級。

陈、胡、鮑三人，就是拿以上的說詞打动了多数王公的。至于云王，既然因德王的关系不便参加，以后决定由其子沙拉布多尔济代替参加，这个抽梁换柱的办法，一則消除了分治工作上的阻力，一則也保全了云王的面子。

至于巴文峻策动蒙古青年抗日反对德王的工作，經過几

个月的秘密活动，結果也很順利。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在百灵庙蒙政会供职的中下級文职和軍事人員，多数是土默特旗的蒙古青年，一般都和巴文峻的关系不錯，于是巴文峻就以百灵庙蒙政会保安处科长云继先、朱实夫为目标，进行了长期的說服工作，当云、朱同意反对德王以后，巴文峻就帮助他們秘密策划进一步的行动。从云、朱本身來說，自日寇完全左右德王以后，他們的处境也很恶劣，日本人已有伺机逮捕他們的意图了。正在他們应付无方的时候，巴文峻給他們指出了一条出路。于是云、朱匆匆返百灵庙，准备举事。恰巧这时候德王又回西苏尼特旗和日寇議事去了，他們便乘德王不在的机会，于一九三六年一月末，发动了全体保安队八百多人，連同土默特旗和綏东四旗的全部文职人員，星夜离开了百灵庙，退到了武川县，并发出了一个有名的“冬电”。

这一突然的武装倒戈运动，彻底摧毁了德王多年苦心經營的軍事力量，使德王在名义上和实力上，再沒有呆在百灵庙的理由和借口了。因此德王不得不把会址迁到察哈尔的嘉卜寺。德王在这一打击之下，更加靠近日寇，和日寇的关系也就更加明朗，在日寇的直接支持下，紧接着开到百灵庙一部分軍隊，企图死灰复燃。直至一九三六年冬，傅作义派孙兰峰收复了百灵庙，才将德王在綏远省境內的势力，彻底鏟除干淨，才将綏境蒙政会成立的基础奠定下来，而各旗王公才敢云集归綏和德王分道揚鑣。

一九三六年五月前后，国民党中央发表了綏境蒙政会的

委員长、副委員长和全部委員的名单。名单和职务大致如下：

委員长：沙克都尔扎布（伊克昭盟盟长）。

副委員长：巴宝多尔济（烏兰察布盟副盟长），阿拉坦鄂齐尔（伊克昭盟副盟长），潘第恭扎布（烏兰察布盟四子王旗扎薩克）。

委員：图布升吉尔格勒（伊克昭盟郡王旗扎薩克），康达多尔济（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扎薩克），鄂齐尔胡雅克图（伊克昭盟扎薩克旗扎薩克），奇文英（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东协理），特古斯阿木古朗（伊克昭盟烏审旗扎薩克），葛拉增儒勒瑪旺吉勒扎木苏（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扎薩克），沙拉布多尔济（烏兰察布盟达尔罕旗扎薩克），石拉布多尔济（烏兰察布盟烏拉特前旗扎薩克），林庆森格（烏兰察布盟烏拉特中旗扎薩克），額尔济（烏兰察布盟烏拉特后旗扎薩克），齐密特林庆胡尔罗瓦（烏兰察布盟茂明安旗扎薩克），荣祥（土默特旗总管），达密林苏龙（察哈尔正黃旗总管），阿凌阿（察哈尔廂兰旗总管），額斯賀吉尔嘎拉（察哈尔正紅旗总管），巴拉貢扎布（察哈尔廂紅旗总管）。

随着人員的发表，傅作义指定荣祥为筹备处主任，胡凤山、經革陈、賀耆寿为秘书。大約在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成立了綏境蒙政会，会內設有主任、科长、科員等，全部職員总共有五、六十人。

綏境蒙政会設有五处：秘书处、民政处、保安处、教育处、实业处。另設有財務委员会、建設委员会。

所有处长，均由委員兼任，处长之下設主任（等于副处长），主任之下設科长二人。全部職員除由傅作义指定者外，其余由各旗王公推荐，这一下不論什么人，只要是王公的亲近，都担任了科长以上的重要职务，为此听說曾有过激烈的爭吵，最后还是平均分赃了事。

会后，王公們个个心滿意足，兴高彩烈地返回了各旗。会內只剩下少数不主事的下級職員来照料門戶，丢下了一个空架子。

王公們平空添了一笔額外的收入，当然滿腹高兴。就王公們彼此关系來說，会內的名义虽有大小，但平时大家都是王公、总管，各管一旗，地位一样，互不相管，各办其事，有誰敢违背反动政府的意图而热心会务呢。所以当时人們把这种双方滿意的情景，叫作“皆大欢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发，九月間侵华日軍前鋒，向綏远节节西犯，渐渐逼近归綏。当时綏境蒙政会的委員长沙王远在伊克昭盟，由代理秘书长荣祥携带了綏境蒙政会的印信，率領了部分在会的職員，离开了归綏，从包头渡黃河，經過达拉特旗王府輾轉由郡王旗进入了扎薩克旗，将印信交給了沙王。

这时德王通过达拉特旗康王的电台密碼，几乎每天和沙王都有电报联络，有些电报沙王和荣祥商量，有些电报沙王也不让荣祥知道。但是当德王伪蒙疆政府成立之前数日，日寇要派飞机来迎接沙王。沙王与荣祥計議，荣祥說：“您决不

能去归綏，您一被接去，德王和日寇就不会放您再回伊克昭盟了。”“不能回来”这句话，强烈地打动了沙王的心，沙王才断然下了不走的决心。在飞机到来的那天，沙王装病，以不能乘飞机为借口，向来人推辞。沙王装病装得很像，使德王派来那个姓胡的青年人，也认为这个病老头，确实不能坐飞机，只好把他的长子鄂齐尔胡雅克图拉走（鄂不久也逃回伊克昭盟）。

这件事虽已过去，但荣祥认为伊克昭盟的局面并不稳定，达拉特旗康王业已投日，准格尔旗的奇文英也参加了伪政权的成立会，沙王此后究竟如何打算，不得而知。因此，荣祥带着我及一部分蒙汉青年到了榆林。在榆林的阶段，德王曾派傅仁喇嘛带去亲笔信一封，劝荣祥返旗，荣祥当时没照办。日伪这一行动，表面上是请荣祥回去，而实质上则是为了争取伊克昭盟倒向他们。

一九三八年春天，綏境蒙政会指导长官公署参赞石华岩由西安到了榆林，和荣祥商量组织蒙旗抗日动员委员会，以后和大家商量，打消了成立新机构的原计划，提出了恢复整顿綏境蒙政会的意见，获得了国民党中央的批准。但是綏境蒙政会在归綏时的原班人马，大部分留在归綏了，有的已经投降了日寇，只有少数人员随荣祥、白海风退入了伊克昭盟。以现有的人力，机构原封不动是不行了，为此，石华岩和荣祥曾带了改组蒙政会的腹案和人事安排意见，到扎萨克旗请示过沙王，最后决定了改组，重新调动了人员，改组调

动的情况大致如下：

① 委员长沙克都尔扎布，② 副委员长阿勒坦鄂齐尔，③ 常务委员图布升吉尔格勒、荣祥、鄂齐尔胡雅克图，④ 秘书长荣祥（兼），⑤ 新补的委员：巴云英（烏拉特后旗女王）、奇俊峰（西公旗女王）、章文軒（鄂托克旗保安司令）、色登多尔济（杭錦旗协理），⑥ 以后又补胡凤山、經革陈、贺耆寿、白晋仓四人为委员。

此外各处的主任，也变动充实了一番，接着从榆林等地招徕了一批雇员，在扎薩克旗沙王府迤北建筑了一个简陋的会址，草草搭起了架子，招牌依然挂起来了，但在无数杂牌军队横行混乱的情况下，这个会实际上还是主不了芝麻大的事情。一个傅作义在伊克昭盟設的“达拉特旗組訓处”取銷的問題，嚷嚷了六年，毫无一点結果，“組訓处”反而日漸壮大，終于喧宾夺主。会内的大小职员，生活日趋腐化。

一九四三年春天，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发生，綏境蒙政会被陈长捷的军队摧毁，人員死的死，逃的逃，一切设备等等，蕩然无存。这个会义等于没有了一般。直至当年秋天沙王返旗，才又恢复起来，但当初的一切，已零落不全，越发成了一个徒有虛名的机构了。

一九四四年沙王逝世，委员长一职，由郡王旗的图王递升，秘书长也由巴文峻接充。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巴文峻建議将会址迁到烏拉特前旗的公庙子，苟延残喘到一九四九年綏远省解放为止。

德穆楚克棟魯普与日本 帝国主义的勾結

哈斯瓦齐尔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在百灵庙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蒙政会）任参事厅参議，这时期来了以中島万藏为首的三个日本人，还有一个蒙古人陶克陶，他们就住在蒙政会接待包（那时百灵庙房屋很少，蒙政会成立，办公、接待客人，設了许多蒙古包），行动有些詭秘，对外說是旅行者，其实他們是和德穆楚克棟魯普（德王）进行勾搭的。中島万藏等三个日本人都懂得些蒙文蒙語，說是福隆阿的徒弟。福隆阿是察哈尔太仆寺左翼旗人，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委員杭錦寿的二儿子，一九二九年春，經駐张家口日侨盛島的介紹，去日本东京教过书（福隆阿任大阪外国語学校蒙文教授）。

一九三五年八月間，曾經任过国民党内蒙古党务指导委員的喀拉沁蒙古人金永昌（勛卿）乘飞机到了百灵庙，說是多伦特务机关的，就和中島等会合，大肆宣传日本帝国主义

的“德政”。說日本如何幫助宣統在東三省成立了“滿洲國”，西蒙也要找出路，日本是東亞的“先進國家”，如何“熱心”幫助蒙古人“獨立”“進步”云云，一片鬼話。金永昌是以日本特務機關人員的高級說客的面目出現的。

這時日本人的飛機、汽車往來頻繁。察哈爾明安旗代理總管、蒙政會委員尼瑪鄂特索爾（冠洲）也到百靈廟訪問德王來了，他住在我的宿舍，曾對我說：“德王要借日本勢力另搞自治政府。這樣做法，對不起民國。要搞也得經中央政府的許可，才算合法。”接着說：“你以為如何？”我也回答說贊同他的看法，不幾天他就回去了。

一九三五年十月，蒙政會召開了全體委員會會議。除在伊克昭盟和阿拉善特別旗的委員未到外，在錫林郭勒盟、烏蘭察布盟、察哈爾盟和土默特特別旗以及在南京、北平的委員差不多都出席了會議。在會議期間，日本特務機關人員以陶克陶出面游說，慫恿德王在大会上提出聯日搞自治政府的方案，要大會通過。南京來的以吳鶴齡為首的大多數委員，認為為時尚早，不可冒失，作為罷論。會議結束後，我請假乘卓特巴扎普（世海）委員的汽車回家去。途經四子王旗西拉木楞廟、錫盟蘇尼特右旗“德王府”，這才眼見到“德王府”已經建立了日本特務機關和“善鄰協會”，證明德王已經和日本帝國主義勾結起來。卓特巴扎普也已經同多倫的日本特務機關和日偽走狗李守信有了勾結，並且秘密接收了日本的槍支彈藥與軍餉，秘密發給各旗保安隊。還聽說他家里住有

一名日本特务，作联系活动。卓特巴扎普也派了一名人员住多伦为联络员。

伪察哈尔盟公署的成立

一九三五年冬，日伪军李守信部从多伦发动攻势，进占了察哈尔北部张北、宝昌、沽源、化德、尚义、商都、崇礼等县城。伪军司令部设在张北，日本特务机关也建立起来。这时察哈尔省明安旗总管、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委员、百灵庙蒙政会委员、察哈尔左翼蒙兵游击队总队长、察哈尔蒙旗保安长官中将卓特巴扎普，利用职权，调动了正蓝、厢白、正白、厢黄、明安、太仆寺左翼、太仆寺右翼、商都等旗的保安队，响应了李守信，在日本顾问指导官的指挥下，分别进驻到上述各地。从此锡林郭勒盟十旗和察北各旗县便成为沦陷区域了。

我正在正白旗准备在家过冬，打算过年后再去百灵庙，不意旗公署总管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派我为代表赴德王府参加各旗长官会议。当即准备行装，会同另一名为首的代表佐领德勒格尔吉雅，骑骆驼前去。时逢大雪灾年，顶风走了七天，好不容易才到达苏尼特右旗会见了德王。这时会期已过，各旗长官因为交通不便，多数未能如期到会，会也未开成。到会的有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白云梯、蒙政会保安处长补英达赖、察哈尔右翼厢红旗总管英登格、厢蓝旗代表佐领孟兆义等在德王府。这时已经是腊月二十三祭灶的日期了。晚上

通知察哈尔各旗的代表，将乘飞机到张北参加新盟公署成立。第二天早晨乘飞机走的有白云梯、蒙政会秘书赛吉尔乎（丁我愚），所谓察哈尔各旗代表只是英登格、孟兆义和我三人。飞机上还有中島等三个日本人。到了张北，李守信派人迎接我们住到他的司令部。当天白云梯、赛吉尔乎、中島等搭汽车经张家口往北平去了。我们三个人就在张北等候盟公署的成立。翌日会见了卓特巴扎普，他和一个日本顾问天古里者同住一间房子，见了我们说：“你们来的好，我已经把你们的名单开给顾问了，看顾问派什么差事罢。”我们私下商量，谁也不愿干，知道我们没有好位置，也有些不满意日本人的跋扈，决定还是回“德王府”好一些。

我们会见了李守信，他说：“你们是德总司令左右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就是一家人。”并说些恭维德王的话，就派他的副官长招待起我们来。到此我们才知道，日本人以李守信部为骨干，已经内定德王为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为副总司令，组织伪蒙古军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牌子已经在张北悬挂起来。

阴历腊月二十八日，伪察哈尔盟公署在张北宣告成立。盟长就职典礼上，参加的有德王、李守信、卓特巴扎普、察哈尔右翼正黄旗总管达密林苏龙、厢红旗总管英登格、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达尔罕郡王郭尔卓尔扎布，以及所谓各旗代表来宾等多人。会上由日本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久宣布任命卓特巴扎普为察哈尔盟盟长，达密林苏龙为副盟长。厅长

一級宣布了一些日本人，名单沒有記清，任命狀是以蒙政会名义发表的。那时沒有准許吳鶴齡和尼冠洲等参加典礼。陶克陶这时是德王的机要秘书，我看見他不离德王左右，并且和德王交头接耳地不知說些什么，德王摇头摆手，好像不肯答应的样子。時間不早了，德王从会場上搭拉着臉出来，匆匆搭原机飞回去了，与会人員也紛紛散去。

第二天百灵庙蒙政会財政委员会主任包悅卿帶了許多職員由北平到了張北，李守信備了一輛客車，把我們和包悅卿等人送到了“德王府”。听說張北來了一份報告，臘月三十日吳鶴齡、尼冠洲二人由張北縣去張家口途中，在猴儿山地方，被土匪打死了。但是吳鶴齡已經到了“德王府”，人們正在詫異，惶惶不敢聲張。不久証實尼冠洲是被刺死了。原來在張北偽察哈爾盟公署成立當時，日本張北特務機關唆使德王公開宣布吳、尼二人反蒙罪狀，執行槍決，但德王沒有答應，當即密令郭爾卓爾扎布陪同吳鶴齡搭王府的隨從汽車回到“德王府”，尼冠洲是卓盟長的心腹，德王認為卓盟長可能庇護他，不料尼冠洲的家在張家口，他要回家過年，日本特務借此機會，假裝宋哲元的保安隊，擋路阻車以進行檢查為名，認准尼冠洲即開槍殺死。因為吳、尼二人為首，在百靈廟會議上破壞了日本人的計劃，會后他們到了南京活動，尼冠洲當了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請命于南京政府，內定吳鶴齡為察哈爾盟公署秘書長，由于這種活動和日本帝國主義發生了矛盾。至此，是偽察哈爾盟公署完全操在日本人手里的一步。

伪蒙古軍总司令部的成立

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伪蒙古軍总司令部在“德王府”宣告成立了。德王在日本关东軍司令官代表軍官的主持下，宣誓就了总司令职。参加就职典礼的，有苏尼特右旗日本特务机关长浅海，还有几个日本軍官和顧問。蒙古人方面，有外蒙古逃亡活佛迪力瓦呼图克图和补英达賴、特克希卜彥（王宗洛）、阿勒坦敖其尔（金永昌）、郭尔珠尔扎布等人。那时吳鶴齡是等于被軟禁而未能参加。

总司令部下設有政务部，德王兼部长。設有軍事部，李守信兼部长。特克希卜彥任軍事科长，阿勒坦敖其尔任內务处长，郭尔卓尔扎布任教育处长，补英达賴任办公厅主任。处以下設有各科，也发表些科长、秘书級人員，但人数不够。这时正是大雪成灾，交通梗塞，所有的人連烧吃都发生困难，工作不能开展。在总司令部的架子还未完全搭成之际，忽然百灵庙蒙政会保安总队长云继先等，不滿德王投日活动，率領全部武装，反正到綏远省去了。蒙政会秘书吉尔嘎郎乘乱抱了印信逃到云王府（云端旺楚克是蒙政会委員长）告急轉报德王，大部分东蒙及錫盟籍職員，还留在百灵庙維持残局。德王聞訊后，急調李守信騎兵一連去百灵庙駐防。南京政府借此机会，撤銷百灵庙蒙政会，改組为綏境蒙政会和察境蒙政会，綏境蒙政会在綏远宣告成立。德王对此大不滿

意，表面上接受改組察境蒙政会的命令，实际上却进一步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时德王正一方面利用察境蒙政会名义联系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又利用伪蒙古軍总司令部名义联系日寇。那时南京政府任命原百灵庙蒙政会副委员长索特那木拉布丹（索王）为察境蒙政会委员长，德王为副委员长。

伪蒙古軍政府的成立

一九三六年春，村谷彦治郎、安斋等一批日本顧問来到德王府，分配到各部門工作。又日本关东軍司令部派田中參謀乘飞机来到德王府和德王及有关人員商妥，召开西蒙各旗王公代表會議，商議成立伪政府事宜。对于吳鶴齡认为有了誤会，解释了事，恢复其自由，令他筹备大会事宜。决定以錫林郭勒盟烏珠穆沁右旗“索王府”为會議地点，于是分头派人通知，派汽車迎接伊、烏、察、錫盟各旗王公、总管等。另一方面又派出日蒙職員到烏珠穆沁右旗做會議准备工作。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所謂烏珠穆沁會議開幕了。参加會議的主要有：錫林郭勒盟盟长、烏珠穆沁右旗扎薩克亲王索特那木拉布丹，副盟长苏尼特右旗扎薩克亲王德穆楚克棟魯普、阿巴嘎左旗扎薩克郡王布达巴勒，阿巴嘎右旗扎薩克郡王雄諾敦都布，浩齐特左旗扎薩克郡王松津旺楚克，苏尼特左旗扎薩克郡王林沁旺都特，烏珠穆沁左旗扎薩克郡王道尔吉等十旗扎薩克貝子、貝勒等人物；察哈尔盟盟长、明安旗

总管卓特巴扎普，厢黄旗总管穆克登宝，厢白旗总管贡楚克拉什，正蓝旗总管音都尔布迪，商都旗总管特穆尔博罗特，正白旗总管图木尔巴图代表副参领恩克巴彦，太仆寺左翼旗总管色仁那木济勒，右翼旗总管诺尔布扎那等人物；乌兰察布盟盟长达尔罕旗扎萨克亲王云端旺楚克代表贝子沙拉布多尔济为首的六旗代表；伊克昭盟盟长扎萨克旗亲王沙克都尔扎布代表那顺鄂其尔为首的七旗代表；綏东察哈尔四旗厢蓝旗代表孟兆义。其他各旗没有派代表来的，由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指定职员数名为代表，其中指定我为正黄旗代表，就是这样东拼西凑冒名顶替。王公代表会议主席团，由索特那布拉布丹、德穆楚克栋鲁普、卓特巴扎普、补英达赖、郭尔卓尔扎布、沙拉布多尔济、那顺鄂其尔、吴鹤龄等人组成，推定吴鹤龄为大会秘书长。会议是在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的操纵下进行的，他在大会开幕典礼上代表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致贺词，宣布了“日蒙提携”的政策。说什么“成吉思汗子孙，多年来受了汉人的压迫，大日本帝国政府体念蒙古民族的落后，要帮助蒙古独立进步，以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等语。在宴会上他又说：“满洲国兴安北省（呼伦贝尔）省长凌陞私通外蒙古被皇帝枪毙了。”以此来吓唬参加会议的王公代表们，大家听了毛骨悚然，面面相觑。这个会议是西蒙王公集体投降的会议，一切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了。

会议期间，德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将来俄国人以外蒙古人当作炮灰，日本以内蒙古人当作炮灰，那时内外蒙

古之間被迫打起仗来怎么办？召集了与会人們，在一个晚上討論起来。大多数人主张我們不干这事。后来田中隆吉向大会說：“我們大日本帝国的兵有的是，不会有这样的事。俄国人那就不一定了。你們放心吧。”这总算是解除了人們的顾虑。后来“諾門汗事件”証明，田中說的純粹是謊話。

會議通过了伪蒙古軍政府組織法，以云端旺楚克为伪蒙古軍政府主席，索特那木拉布丹和沙克都尔扎布为副主席，任命德穆楚克栋魯普为总裁，补英达賴为办公厅主任，吳鶴齡为参議會議长，决定嘉卜寺(化德县)为建立政府的地点，改設額尔德木索雅勒图浩特（“德化”市），开始用成吉思汗紀元七三一年的年号，以蓝地紅黃白条旗为伪蒙古軍政府旗帜，會議命名为“第一次蒙古大会”，开了七天宣告閉幕。

伪蒙古軍政府的成立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伪蒙古軍政府在“德化”宣告成立。在成立典禮上，日本“德化”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代表关东軍致詞作賀，伪滿洲国派来駐蒙古代表于春，代表伪滿洲国宣讀傀儡皇帝溥儀的賀电，会上特別宣布使用成吉思汗紀元年号，并悬挂新政府旗帜。日本顧問来了一大批，由伪滿調来蒙古軍政人員一批，充实了伪蒙古軍政府和总司令部。在“德化”开辟了飞机場，日寇的进一步侵略活动愈益加紧了。

伪蒙古軍政府設主席秘书处，由赛吉尔呼（丁我愚）任处长，內务署由阿拉坦敖其尔（金永昌）任署长，軍事署由特克希卜彥（王宗洛）任署长，財政署由吉尔嘎朗（德古来）任署长，教育署由郭尔卓尔扎布任署长，司法署由特穆尔博罗特任署长，交通署由于兰斋任署长，交际署由陶克陶任署长，实业署由王某任署长，署以下設有二至三科不等。額尔德木索雅勒图市（“德化”）由张子荣任市长。各署分配日本顧問各一名。軍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武装力量，所以伪蒙古軍总司令部为軍政府的一部分，任命李守信为总司令，仓都仁（包海明）为参謀长，不久改任烏古廷为伪蒙古軍总司令部参謀长。总司令部建制应有尽有，人員也配备就緒了。以浅草为首的日本軍事顧問多人也配备好了。开始建立第一、二两軍，第一軍李守信任軍长，以其所部扩編为六个騎兵师，第一师刘继广任师长，第二师尹宝山任师长，第三师王某任师长，第四师宝音德勒格尔（費廷）任师长，第五师伊恒額（紹光）任师长，第六师宝音烏勒吉（毛林庙活佛）任师长。第二軍德王兼軍长，从錫、察两盟征兵两个师，由东蒙招募一个师編成：第七师，穆克登宝任师长；第八师，包悅卿任师长；第九师，布达巴拉任师长。从軍部至連部都配有日本顧問、指导官、教官等来監視和指揮。軍費和武器，均由日本关东軍供給。伪軍政府在半年多的時間里，积极招兵买馬，訓練部队，充实武装力量。軍备大致就緒，就开始活动。当年十一月間，由于百灵庙蒙政会还有一部分職員在那里支持門面，有李守

信的一連人駐防維持。德王不願放棄百靈廟這一攤子，就調動第七師穆克登寶部騎兵三個團前往接防。不料穆克登寶到了百靈廟還未站穩，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即派兵攻擊了穆師。這個師剛成立不久，未經訓練的兵馬，一接火就潰逃了。百靈廟日本特務機關聞訊逃跑，師長顧問狼狽逃出，收拾散兵敗將，退到四子王旗西拉木楞廟歇腳。“德化”偽軍政府聞訊後，日本特務機關從綏東急調漢奸軍王英部，用汽車經“德化”星夜送到西拉木楞廟增援，會合了穆師準備反攻。不料王英部的金憲章團長反正，殺了日本顧問二十餘名，繳了穆師的全部武裝。穆克登寶只身逃出，蒙古兵傷亡也不少，不過被俘的都釋放回來了。穆克登寶殘部逃經德王府回察哈爾盟休整。由於日本軍事顧問都被殺死，“德化”特務機關長田中隆吉暴跳如雷，要追究穆克登寶問罪。後經生還的一個日本顧問證明，這是反攻百靈廟總指揮官小濱大佐誤听了金憲章的離間計所致，穆克登寶被撤職才算了事。

時逢“西安事變”，蔣介石被張學良、楊虎城扣留。德王、吳鶴齡等事急生智，乘機向南京政府以察境蒙政會名義告了傅作義一狀，說“傅作義又無故進攻百靈廟，有意製造蒙漢糾紛。目前蔣委員長被難之際，我方情願停火，以待中央裁判”。南京政府回電贊同，說“已命令傅作義部停止前進，如果傅作義不聽中央命令，政府保打傅作義，你們放心”。這事才告一段落，平息下去了。由於此舉失敗，日本關東軍撤換了田中隆吉。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成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沟桥事变暴发了。綏远省傅作义部进攻了尙义县的伪蒙古軍，伪軍第二师尹宝山敗退下来，形势紧张，“德化”伪軍政府乱作一团，仓皇逃到多伦县，“德化”被石玉山部克复。由于日本軍出古北口經多伦、张北，从背后进攻张家口，二十九軍刘汝明部不支撤退，日軍得势，順平綏綏向西进攻，大同、綏远、包头相继陷落，伪蒙古軍配合起来，从张北、康保反攻尙义、“德化”，向西推进到綏东綏北各县直到固阳，伪蒙古軍政府随即移至归綏市，召开了所謂“第二次蒙古大会”，通过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組織法，以云端旺楚克为联盟自治政府主席，沙克都尔扎布、德穆楚克栋魯普为副主席，当年冬，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綏远宣告成立。同一时期，日本人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南自治政府，以于品卿任伪主席，在大同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以夏恭任伪主席。三个自治政府之上，在张家口設立了所謂蒙疆联合委员会，为統一指导机关。日本人金井章二为首席最高顧問，三个自治政府听命于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听说日本蒙疆駐屯軍司令官直接任命德王为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委员长，德王对此不满。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設有政务院，德王兼院长。有参議会，吳鶴齡任議長。此时吳鶴齡被派到日本东京受訓去了。

政務院以下設有總務部，陶克陶任部長，保安部特克希卜彥任部長，財政部吉爾嘎朗任部長，主席秘書處，賽吉爾呼任處長。總務部總務處，圖木爾巴塔爾（劉定一）任處長，內務處李丹山任處長，教育處哈斯巴圖爾任處長，因未到任由陶克托胡（立賓）繼任，翻譯處扎拉嘎穆吉（白景奮）任處長。財政部財政處烏勒吉圖（張子明）任處長，稅務處巴雅爾（吳相文）任處長。保安部警務處昌都冷任處長。以下職員分科長、理事官、專任官、秘書官、屬官參議、“囑托”等等級。設巴彥塔拉盟，補英達賴任盟長，察哈爾盟，卓特巴扎普任盟長，烏蘭察布盟，雲端旺楚克主席兼盟長，伊克昭盟，沙克都爾扎布副主席兼盟長。由於伊克昭盟是非淪陷區，投到偽方來的杭錦旗郡王阿拉坦鄂齊爾任副盟長，在包頭設有辦事處來支持偽盟公署。歸綏改為“厚和市”，賀秉溫任市長，包頭市劉繼廣任市長，盟一級機關設有總務廳、民政廳、警務廳等單位。

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設有顧問部，日本人羽山為最高顧問。日本顧問又來了一大批，分配到各部各盟者叫顧問也叫輔佐官，把持一切事務，凡公文稿件先經顧問、輔佐官考核，然後送給偽蒙漢官吏畫押，只是畫押而已，誰也不敢提出異議。

一九三八年春，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主席雲端旺楚克年老身故，七月間召開了所謂“第三次蒙古大會”，以德王為主席，李守信為副主席。這次本應以卓特巴扎普為副主席，

會議认为李守信的武功大，运动卓特巴扎普送李一万元，来换取副主席伪职，卓不干。伪联盟自治政府机构有所改革，人事也有所更动，增設畜产部，郭尔卓尔扎布任部长，內設畜政处，哈斯瓦齐尔（萧佩玉）任处长，牧野处，米吉道尔济（黄葆庆）任处长，保安部因特克希卜彥調任駐日代表，由雄諾敦都布任保安部长。設家畜防疫处，柏五郎任处长。日本顧問增加了一倍，有部长級顧問、处长級輔佐官以及日本職員也配备起来，进一步控制着各部門职权。成立了所謂經濟監視署，有日本人专管，实行了粮食、畜牧业的統治与掠夺。烟稅、盐稅等各种稅收，名目繁多。每年征购軍馬官牛成千上万。所有伪蒙疆政府管轄区的蒙汉人民，都遭受了亡国的无比痛苦。

文化侵略方面，在各級学校，設日本教官，上日本課。每年派一批学生到日本、伪滿去留学，加紧殖民地化的活动。三个伪自治政府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統統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什么主席、部长、处长，只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敗类罢了。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

一九三九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統治所謂蒙疆地域，将蒙古、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于当年九月一日在张家口宣告成立。同时召开了

旗县长會議。以德王为主席，李守信、夏恭、于品卿为副主席。卓特巴扎普任政务院长，吳鶴齡任參議會議長，金井章二任最高顧問，补英达賴任最高法院院长，刘继广任最高檢察厅长，李守信兼任蒙古軍总司令官，政务院总务部日本入关口保任部长，民政部松津旺楚克任部长，治安部丁其昌任部长，司法部陶克陶任部长，財政部馬永魁任部长，产业部杜运宇任部长，交通部金永昌任部长，鐵道部穆克登宝任部长，牧业总局郭尔卓尔扎布任局长，电报局愚勒布图克其任局长，兴蒙委员会松津旺楚克任委员长，吉尔格朗·超克巴图尔（陈紹武）任副委员长，主席府秘书处朝克巴达尔夫（陈国藩）任处长。

这次大改組的結果，日本人以正式官吏出現。除顧問外，有部长、次长、处长、局长、技正、技佐等职，不是日本人担任，就是派留日生为骨干。所有德王的主要人員分散到各部任参事官。伪政府之上設立了日本帝国政府兴亚院聯絡部，日本軍司令官和兴亚院聯絡部长官，是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两个太上皇，一切听命于它們而行事。

一九四一年七月，最高顧問金井章二被調回国。米了一个大桥忠一接任最高顧問。吳鶴齡从日本回来了，德王要任命他为政务院院长。运动卓特巴扎普，以允許他的儿子承袭其总管职位为交换条件，調卓特巴扎普任參議會議長。德王要求宣布“內蒙古自治国”，但此时汉奸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所謂“国民政府”，日本人曾派李守信为“蒙疆”代表和汪精卫

代表在青島會談，承認“蒙疆”地域是偽國民政府管轄下的自治政府，不能獨立成國。為了敷衍德王，大橋忠一對內宣布改稱“蒙古自治邦政府”，並且說不能對外宣布，對外還是用聯合自治政府的牌子。這個政府苟延殘喘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與日本帝國主義所謂大東亞戰爭的可恥失敗宣布無條件投降而同時告終。

（政協錫林郭勒盟委員會供稿）

回忆在伪蒙疆政府时期

奇 天 祥

伪蒙疆政府的产生，同伪满洲国一样，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满蒙政策的排演，牵线人自然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傀儡的主角是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吴鹤龄辈。自命为成吉思汗继承人的德王，早有分裂祖国独树一帜的活动。他以内蒙古民族的“自治”、“自决”来标榜，不论在“百灵庙自治”时期，“德化军政府”时期或归绥的“蒙疆政府”以及流亡到阿拉善旗的“自治政府”时期，都是这种罪恶活动的再版。他使内蒙古人民在日寇和反动派的刀光血影里受了十多年的灾难。

德王最得意的时代，莫过于日寇纵横于祖国的大片土地上奴役中国各民族最黑暗的时代。这时伪蒙疆政府拥有：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伊盟仅有准格尔旗一部和达拉特旗一部）以及一九三九年合并的晋北和察南两个傀儡政权为大同省、宣化省、张家口市。人口六百万，其中蒙古人不足三十万。这个伪组织是完全靠日本的刺刀来维持的，不仅在外貌上由“皇军”保护，

在骨子里也須仰仗“皇軍”配备一套人馬，才能組織成这个庞大的傀儡机构。

伪蒙疆政府的各个单位和机构内，有数以万计的日本人官吏，他们完全控制着每一个机构的军事、政治、经济、组织、人事等实际大权。伪蒙疆的大小蒙汉官吏，都仰承日寇的鼻息。一九四一年春天，我和森盖林庆（当时我是伪伊克昭盟警察第一大队长，森盖是第二大队长）到张家口伪治安部（后改内务部）报告工作时，发现除部长丁其昌和几个点缀品似的蒙汉职员外，几乎四百多名职员都是清一色日本人。自然所用的公文，都是日文。我吃惊地盘问一个蒙籍职员：“你们怎样做工作？”他笑了笑说：“我们没有什么事可作，这里都是日本规矩！”在招待我们的宴会上，日人武内次长向我们解释：“蒙古是个小孩，非有大量日本人帮助不可，等到蒙古成了大人，日本人自然要交给蒙古人的。”一旁坐的丁其昌不住点头哈腰连称：“对！对！对！”

日本人也经常对我宣传：“我们一定要帮助蒙古人独立，现在首先要培养很多蒙古官吏。”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确实培养了一批善于窥测主人心意、奴颜婢膝以适应他们所需要的“才干之士”。

日寇刚侵占绥远，伪蒙疆政府宣布在归綏（日伪改为厚和特别市）成立，迫使各蒙旗王公来庆祝“大典”，那是最热闹的时候。一九三七年冬天，在沦陷区的各盟旗王公，都提心吊胆地出席了这个会议。只有伊克昭盟因黄河沙漠的天

然条件，日本的势力达不到。因此由各地败溃的国民党軍数万人馬都相继逃入伊克昭盟地区。伊克昭盟王公也动摇于两者之間。日伪方面却尽量在伊克昭盟各旗活动，爭取上层分子“归順”。当时准格尔旗負实际責任的是东协理代理扎薩克奇文英和西协理奇凤鳴，他們两个也同来归綏庆賀“大典”。

奇凤鳴是我叔父。他早在德王搞百灵庙自治时期就和德王有联系，同时，他还到百灵庙一次，表示过拥护云王、德王的“自治运动”。后因綏省主席傅作义的压制，才沒敢妄为。这次他去归綏，我家正好住着由綏远逃亡出来的国民党綏远省党部委員陈国英，陈对我叔父赴綏投向日伪却表示了諒解。他向我說：“处于你們这个环境，和日本来往是对的。”他似乎还称赞我叔父的投日是英明呢。

那次到归綏庆祝“开国大典”，伊克昭盟七个旗中，仅有准格尔旗两个协理、达拉特旗的森盖林庆、杭錦旗的阿拉坦鄂齐尔（伊克昭盟副盟长、杭錦旗的王爷）。但阿王因为在百灵庙自治时期，仅得一个实业处长的位置，异常不滿，以后他就向傅作义靠攏，同伊克昭盟盟长沙王搞起一个“綏境蒙政会”，这次他投机去归綏，就受到伪官吏的打击，最后甚至禁止他回旗，在包头設立下伪伊克昭盟公署，名义上他是代理盟长，实际上形同軟禁。

日伪对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很重視，特地由包头特务机关派了一架专机，由日本特务内田等亲去扎薩克旗迎接。沙王婉言拒絕，只派了奇文卿等几个代表。沙

王不去归綏，打破了日伪不战而“收复”伊克昭盟的計劃。特别是打击了日伪方面“策士”的預料。吳鶴齡（当时是最高参議）老羞成怒，对沙王的代表們大罵：“你們沙王爷一直想搞垮百灵庙的自治，所以得到蔣介石数十万元的收买，就同几个出卖民族的王爷在綏远又搞了一个綏境蒙政会，打算分裂蒙古民族的团結。今天我們在‘皇軍’的帮助下，已成立了蒙古人自己的政府，你們还想看风头，过几天收复了伊克昭盟，看你們王爷往哪里跑！”

伪官吏的下馬威，打击了目击当时情景的准格尔旗两个协理奇文英和奇凤鳴，他們又看到日伪处处威吓和傲慢，尤其在大会場外，“皇軍”的坦克、大炮肆威，更使他們惊心动魄。不久他們就悄然返旗了。但沙王还是派了他旗内章京（加克尔齐）僧格林沁代表自己常住在包头的伪伊克昭盟公署，担任了會計科长，一直到僧格林沁在包头逝世。沙王对日伪藕断絲連的应付，受到了抗日陣营内青年們的反对，沙王不得已宣布撤銷了僧格林沁在旗内的章京职务，对大家表示了抗日的决心，但在另一次扎薩克旗會議上，又秘密提升僧格林沁为西协理。我叔父奇凤鳴也同样是阴阳两面，一面让我和駐扎在我們附近的国民党軍打交道，一面又密令我們保安第一大队长黃俊德和日伪联系，爭取主动。

吳鶴齡吹噓用武力“收复”伊克昭盟的話，倒不是无的放矢。就在一九三七年冬末，由伪蒙軍总参謀长烏古廷指揮第八师等騎兵猛扑东胜县，准备一举攻克伊克昭盟的中心地，以

便控制和威胁伊克昭盟各旗“归附”(因伊克昭盟受黄河沙漠的阻隔,不利于机械化部队的行动,日軍未出动)。但他們的如意算盘打錯了,不仅东胜軍民有抗敌御侮的决心,就是扎薩克、郡王两旗也有敌愾同仇的認識,在敌伪軍围攻东胜正紧张时,遭到扎、郡两旗保安队腰击,致使伪蒙軍大敗潰折,此役几乎活捉烏古廷。从此,日伪軍再沒敢深入伊克昭盟腹地。旋吳鶴齡也被他的政敌陶克陶打击,东渡日本学日語去了。

我叔父阴阳两面的应付,給准格尔旗带来很大的灾难,国民党軍队在我們統轄地区愈聚愈多,番号也极为复杂,我是和这些抗日“英雄”們打交道的,但是有应酬不暇之势。他們要粮要草要大烟,可以說无所不要,至于抗日不抗日倒与他們无关,甚至他們很直爽地說:“这里不好,到那里去(指归日伪),反正有枪杆子就有办法。”两年后,大汉奸王英东山再起,由天津到包头成立“綏西联軍总司令部”,并派他的爪牙到伊克昭盟作广泛的活动,而这些抗日軍大多数投入王部(計有烏青云、陈秉义、王拴子等)。

这些抗日“英雄”,都是所謂“国軍”,他們蹂躪地方,压迫蒙汉人民,同我們准格尔旗的保安队的摩擦,也日甚一日。別的不說,只說一件“侮辱国旗”事件吧,有一天“国軍”忽然要升旗了,并且命令保安队也照样去做。保安队当然不明白弄这些玩艺儿干什么。既然“国軍”有命令,为了彼此友好吧,就照章执行,派了个弟兄,看一看国旗的样式和人家升旗的举动,这位魯莽的年輕兵,将青天白日国

旗的十二个月牙，数成了十四个，回来照样用紅布縫制了一个，裁起高杆举行起升旗典礼来。但不会唱国民党的党歌。这些天真的保安队认为反正是唱一下歌，扯起旗来就算，大家站起队来，唱了一阵哥哥妹妹的山歌，将国旗升上去。事被“国軍”偵知，就来兴师問罪，保安队也不甘示弱，恶語回复，最后索性将国旗扯下，一火焚之。这种举动，严重地藐視了爱护国旗的“国軍”的尊严，指着保安队队长質問：“你是不是中国人？”但是落后的保安队长，連这种最浅近的知識也沒有，他回答：“不是，我是个蒙古人。”“国軍”軍官又問：“难道蒙古人不是中国人嗎？你不知道五族共和嗎？”說实話，当时的准格尔旗軍民，地处偏僻，落后保守性很大，許多常識确实不知道。

在我叔父被馬占山部白三閻王（白凤翔）所执而自杀以后，我借口收容保安队，乘机跑到准格尔旗河北岸地区（是准格尔旗一个区，現划入土默特旗），收罗我叔父統轄下的保安队五百多人（虽然和白打了一仗，但人馬武器损失并不大），通过一次形式上的选举，我由一个挂名的上尉參謀成了保安总队长，继承了我叔父的实际权力（只是缺少一个法定的协理委任），我从此当了日伪的帮凶。

恰巧这时伪伊克昭盟公署派了一个日本人心亥，代表伪伊克昭盟公署来准格尔旗宣慰，他认为我率土来归，是与他的“宣慰”分不开的，就建議我去包头，由他一力承担我的“要求”，于是我“名正言順”地成为准格尔旗协理兼保安总队长。

是年夏末，伪蒙疆政府在归綏召集各盟旗县的王公开会，主要商議晋北、察南两个傀儡政府和伪蒙疆政府合并的問題，我算是王公代表，另派第二大队长奇庆林为准格尔旗的“人民代表”，参加了这次會議。

會議是由德王主持的，他是伪蒙疆政府的主席兼政务院长（这时云王已死）。

德王自从利用日本的刺刀登上主席宝座后，自己尽量扮成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救世主”，在三个傀儡政府合并以后，他还向駐蒙疆日軍司令官蓮沼中将提出要求：希望“皇軍”协助，将伪滿所属的呼伦貝尔、昭烏达、哲里木等几个盟划入伪蒙疆政府。蓮沼很幽默地說：“滿洲国是蒙疆政府最亲密的盟邦，目前还不宜有此交涉，‘皇軍’赫赫战果，不久就会結束在支那的战役，那时‘皇軍’就会替您收复外蒙，您就是全蒙古的大皇帝了。”（此語系日軍駐薩拉齐县部队长山崎英次大佐亲自給我說的）

三个伪政权的合并，領土虽然增多，可是大批大批的日本人也来了，塞滿各个单位，控制得更加严格，将“立国”“有功”的蒙古中下級官吏一下排挤出去，不少人成了領于薪的伴食之官，他們无油水可揩，仅靠工薪是不够揮霍的，虽然当时物价还没有飞涨，可是这些人一般都有打牌、吸大烟的嗜好，在他們手头拮据时，也要对景伤情，发两句牢騷。

但是日本人的权力并不因这些人“抱屈”而有所抑制，

反又将李守信的基本部队一、二、三三个师全改編成“靖安警备軍”（武装警察队），伪蒙軍只有四、五、六、七、八、九六个师了，而这几个师并非李的嫡系，全是純蒙古人編的部队，他的基本人馬隶属于治安部，但充滿日本指导官，控制着組織、人事、財政、指揮大权。李守信虽然是伪蒙政府副主席兼伪蒙軍总司令，但无权統率其嫡系部队。好在这个胡子头儿，爱的是玩姑娘、抽大烟，只要滿足了他的荒淫享受生活，其它也不計較了。

我帶的准格尔旗保安队既然归順了日伪，日本人当然要进行改編和教育一番，以显示“皇軍”恩威并用。一九三九年十月，伪伊克昭盟公署警务厅派来日人杭錦科长等七、八人，准备着手改編我的保安队。几經磋商，确定了保安队的精銳（年輕力壯无嗜好者）全改編成伊克昭盟警察第一大队，由我担任大队长，分四个中队，共計四百六十人。但这个警察大队，不是行政警察，而是武装战斗警察，以警察官的肩章：警正、警佐、警尉补、警长、警士来排列，所負的任务是替日本人打前鋒卖命。

警察队全部給养，上面供应，留下一部保安队，算是維持准格尔旗河北岸一隅之地的軍队。

傅作义的部队，由河曲經過准格尔旗南部开到后套，在陕坝，五原、临河等地整訓了一个时期，准备就緒，举全力在这一年冬天进攻包头。但大战在包头揭幕，不足一千的“皇軍”，却阻止了傅部的前进。傅所指揮的国民党嫡系

門炳岳的第七騎兵師，配合傅部進攻薩拉齊縣，破壞鐵路，準備和傅東西呼應，夾擊包頭，但由於路綫錯誤，在一個寒冬漆黑的夜里，沖入准格爾旗河北地區我的防地內，保安隊自然倉促應戰，門部也莫名其妙地和我們展開了每一個村屯的爭奪戰。戰爭的激烈出乎我們意料，但我們保安隊頂住了這支武器精良、訓練有素的“鐵帽子軍”（門部騎七師都戴鐵盔），這主要是保安隊痛恨國民黨軍隊蹂躪准格爾旗人民，塗炭其家屬，故能努力作戰。後來在胡宗南的七分校《王曲月刊》上，曾登過這一戰役，稱：“抗日勁旅，在遭到准格爾旗投敵的軍民的襲擊，戰鬥甚為激烈。”這個糊塗仗，牽制了門部攻薩拉齊縣，破壞鐵路的任務，使日本援軍開到包頭“轉危為安”。在我們保安隊幾個進行改編工作的日本人，面對此突然而又最激烈的戰鬥，吓得目瞪口呆，他們估計“敵人”炮火這樣猛，人數又這樣眾多（當時號稱一萬人，實際四千多人），而且又是正規化的戰術，無論怎樣保安隊是支持不了的。因此，他們深怕全軍覆沒，自己也活不了，把他們平日的矜持的面孔，一下變成可憐相，哀求似的向我建議：“大隊長，突圍跑吧，不然通通的死了。”杭錦科長通過翻譯向我說：“您下命令全部撤退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其實我早考慮過突圍的事。不過兩方已形成犬牙交錯，大部已摻雜在一起，敵我已分不清，命令勢難下達各隊，同時，我很明白，多年來跟我叔父的那些老隊長，頑固性強，在他們的心目中，是個童稚的後輩，萬一

命令下达后，他們依老卖老的不服从，我在日本人面前反而会失去威信，况且家眷都在，也是我顾虑的地方，又仗着我地形熟悉，乘的是駿馬，在最严重时期，我想也能冲出去。因此，不理睬日本人的建議。最后，我索性向日本人表示：“我不能离开准格尔旗父老們独自偷生，假如你們愿突围的話，請你們先走吧。”日本人自然不敢单独行动，反过来又贊揚我有“从容就义”的精神，与大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样。

战斗两日后，双方都已精疲力尽，保安队的彈藥恐荒也严重起来，我正在进退两难的当儿，日本援軍开到（主要为了在我們部队中的日本人安全），开来的日軍汽車七、八輛，还有坦克三輛，人虽不多，但炮火异常猛烈，压住了門部的炮火。我乘机命令保安队反攻。这时，在我們保安队的七、八个日本人也活跃起来，居然也挺身而出，敢和保安队站在一起，勇敢地冲锋了。門部經過連日的激战（在和我們战斗前，已和日軍战斗数次），也疲乏不堪，只好向准格尔旗黄河南岸撤退，伤亡和武器損失很大，甚至把电台也扔掉。我們的力量也只能将騎七师驅逐出我們防地，就算万幸，而日軍也任务紧急，匆匆地連夜奔向包头。

門炳岳退到准格尔旗河南岸，整頓好部队后，又发出向我进攻的命令。幸而这时准格尔旗有两人替我“解围”，郝勇功（原准格尔旗保安队营长），傅存仁（准格尔旗地主）相继訪問了門炳岳，并解释了我“被迫”归日的經過。門考

考虑了一下，大約是感到再和我糾纏有妨碍攻占薩拉齐县的任务，只提出交还他失去的一座电台（实际这座电台扔在百姓家中，我令派人找回）。就令郝勇功带路，由我們西面（未經准格尔旗防地）直奔薩拉齐县，但为时已晚，日人的兵車，源源由东开到，控制了交通綫，包头也开始了反攻，傅部被迫退去，損失伤亡很大，日人曾将俘来的山野炮等武器，在包头展覽。这次进攻包头，事先准备工作是精密的，但在战术方面是有缺点的，轉龙藏是包头的制高点，未搶占（实际没有一个日軍守护），铁路也未令各地游击队破坏。让日軍大批开到，将山野重炮設在轉龙藏，猛轰“国軍”陣地，加上安北、固阳返回的日軍残部，攻击了傅軍的指揮部，使“国軍”陷入混乱，伪蒙軍原打算反正（駐包头伪蒙軍第一师郭大刀部反正未遂，其部下于团长率部反正），但“国軍”未很好的爭取，日軍大部开到后，迅速地控制了伪蒙軍（曾架上重机枪在伪蒙軍第一师师部，迫令其进攻“国軍”），促成了“国軍”重大的伤亡和迅速地敗潰。

經此一役，日人对我保安队非常重視。日《朝日新聞》大肆鼓吹此次战役，謂：“准格尔旗保安队英勇善战，其大队长年輕勇敢，能沉着指揮。”日寇也对我尊重起来，在未战以前，日寇輕藐地問我：“你的几岁？噢，漂亮的小孩啊！”战争以后，却伸起大姆指：“你的大大能干。”表示佩服，而且从此也不和我正面冲突了。旋即給我发下三八式步枪三百七十支，輕机枪二十多挺，装备子弹大量送来。为

了鼓勵我的效忠“皇軍”的“功績”，偽蒙疆治安部次長（日本人）特地來嘉獎了我一番，並允許經費和武器彈藥保證滿足供應。日本人的信任，增加了我給他們當走狗的決心。

不久，留在抗日區的准格爾旗代理扎薩克奇文英，派他的親信持着他的信來見我。內稱：“國軍自從消滅我弟鳳鳴官府後，現又集中力量壓制我，目前境況惡劣，萬難應付，請侄（稱我為侄）代求‘皇軍’出兵援……。”我明白奇文英所說的困難是實情話，因國民黨軍虐殺我叔父後，又變本加厲地壓制他，在准格爾旗河南岸駐重兵，隔斷我們的聯繫（也許是怕他投日），又用了各種不同的花樣欺侮他，剝奪他的權利，他才喊出歸日偽的口號。但我對他也是不諒解的，當白鳳翔解決我們後，白部張參謀長向我說：“你們的事，過錯在你們旗的內部，奇文英拍電中央，報告你們投敵，請中央派兵迅速解決。我們才奉命來此。”這話也許是他們的挑撥，不過我們兩方是有夙怨的。

日軍駐包頭的司令官小島中將特為奇文英請求援助的事召集了偽伊盟公署的參事官、警務廳長、駐包頭的特務機關長，以及鄂爾多斯挺進隊司令森蓋林慶和我開會研究，會上，我和森蓋堅決要求“皇軍”“收復”伊盟。其它日本人是緘默不發一言（也許是怕小島）。小島先詢問我倆的計劃、打算和辦法，然後引我們大家走到十萬分之一的軍事地圖前，嚴肅而又裝成很威風的樣子說：“蒙疆只剩伊盟一塊土地未收復，皇軍當然有責任幫助來完成這個任務。可是最大的困

難是收復後固守的問題，皇軍不能用大部軍力來守這個交通不便地區，靠蒙古軍恐怕力量不濟。最近後套的失敗，說明蒙古軍還是抵抗不了中國軍隊的（日軍佔後套後，交給偽蒙軍固守，被傅部收復）。假如你們伊盟能團結起來，裝備好武器，在那個適宜你們活動的地區上，能否保守你們的家鄉呢？”接着他的代參謀長小林中佐反復地問我們在伊盟的駐軍番號、人數、裝備、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邊區的關係。因為我們說的使他很多地方不滿意，可見他們早有這方面的細致情報。最後，他估計在伊克昭盟的抗日軍最少有三萬人，而我們各旗的保安隊最多一萬人，武器、裝備、訓練更懸殊很大，加上西面的傅作義軍和南面的八路軍等，都是主要威脅。他說來說去的意思是：怕八路軍佔據了這塊地方，使各盟旗在國民黨擠迫下“赤化”，那樣更會糟糕。

小島在快散會時，向我們做了“收復”伊克昭盟的保證說：“這問題很重大，皇軍要做進一步的考慮，不過你們要放心，皇軍是一定會收復伊克昭盟的，希望你們做好準備，尤其是策動各盟旗的王公們來打‘中國軍’，因為伊克昭盟各旗都是在困難中掙扎。”小島做了鄭重“保證”，我們自然心喜，同時想到國民黨軍隊欺壓伊克昭盟軍民，也給我們製造機會，我回復了奇文英的代表，並交給了他“皇軍”的指示，讓他做好準備，策應“皇軍”，“收復”伊克昭盟。

我剛回旗下，傅作義特派王任之由後套來見我，說什麼我叔父的死是白鳳翔因想侵奪我們家產才造成的，“中央”

和傅先生絕沒有指示，你的“归日”是被逼迫的，“中央”都能原諒。假如你現在反正，給你很高的地位。同时他又要求我派代表到后套見傅，說你所要求的都能答应。我本来这时已死心塌地給日伪当走狗了，但我的“帮闲客”李仲深、席良、刘士奇等都劝我和傅联系，对我将来的前途一定有好处，再說，向傅要些武器、經費，扩充自己的力量，这不是更好嗎？这个如意算盘是不錯的，我采取了他們的意見，請席良、李仲深代表我去后套拉攏一番，主要目的是要东西。

李、席去后套仅給我带回一件“司令”的委任状（我記不清是什么司令名号了）。这和“皇軍”給我的“恩惠”对照，觉得“皇軍”真是对我们太“深厚”了。

我自投日伪后，和伪伊克昭盟公署民政厅长（伪伊克昭盟公署的四个厅是警务厅、民政厅、畜产厅、教育厅）吉尔圪朗友誼很深，他是吳鶴齡派，吳和陶克陶（伪蒙疆总务厅长，以后任交通部长）斗争很激烈。在日本人面前争宠，互相誹謗打击很厉害，最后因陶克陶会日本話吃香，吳被挤下台，到日本学日語去了。因此，吳派大受排挤。可能吉感到这点吧，和我結成友誼，可以对陶，因我算一个有实力者，又得到日本人的信任。我刚归日伪时，欲得准格尔旗协理的委任，那时阿王因我未給他送厚礼，坚决不同意，但实际权力不在阿王之手，不过听說阿王还在德王面前进讒，說我年岁太小，不能胜任，怕各旗不服。吉尔圪朗也在德王面前頂他。說我虽然年輕，那是率領軍隊归順我們，又經過准格尔

旗軍民一致推選來的，這與各旗關係不大。我們不應該以個人好惡，否認人家來歸順我們的誠意，況且日本人已同意了，我們不應該無理取鬧。這樣算決定了我的政治地位。

我曾幾次在德王幕中鉅研，也淺近地了解到內幕一些事，在表面上看，大家好像很忠心擁護他似的，實際上勾心鬥角，內部矛盾傾軋得很厲害，都想利用他做自己升官發財的工具，而德王本人在政治場合上的才能經驗不足，且又不能主持公道，處處表現出偏私于王公，尤其對錫林郭勒盟的王公，更是偏袒。在化德成立偽軍政府時期，招募來數千蒙旗的流氓、土匪等軍隊，編為蒙古軍第二軍（第一軍李守信），把錫林郭勒盟那些不學無術的王公都選拔為中、少將師長。國民黨軍隊進攻時，這些胆小如鼠的王爺們，各個心驚膽戰，不僅不敢率部應戰，反而潛逃回旗（有的借口回旗養病，或請喇嘛念經脫身回旗），影響官兵戰鬥情緒。當時的日本顧問田中提出撤換這一批無用的師長，代之而起的是所謂“後起之秀”軍校學生出身的蒙古青年（日本士官較多）。

一九四一年（或是一九四二年），被擠在日本學日語的吳鶴齡學成歸國，並攜帶回來一個日本姨太太，在偽政府內大肆活躍，幾個回合後，陶克陶已不支，大敗下台。吳提出成立留日學生後援會，支持和鼓勵蒙古青年留日，多培養帝國主義忠實爪牙。又成立“豪利希亞”（合作社）用蒙旗出產的皮毛牲畜換日軍的煙茶布匹等日用品。這自然是有利於日本人的。吳鶴齡此舉，也提高了他的政治聲望。

另一方面，吳为了取得日本人信任，大肆渲染日本的进步，說日本是“天堂”，是“名符其实”的东亚“領袖”和亚洲“救世主”。我也深受其影响，要求赴日参观或学习。我赴张家口市由吉尔圪朗（时已升总务部次长）領着見了一次吳鶴齡，这位久仰的“政客”，这时已将老朽的政务院长卓世海挤下台而担任了院长，执行着“內閣总理”的事务。我自己想，可能他也有拉攏我的意思吧，和我表示了亲近。他支持我去日本参观，于是我参加了“蒙疆政府赴日参观团”的行列。去日本参观的有烏兰察布盟盟长林王，巴彥淖尔盟一个总管富賢德，察哈尔盟一个哈斯巴其尔，鄂尔多斯挺进队司令森盖林庆，中公旗协理巴图毕力格，伊克昭盟达拉特旗东协理烏勒济巴雅尔等和我十几个人，两个日本人，一个翻譯。在日本两个多月，看了些冠冕堂皇的东西和資本主义工业表面上的繁荣发展，夸贊日本是最强大的国家，中了不少毒素。

同年秋天，又去参加伪滿洲国十周年紀念国庆节日，伪蒙疆政府的代表团团长是“兴蒙委员会”的委员长松王，副团长是“綏西保商督办”蔣輝若上将，五十多个代表团員，乘坐专車赴伪滿首都“新京”（长春）。

这时“新京”打扮的五顏六色。但“滿洲国民”脸上却看不出什么欣喜的样子。最奇妙的是“皇帝”上場，廣場上設下整齐的酒宴，穿着整齐的各色各样礼服的“友邦”代表团鴉雀无声地坐在指定的位子上。忽然扩音机里喊了一声“起

立”，溥仪佩戴着上将的伪滿軍服上場了。紧接着声“敬礼”，大家忙着又低下头来。滿天鸽子飞揚在廣場上空，嗡嗡的大編队飞机凌空而过。伪滿洲国内閣总理大臣张景惠，双手端着“大詔”，敬奉在“皇帝”面前，然后鞠躬而退。“皇帝”御音朗朗念誦了一番“詔书”。这幕丑剧，頗折騰了一陣子。

一九四二年春天，伪伊克昭盟公署警务厅来电话叫我去包头，說有要事相議。应命到后，伪伊克昭盟公署和特务机关負責日人，向我和森盖（他也应命从达拉特旗西碾房来此）說：“目前情势有利于我們到敌区活动。皇軍的意思是让你们們各率領自己的部队出发，这是收复伊克昭盟的好机会。”我当时不知葫蘆里卖的什么药，认为給日軍当个前鋒这也是应该的事。于是我应許下来。森盖比我是老奸巨滑得多，他先强調他的防地的困难，然后說回去准备，当然他是想看我以后的发展如何，才作出决定。

回旗后，我不自量力地率領我的主力向准格尔旗河南岸渡河突击。国民党守河軍虽有四个連，但很快就被我們全部消灭。准格尔旗召湾一带，很快就被我們掌握。数日后，我因病返回河北党三窑子家住。部队在召湾一带修筑工事待命。想不到我的病轉成伤寒，一病数月，急坏了日本人，这时“东北挺进軍”五师全部开到，腐敗的国民党軍队，战斗力非常弱，士气很低，对我們陣地，始終无法攻克。而且在国民党逼迫下的扎薩克旗和烏审旗保安队起义了，这就牵制了他們的力量。

我这次的“胜利”，又得到日本人的奖励，给我发了一枚“警察最高功劳章”，以酬谢我叛国的“功劳”。

同年秋天，我去参加“豪利希亚”在张家口的大会（我是准格尔旗“豪利希亚”理事），会上，吴鹤龄用三种不同的语言（蒙、汉、日）滔滔不绝地斥责了各旗王公利用“豪利希亚”贪污中饱的事。有的王爷（各旗“豪利希亚”都是王公们主办）丢失了“豪利希亚”基金，有的将用皮毛换来的布匹等就在张家口市卖了。有的旗借机向牧民加重负担，闹得乌烟瘴气，一片糊涂帐，德王也气得不住抱怨。吴鹤龄说：“日本人早已说过，王公们搞‘豪利希亚’肯定闹不好，今日果真如此，我真不明白你们安的什么心。百姓们都不信仰你们，你们再还能当王爷吗？”最后，吴鹤龄有重点地斥责了茂明安旗。另外奖励了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因两旗将得来盈利作为学校经费）。

休息时，我在德王公馆（“豪利希亚”会议一般都在德王公馆开）闲逛。看见一部分人在编写蒙古字典。询之，知在德王亲自主持下编写。我说：“主席日理万机，还有工夫搞这个吗？”一个官吏笑着回答：“主席也只能管一管‘豪利希亚’，编一编字典，别的事日本人全包揽了。”

日本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后，在军事上打了几个胜仗，多设了几个傀儡国，要表示一下盟主的威风了，东条召集了几个傀儡首脑，开“大东亚会议”，邀请的有六个“国家”。汪精卫代表的“新中国”、张景惠代表的“满洲国”、巴莫

代表的緬甸、谷勒尔代表的菲律賓、包魯斯代表的印度，秦國是一個親王殿下，東條團團居中而坐，高唱一陣“大東亞共存共榮”（電影宣傳當時情形）。不意這個傀儡劇因未邀請德王，把他氣壞了。他秘密鼓動開“蒙利希亞”的王公們選出代表到日本駐蒙軍司令官那里請願。代表中有烏蘭察布盟的林慶僧格盟長和伊克昭盟的森蓋，但那個老氣橫秋的日本司令官非常蠻橫，向林盟長說：“看你愁的把你那條小辮子還掉了呢（當時許多王公有辮子），你最好多注意一點你們盟內牲口事吧，早一點打下草，不然牲口就會在大雪天凍死的。”這個啼笑皆非的場面，代表們還要九十度鞠躬，表示感謝。

半年後，日軍贈送給德王五百支日造三八式槍，算是回答他未參加“大東亞會議”的歉意。

日寇污辱和欺壓偽蒙疆官吏是經常的事。偽人員為了貪圖衣食祿位，都忍氣吞聲，不敢反抗。最有趣的是察哈爾盟一個副盟長，因自己的汽車被屬下一個日本人搶坐，發生口角，讓這個日本人打了一頓耳光，而且把他的眼鏡也打壞了，事後他向人哭訴：“打我几下不要緊，把我二百塊錢的眼鏡也打壞了！”一時傳為笑柄。

日本人內部的爭權傾軋也很厲害，尤其在直接抓偽軍的權力上，我數次給日本出力，大約得到信任，都認為在我頭上能做一次政治買賣吧，包頭特務機關和偽伊克昭盟公署警務廳（後改治安處）爭起我們這部分力量來。特務機關先後

派中島、石飞、内田来准格尔旗，名虽是交换情报，实际劝我归特务机关领导，保证供应比伪伊克昭盟公署强。给我番号是“鄂尔多斯战斗队司令”，和“鄂尔多斯挺进队司令”森盖一样，这使我左右为难，两头都怕，伪警务厅派来的人，对特务机关的人很注意，经常问我：“他们和你说了什么话？”伪伊克昭盟公署日本人警告我，特务机关不应该干涉准格尔旗，那是“越权”，“你也不应该和特务机关联系，否则会影响你的前途”。后来官司打到驻包头日军司令官那里，决定准格尔旗和达拉特旗两旗军队都应该归入伪伊克昭盟公署，否则会对未“收复”伊克昭盟各旗影响很大。他们都是怕“皇军”，虽然包头特务机关长是日军的中佐，就让“皇军”一言而定。森盖也由“鄂尔多斯挺进队”少将司令转成“伊盟警察第二大队”队长了。

但包头特务机关权势很大，直接控制的几个“上将”：“东亚同盟军”总司令白凤翔，“绥西联军”总司令王英，“绥西保商督办”蒋辉若。王英和我最熟悉，他约我到包头他的办事处（他的总司令部在西山咀）殷勤招待我。实际我和他的“友谊”完全建立在彼此利用的基础上，我对他根本没有好印象。在我童年时期（一九二六年）王英就率他的三十一军，奉张作霖命令进攻山西河曲。但他和准格尔旗当时统治者那森达赖有夙怨，借出兵山西，向准格尔旗挑衅，于是发生了进攻准格尔旗的战争，准格尔旗人民遭受到最严重的兵灾，我家被他洗劫一空，给我幼小心灵中留下了创伤，在

今天握手言欢时，那幕惨剧常反映在我脑中。但我今天的目的是对付我最恨的仇人，杀害我叔父的白凤翔，我打算拉攏王英和白对抗，因白和王在扩充军队、霸占地盘问题上矛盾很大。白凤翔投日自称率部一万二千人，这当然是虚张声势，但赢得日本人重视，他驻在固阳黑教洋堂后，即升官进爵，招贤纳士，大事铺张，尽量策动绥西土匪、地痞、流氓，扩张自己部队。他收罗极多极广，弄得团营长不知其数，将校官多如牛毛。这自然损害了王英及王部下土著势力。以后两人磨擦得几乎兵戈相见。我打算利用这种矛盾，报仇雪恨，另一方面我几次组织人打算刺杀白凤翔，因白出入警卫森严，未得下手。王英拉我的目的是扩展未来的权势，他的谈话直爽地表现出来，他乐观地分析时局说：“德、苏是两败俱伤，美国是最后胜利，国民党必然利用日伪来替他们打天下，那时绥远要出现一个‘绥人治绥’的崭新局面，有号召能力的人，必然乘时而起，内可抵制山西人再统制绥远人的局面，外可抗拒共产党的侵入。”说到这里，他得意地哈哈大笑，使劲拍着我說：“老弟，时势造英雄呀，你在地方上很有号召力，可不要错过机会，干一手呀。”又说：“你如看得起老哥来，咱们有福同享，患难与共，我王英和谁相处都是永远和好。”这就是他已物色好我这样有“号召”力的人，完全有资格和他患难相共的。我也少不得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只要您看得起我，在您高升时候，我会给您摇旗呐喊的。”

一九四四年以后，日本人已普遍感到他们走下坡路了，

对伪蒙疆政府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打算使这些傀儡官员们有些权力来共同支撑这个危局。李守信要求将自己基本部队一、二、三师，由“警备部队”再恢复原建制，置于自己管辖之下。德王要求扩编伪蒙军。这时日本人逐渐已无力控制，且各地游击队闹得很凶，乐得顺水推舟承认，借以博取伪官员们好感，使其为己卖命。这一让步，乐坏了伪官员。不少具有奴才本性的人，居然狂喊“皇军”实在无领土野心的，诚心诚意的扶助蒙古人。其中最典型的是挨了日本人打，并打坏了他价值二百元眼镜的察哈尔盟副盟长，实际日本人同意增加伪蒙军，他又有利可图，伪官吏都同样，只要分得日本人的一杯残羹，就会乐得手舞足蹈地不知所以了。

伪军的扩编，成了伪高级官吏争权夺利的机会。最突出的是德王、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的争军权。吴鹤龄是个野心很大的人，自恃有些反动才能，常翻云复雨，玩弄德王、李守信，他们早有矛盾，不过因都受着日本主子的重压，还不十分显著，自扩编伪蒙军方案落实后，吴为了攫取兵权，坚持主张政务院长下设立一个军事部，由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乌古廷兼任，这无疑是在吴、乌联盟，抢占德王、李守信的“军政大权”。德王、李守信也不愿受愚弄，由暗斗发展成公开冲突。日寇始而冷眼旁观，继而感到有支持德王、李守信的必要，因他俩在伪官员中影响比吴、乌大。结果吴、乌自然被挤下台，吴调成没官署的“内务长官”（因人设事），乌成军事参议。李守信兼军事部长，德王兼政务院长，宝紫

宸（宝貴廷）升总参謀长，不甘寂寞的陶克陶看到自己的“政敌”下台，也赶忙出来活动。

一九四四年秋，伪蒙軍扩編第一阶段初步就緒，除靖安警备軍編成伪蒙軍外，五个盟編五个防卫师。錫林郭勒盟为第一师，盟长松王为师长，察哈尔盟为第二师，盟长卓世海为师长，副盟长为副师长，烏兰察布盟为第六师，林盟长（林被俘后，沙盟长兼师长）为师长。巴彥塔拉盟为第十六师，盟长朴英达賴为师长，伊克昭盟为第十二师，阿王为师长。这些对軍事莫明其妙的老官僚又穿上軍装，挂上軍刀，要能文能武排演一下。此外，特地又派来大批所謂“本科”出身的参謀长、处长之流，分派在各师，扶助师长們組織司令部，軍事正規化了。

伊克昭盟第十二师編成六个团，原六师十六团、十八团，森盖部編一个团（森盖是少将旅长），达旗章錦文团，我部編成两个团（我兼任两团团长）。編蒙古軍，伪官們一般都同意，因派来的日本人少（每团一个日本教官），控制不严格，軍官权利大些。

这时陶克陶突然派其舅父（大商人）来包头，通过十二师参謀长滿仓介紹，和我拉攏（自然也 and 森盖拉攏），并以托我收买河南岸黄金为借口，提出要和我“合作”（当然是政治合作，不是經濟合作），并邀我去归綏总司令部和其二甥（陶的二弟）伪蒙軍情报部长都伦仓会晤，协商給我編一个旅的事。当然意在要我支持陶，他帮助我，我乐得应承，

反正互相有可利用的机会就利用，誰和誰也沒有一定的感情。

一九四四年冬天，由于看到日寇日暮途穷，都明白靠山要倒下来，势非再找主人不行。我又和傅作义恢复了几年来隔断的关系。傅派苏伯安到北京，途经我处。据苏说：傅有六个军的实力，准备大举反攻，请我做好准备。苏到天津找齐燮元等伪官（那时齐燮元已被日本人撤去军权）联络，日本人也沒有怎样，仅派人跟随，不令其自由活动。后苏由王英防地返后套。

一九四五年春天，国民党綏远省党部委员高乐山来我处作开展敌区工作。高在抗战初期和我有一面之識。他来时給我带来十二战区委我河防司令的委任，并向我要全軍名册。他说：“国軍反攻在即，你要准备好策应工作，綏远万不能让共产党插足，傅长官准备給你綏南专员，将来你的責任重大，你需要立功报效傅长官。”

几天后，我去包头和森盖談起改弦易帜以应付危局的事，他不胜感叹，他和我合計，我們两人的部队决不东开（当时消息調我們东去），离开家乡，不容易掌握住自己的部队，必要时两个部队靠攏，合起力量来，在政治上可以互相呼应，在軍事上做到攻守同盟，彼此要协力同心，保持自己的权力。

这时各伪官們都在惶惶不安，加上游击队的活跃，日伪軍力不敷，运用不灵，百灵庙游击队深夜潛入，杀死日寇首席指导官，薩拉齐县游击队里应外合攻入县府。伪蒙軍第八

师师长扎青扎布“剿匪”战死，第七师参谋长被俘放回，这都是半年来日寇在军事上走下坡路的证明。上下都已一筹莫展，成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在张家口的伪高级官吏们，也愁眉不展，齐集于李守信的官邸，不是吞云吐雾，就是八圈麻将，再不然就是酒肉征逐，谈古论今地交换情况，一致认定日本已无力再战，失败是意中事，大家只好依靠这个握实际军权的胡子老哥来求生存，因此最后惟一幻想就是依靠这股力量，灵活地作好投机“买卖”，将来好摇身一变成为“内战英雄”。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早晨——是我记得最确切的一天，李守信突然由归綏总部来电话限我当天就去。我不知道什么事这样严重，就忙乘马到薩拉齐县，坐当日晚车抵归綏，下车到都伦仓家，盯着他问发生了什么事，叫我这样急急赶来。他笑着说：“明日见总司令吧，大概是军情大事。”次日謁李，他很客气地说：“目前时局非常紧张，我们兵力是愈来愈感到不够分配，听说你有一定号召力，可以多编练军队，人越多越好，武器装备不成问题，你最好直接归总司令部。”接着又说：“听说准格尔旗河南岸能用大烟换黄金，你给我换几千两，因为我在北京订购下一座德国制枪弹机器，非黄金不能买到。”我也不考虑其言如何，满口应承办理。

接着六月中旬，德王又来电叫我去张家口，这时李守信也在张（因李在两头公馆住）。这次见德王，他的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面孔也变了。他谦虚地问我部队的装备、人的士

气，以及扩充的办法。他很郑重地問：“你的部队能調到察哈尔盟来嗎？”尽管我内心如何打算，我还是滿口应承：“只要主席有命令，任何地方我也能去！”他頷首微笑，表示滿意。

晚間又到李守信公館，在他烟榻上愚談，他让我先防守铁路沿綫，在必要时可迅速来张集中，又不断詢問我他的一个老朋友黎明（国民党国防部某厅长）消息如何，并又表示今后要蒙古人有办法必須团結一致，爱护“領袖”（指德王），他自己和德王是如何“莫逆”交好，我内心明白他俩要互相仰仗借重維持自己的地位，才“莫逆”起来，同时誰都看出来，他們内心是多么空虛惊慌。他們的地盘权力也是极不巩固的，万一日寇投降或潰退，他們的有限兵力，决不能控制广大的伪蒙疆区域，何况自己多年来未接近部队，日寇在时，还能互相利用，維持他們傀儡式的統一局面，但已危机四伏，各自为政了，霎时就会分化崩潰，他們現在虽然拚命扩充人，抓军队，打算集中起来运用，但无济于事。

伪政府和伪总司令部人們态度也变了，在我看都有些不大自然似的，和我認識的軍政官員，尤其是德王、李守信的亲信幕僚們，紛紛詢問：伊克昭盟的情况、“国軍”的企图（当时在我对面的国民党军队），許多人还关心的劝告我“多加小心”，說去年冬天烏兰察布盟的林盟长全家被傅作义的騎四师俘去，主要是“大意”，今天你只有将部队集中到交通綫附近，进可以走，退可以守。又有些人向我宣传：几年来

日本人在軍政方面控制得太严格，使德主席和李总司令这两位軍政領袖有才无处施，現时局紧张，日人让步，英雄才有了用武之地。軍隊的扩編，向正規化目标前进（指加紧訓練），政治上的集思广益（指德王最近常召开各旗各界士紳座談会），封閉“俱乐部”（这种“俱乐部”是日本人統治伪政府腐化中国人民的政策之一，在許多城鎮內，設下“俱乐部”，让中国人民公开賭博，使人民陷入此火坑，自杀和受害者不計其数，有趣的是門上还挂个“日本人禁止入內”的招牌，似乎是在敌寇侵占地，还有中国人特权地方，在日伪崩潰的前夕，德王假仁假义宣布撤銷）。又說这两位“領袖”仁厚寬爱，度量很大，更加“礼賢下士”，团結各族各界的人民来共赴“邦难”（这时伪蒙疆政府已冠上一个“自治邦政府”的不伦不类的名称，說是和国家一样了）。我听到这些話好像要巩固我对德王、李守信的信仰，又覺得这是“人之将亡”的哀鳴。

这时伪蒙疆政府兵力，大約三万人左右，武器装备都还可以，惟素质很低，加上部队成員大多是兵痞、流氓、慣匪等，官佐极端腐化，軍紀更加坏，搶劫已成风气，其中伪蒙軍八、九两师，奸淫虏掠更加无所不为。日寇的投降，使伪蒙軍政人員手足无措，隨即大部力量分化而自灭了。

我这篇回忆，因事隔多年，多半不能詳細記錄，錯誤难免，希知者多加指正。

奇子祥刺杀奇文英的前前后后

刘 映 元

准格尔旗自从那森达赖开了杀端以后，直到解放以前完全成了一个血腥恐怖世界。不但卷入政治斗争的贵族，说不定在哪个时候被对手暗算，连各为其主的奴隶，也多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悲惨死亡。

一九三三年，奇寿山发动政变的果实，最后被神山的奇文英抢夺，他遂由那森达赖的营长，一跃而升为准格尔旗的东协理。由于奇凤鸣继奇子俊担任了西协理的缘故，奇文英不能很快地建立起像那森达赖那样一手遮天的独裁统治。从一九三三年那森达赖父子死后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准格尔旗遂划分成两个势力范围：一个是以神山为中心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属奇文英统治范围；一个是以万和堂为中心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属奇凤鸣统治范围。一九三三年政变的结果，奇寿山和那森达赖、奇子俊父子两败俱伤，奇文英和奇凤鸣乘机崛起。当时奇文英虽然掌握了那森达赖父子的军队，但是在政治上不能和奇凤鸣匹敌。奇文英是那森达赖的叔伯弟弟，他把奇寿山打死很不得民心，尤其是扎萨克

奇治国的母亲——小王爷的老太太，对奇文英同样不满。奇凤鸣是准格尔旗一个久经事变的老仕官，由梅林升为管旗章京，他在那森达赖专权的时候，居然能把身家性命保全下来，说明他很有一套官场经验和政治手段。他在军事势力上不如奇文英，但在政治上他却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因为大营盘的小王爷的老太太倾向万和堂而深恶痛绝神山，并且奇凤鸣统治着准格尔旗的谷仓（河套），经济上也比奇文英占上风。经过双方将近四年的勾心斗角，到抗日战争爆发才改变了这种形势。

一九三七年，绥包淪陷以后，奇文英和奇凤鸣都秘密潜赴归绥参加过德王召开的烏兰察布和伊克昭两盟王公仕官会议，后回到黄河以南先观望大局如何演变，然后再表示自己的立场态度。准格尔旗南部毗连山西河曲与陕西府谷，一直由抗战部队控制，特别是馬占山率领刘桂五的骑六师，从包头退下，馬不停蹄地由后山后套绕道伊盟驻到神山附近的府谷哈拉寨，所以奇文英不敢轻举妄动。准格尔旗北部和淪陷区只隔一条黄河，尤其河套在黄河以北，和薩拉齐、托克托两县接壤，奇凤鸣驻防河套的一些保安部队，在绥包淪陷以后便投降了日本。奇文英以此为借口，向馬占山检举奇凤鸣留在河南是为了在日軍进攻伊克昭盟时做为内应。馬占山不熟悉伊克昭盟情况，为了树立威信以慑服王公仕官，在一九三七年冬天，在扣捕达拉特旗康王和东胜县保安队长刘道宽（刘牛）的同时，派白凤翔带兵包围万和堂，将奇凤鸣带

到了哈拉寨。康王后来送往重庆，刘道宽因为没有就地正法而得以越狱逃跑。奇凤鸣如果加以申辩，马占山也不一定置他于死地。奇凤鸣到了哈拉寨便死了，他在临死以前，曾嘱咐他的侄儿奇子祥说：“我是不顶了，你们以后要注意乌力吉巴雅尔（奇文英的蒙名），那狗日的长得一个捉鳖脑袋。”意思是奇文英外表像一个大老粗，内心中非常阴险毒辣。他们同德王勾搭的事，被奇文英抢了原告。奇凤鸣怕后一代仍遭奇文英的毒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

奇凤鸣死的时候，奇子祥才十九岁，因为他曾肄业于土默特旗中学，有一定的文化和普通常识，并且在准格尔旗的那种环境中，青年贵族都很早熟，所以奇子祥也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奇凤鸣的儿子很小，遂把侄儿视为自己事业的继承者。奇子祥把奇凤鸣的灵柩运回万和堂，索性把奇凤鸣的家眷和军队都带到河套，去归绥投降了日寇。日伪先给他编了一个“鄂尔多斯警察大队”任命他为大队长，以后又提升为伪蒙军十二师的旅长，由日本人给装备了好多新式武器。抗战后期他一面和日军配合，不断过河袭击马占山东北挺进军；一面派参谋长席良经常往来陕坝和傅作义秘密进行联络，充分表现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面派手法。

奇文英被形势所迫，不得不打起抗战的招牌。他以东协理护理扎萨克兼任了准格尔旗的保安司令，还经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协助，亲自到西安向胡宗南活动，特别是去重庆跟蒋介石见了面，又弄回一个“蒙古第一游击区司令”

的名义。但他在八年抗战期間，一直跟德王暗通声气，跟日本人勾勾搭搭。先是由韓根栋給他担任駐“厚和”（日伪占領时期的名称，即現在的呼和浩特）办事处处长，并且由他的营长郝茂林給日伪成立了保商队。韓根栋把保商队带上归了馬占山之后，奇文英还不断派侄儿奇子礼到归綏跟日本特务机关勾搭。馬占山本来知道这些活动，但因怕把奇文英的假面具撕破而公开投日本，影响自己在准格尔旗的存在，所以装作不知。陈长捷担任伊克昭盟警备軍总司令时，曾計劃派何文鼎的二十六师进攻神山，也受到馬占山的劝告而沒敢进行，因又怕把奇文英逼得倾向陕北的八路軍。

奇文英知道馬占山甚至傅作义把他也奈何不了，因此仿照那森达賴父子分任东西协理的先例，也让自己的孙子奇涌泉接任了准格尔旗的西协理。这时那森达賴的孙子奇致中，利用祖父的余蔭，在准格尔旗的政治舞台上开始出头露面，他給馬占山认了干孙子，以为外援，并和小王爷奇治国以及准格尔旗“四大家族”之一的中南坪丹片尔官府家的奇尙斌，在奇治国（十八岁）够了法定掌印年龄的那年，經馬占山的大力协助，在德盛西組織了准格尔旗的旗政府，要和神山軍政分治。奇文英在馬占山出动了一师騎兵庆祝旗政府成立的情势下，不得不把印信交出。一九四五年夏季奇治国病死，奇文英不好意思派亲兵到德盛西从奇治国母亲的手中往出夺印，遂以西协理一职为餌，让奇致中前去“逼宮”，奇致中給奇文英把印夺回，奇文英来了一个翻脸不认賬。奇致中

由于没有当成西协理，曾出过三千块銀洋的賞格，想从馬占山的兵里雇用刺客，暗杀奇文英，因为神山戒备非常森严，結果没人敢去，奇文英又延續了七八个月的寿命。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为了搶夺抗战胜利果实，把伪軍一律收編，奇子祥的队伍，也被傅作义編为“十二战区騎兵挺进第二支队”。奇子祥看見投降了日本，国民党也沒有把他怎样，并且感觉到国民党是欺軟怕硬，誰占据了那个地方，就承认誰在那里的統治，所以自恃部队装备精良，决心要把奇文英除掉，以夺取統治准格尔旗的大权，从而也为叔父奇凤鳴报了仇恨。他曾于解放軍一九四五年冬天第一次包围綏包的时候，在大营盘召集奇文英的反对派奇致中、奇尚斌和小王爷奇治国母亲的卫队长开会，向他們提出分路出兵进攻神山的主张。因为奇致中等畏首畏尾，态度不很明确，遂变更了計劃，决定自己派人先把奇文英暗杀，看各方面的反应如何，再想应付的办法。

一九四六年阴历三月二十一日，是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寢的大祭日期，屆时伊克昭盟盟长、郡王旗的扎薩克图布陞吉尔格勒要和各旗王公仕官开会。准格尔旗因王爷絕嗣所产生的让誰承继問題，是大会的主要議程。奇文英保荐了自己的二孙子奇玉泉，奇治国的母亲保荐了奇子祥。所以奇子祥要用奇文英离开神山，前往伊金霍洛的机会，把他刺杀于途中，使其不能到伊金霍洛与自己竞争王位。奇子祥派了四个刺客，由他的軍需处长郝士英指揮。刺客中除了王庆保、王

二銀世等是他的卫士，还有一个是党三寨子（村名）叫武耀宗的汉人。在阴历二月中旬，武耀宗以乞錢为名，潜伏神山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侦察工作，得悉奇文英于阴历三月十五日从神山起身。奇文英提前往郡王旗，是怕奇泊国的母亲从大营盘先到了图王那里。

奇子祥派遣的刺客，十四日从大营盘起身，每人都带着两支二十响的“自来得”手枪和两三颗手榴弹，当天住到圪丘沟，奇文英十五日宿到暖水鎮，他們也由圪丘沟到了暖水附近，十六日奇文英离开暖水，他們进了暖水街上买了准备裹伤的白布和棉花，中午奇文英到楊油房打尖，他們就繞过楊油房跑到咳来斯太沟路側埋伏起来。奇文英走进沟里，郝士英、王二銀世等伏在崖头上边，下去的是王庆保和武耀宗。奇文英带着卫士騎馬向西行，王庆保和武耀宗徒步朝东走，給奇文英敬了一个礼，問奇的卫士：“你們是哪一部分的？”奇的卫士回答：“神山的老司令。”奇文英带着十几个卫士，內中有个房毛秃認識王庆保，叫了一声“老王”，奇文英一听知道这两个兵是准格尔旗的人，赶快把馬揪住扭回头問：“哪里的一个老王？”王庆保和武耀宗就在这个时候，掏出二十响手枪射击，崖头上也发出枪声，連奇文英带卫士一下就扫倒六七个人，其余的卫士因为措手不及，調轉馬头就跑。房毛秃的馬被打死无法走脫，王庆保和武耀宗朝奇文英身上又打了一排子弹，沒有打死这个卫士，用枪口指着房毛秃說：“你回去不要說是我們，說了那就以后非杀你不可。”

郝士英和王二銀世等从崖头上下来，叫他們不要多事停留，从被打死的奇文英和几个卫士身上摘下手枪，便繞道回了大营盘。

出乎奇子祥意料外的是，傅作义接到奇文英被杀的电报，为了让蒙旗的統治者跟他团結起来，集中力量对付解放軍，杜絕各旗再发生內哄，以巩固反共的后方秩序，所以把騎四师开过黄河，将奇子祥的軍隊驅逐出納林鎮，包围到大营盘里边。奇子祥原先以为是鄂友三的騎兵过河，所以把队伍从納林撤出，准备在大营盘进行抵抗，一看过来的的是傅作义的嫡系騎兵，便在大营盘繳了枪。这时，奇致中接了奇文英的保安司令，遂乘风轉舵，給騎四师做了进攻奇子祥的响导。他寻出奇子祥的卫士楊脑亥，向騎四师的师长刘春芳說：“这就是刺杀老司令的凶手，应当就地正法。”他怕楊脑亥知道他跟奇子祥謀杀奇文英的詳細情况，故建議把楊脑亥杀掉灭口。刘春芳听了他的話，为了給騎四师树威，这个三門子蒙古奴隶抱的一个儿子，便在大营盘做了貴族們爭权夺利的牺牲品。

大营盘的兵被繳了枪，大营盘附近王爷的花园里有一部分人，由于沒有得到奇子祥让他們投降的命令，向騎四师进行了抵抗。奇子祥的軍需处长也就是刺杀奇文英的刺客领导人郝士英，看見騎四师的兵把楊脑亥捆起，他就向騎四师的軍官們說：“你們不要朝花园里打枪，我去叫他們把枪繳了出来。”他趁了这个空子从大营盘溜脫，跑过黄河北岸化装

成一个武当召的喇嘛，躲进党三窑子附近二道壕黄河岸边馬場的炮樓上不敢露面，把女人也从家中接到那里窩藏起来。

奇文英死后，他的結拜兄弟陈玉甲到神山吊孝，抱着棺材捶胸嚎哭說：“老大哥，我一定要給你报仇。”陈是一九一三年随着张紹曾来到綏远的一个“吃蒙古飯”的官僚，抗战期間任“蒙古第二游击区司令”，傅作义也靠他搞蒙务工作。奇子祥被騎四师帶到归綏，由十二战区长官部軍法处“招待”起来，听见陈玉甲要給奇文英报仇，叫自己的人給送去二十块大烟板子（每块重一百两）。传说陈在探监的时候，叫奇子祥无论如何把所派的刺客除掉，以便死无对証。奇子祥接受了这一錦囊妙計，让他的表弟吳秀秀給党三窑子家里的看門人貴保子捎了一句話，有一天晚上貴保子拿着手槍上了二道壕馬場的炮樓，把郝士英夫妇打死，尸首扛下炮樓，都扔到了黄河里边。刺杀奇文英的刺客王庆保和王二銀世，料到有“兔死狗烹”的下場，所以把賞錢領了以后，即远走高飞了。

（政协呼和浩特市委员会供稿）

我刺杀奇文英的前因后果

奇 天 祥*

准格尔旗位于内蒙古西部，人口众多，地区辽阔。解放前，处于绥远、陕西、山西三省军阀割据的边疆，环境恶劣，纠纷不断。从清末，西协理丹片尔反抗绥远将军貽谷放垦开始，就建立起一支保安队，这里就变成了一个血腥恐怖的世界。最突出的是那森达赖攫取了这支武装力量以后，对旗内稍有声望或对他有所不满的贵族上层，都加以明杀暗害。一九三三年春天，奇寿山发动政变，杀死了那森达赖。但由于奇寿山实力较弱，半年以后，被那森达赖的叔伯兄弟奇文英联合拥那森达赖一派的残余人马杀害。从此，奇文英即由一个驻屯准格尔旗西南部仅仅有数十人的营长（据奇文英向我说，那森达赖在临死的前几天，发表他为准格尔旗第二团团团长）一跃而为东协理（以前是那森达赖自兼东协理），并想进一步完全继承那森达赖一手遮天的独裁统治。但当时不但奇文英没有那森达赖的能力，而且环境也不同了。首先，我

* 奇子祥解放后改名为奇天祥

的叔父奇凤鸣固守准格尔旗河北地区——河套，拥兵自雄，使奇文英无可奈何；其次，在旗内有一定潜力的王爷老太太（时王爷年龄太小），早将那森达赖父子怀恨，奇文英上台，她认为也是个“大奸臣”；另外，同情奇寿山的人，也不愿意奇文英独掌“朝政”。于是就展开了夺取死去的奇子俊的空位——西协理的斗争，王爷老太太一派的人，都主张奇凤鸣担任。最后调停的结果，是让老管旗章京担任了过渡的西协理，奇凤鸣继任了管旗章京。但是当时的僵局并没有打开。后来，奇文英同意了奇凤鸣继任西协理，并把旗内另一个有势力的人郝璽魁（巨斌）提升为团长，还将那森达赖的一个妙龄姨太太赏赐了郝璽魁。奇文英遂使郝往来于包头、归绥，代表他四出活动。但过了半年以后，他却把郝璽魁杀死了。

奇文英在年轻时期，品质极端恶劣，嫖赌欺骗无所不为，就连他的亲叔伯哥哥那森达赖也不愿意提拔他。在和奇寿山的父亲斗争尖锐时，那森达赖几乎杀死奇文英，说奇文英“私投外国”。后来由于家中亲属们都来说情，才委奇文英一个连长。但奇文英依然不理正务，每日嫖赌，劣性不改，欺侮同事，谩骂部下，表现出极粗野的个性，常引起人们在背后的指责。

奇凤鸣是准格尔旗的一个老官僚，从小念书，精通衙门规矩。住衙门升到“顶木齐”（类如秘书，拟写文稿的人）。后又调成连长，在奇子俊担任蒙边司令后，提升他为第一团团长，在准格尔旗军队中，除那森达赖父子外，算最高的军职。

他善于应付，在那森达赖的屠刀下，能保全自己也是件不容易的事。三十一军王英匪部攻打准格尔旗时，首当其冲的是河套部队。奇凤鸣当时是连长，因寡不敌众，撤退到黄河南岸，将家眷送往萨拉齐县隐蔽起来。那森达赖听信谗言，就要下令枪毙奇凤鸣，经仕官们跪求，才许可奇凤鸣戴罪立功。在王英部队大举进攻之下，各路防御的保安队相继溃退，奇凤鸣带的一连保安队，在纳林要隘上死守了三天，坚持下来，并给予三十一军以重大打击，使之再不敢大胆深入，才使那森达赖对他变怒为喜，并把他提升为营长。奇凤鸣在那森达赖父子面前，表现出兢兢业业忠诚真挚的样子，才保全了他的性命和权利。实际上他内心是看不起那森达赖父子的。他和奇寿山交情还不错，奇寿山在杀死那森达赖父子后，曾宣布奇凤鸣和他同谋，奇凤鸣也极力赞扬奇寿山的为人和能力。不过他在这两次残杀斗争中，始终未派过一兵一卒，只是坐山观虎斗。

这次他和奇文英的斗争，也在暗中大肆活动，但在表面上，和奇文英称兄道弟，非常亲热，实际上两个人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在两人会晤时，双方护卫森严，戒备非常，随从们都带着手枪。奇文英到呼市时，还不敢经过奇凤鸣的驻军防地——河套，返回时——大约在归绥有了保证，才敢由萨拉齐县经由河套来到万和堂和我叔父奇凤鸣会晤，但也还特请了王靖国的一排人为他保镖。他向奇凤鸣介绍这一排晋军时说：“王师长关心我，硬派一排人送我。”这是表示他与

晋軍拉攏的成功，自己有了后盾。而奇凤鳴却装作不解的样子，还连连向那位排长道謝。他俩表演得实在有趣。

两派势力正在明爭暗斗日趋激烈的当儿，不滿奇文英的軍人乘机举事，头目是归順奇文英的韓根栋（遇春），因他不滿奇文英惨杀郝璽魁团长，又联络了郝勇功、黃得山、拉圪胜等鬧“独立”。郝勇功是奇凤鳴的部下，他奉命收回四、十队的大烟稅，正应上繳时，恰巧韓根栋冒险去說劝郝勇功，韓說明来意后，郝首先看到的是这批大烟稅，本不愿意上繳，这样郝就同意了韓的意見，两人結合在一起，宣布了准格尔旗东南一隅之地的“独立”。当然他們这种“独立”举动，沒有外援是不敢的。他們事先和駐防包头的王靖国取得联系，得到軍火支持，准备独树一帜，与二奇鼎足而三。

这种“独立”局面，威胁到东西协理的利益，因此，奇文英、奇凤鳴在沙圪都協議一番，在他二人的共同利益上又暫且合作起来，又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一九三四年冬天，准格尔旗就又发生了一次“混战”。

奇文英率主力（約三百多人，有四門迫击炮和重机枪）由东南向北推进，直扑韓根栋营。奇凤鳴率主力（約二百多人）由北往南推进，向郝勇功部进逼，与奇文英遙取南北夹击的包围形势。奇文英部虽持有那森达賴的优势軍火，进攻却很不順利，被韓部扼守住要隘，未有进展。奇凤鳴部兵力比較单薄，武器弹药也很差，但他知道自己的弱点，挖空心思，才将郝勇功二百多騎都解决了。奇文英进攻韓根栋部未

获进展，奇凤鸣部又主动袭击韩部后方，韩部在夹攻下投降了奇凤鸣。这样战胜郝、韩的功劳，完全写在奇凤鸣的帐上。这两部的枪械人马都归了奇凤鸣。奇文英一无所获，心中怀恨，先提出要和奇凤鸣平分枪马俘虏的要求，奇凤鸣不答应。最后采取了折衷办法，奇凤鸣将缴来的最劣等武器送给了奇文英一部分，才算使这场风波暂时平息。但奇文英犹自愤怒不休，常在喝醉酒时大骂不止。可是此时二奇已成了势均力敌，谁也不能奈何谁了。

旗内政务也划成两个势力范围，西南及旗中部的六个达庆牌（等于六个区），归奇文英掌握。东部和北部七个达庆牌归奇凤鸣管理。旋护印协理老仕官病死，奇文英兼任了护印协理，在名目上又大了一层，但统治范围仍旧。奇文英将那森达赖另一个族弟——典什（奇玉成）营长，提升为管旗章京，并要求奇凤鸣将一个达庆牌划归典什临时管理。奇文英企图引起典什和奇凤鸣争地盘的冲突，但奇凤鸣是个老官僚，早洞悉奇文英的奸计，而自己管理的是富区，又新得了四、十队大烟产区，不愿再因此坝梁山地而冲突，所以拱手推让给典什。他的这种做法，使典什惊讶不已，不用说前怨尽释，还亲自去万和堂向奇凤鸣再三道谢不已。典什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和奇凤鸣的关系很好，我曾记得他在我叔父奇凤鸣面前恳切述谈时，不断地咒骂奇文英野蛮专横，不会给旗下做一件好事，自己白白给他打了天下。我当时已十五、六岁，人情世故也明白了不少，也暗暗佩服我叔父的这样翻云复雨

的手法，对分化奇文英的力量是最高明的了。我从小就是受我叔父这样的陶冶的，因此也树立下我狡猾的性格。

二奇在爭夺准格尔旗統治权上，都挖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但对准格尔旗的建树，則毫不在心。只知爭夺权力，扩充軍隊，努力发财致富，打鬧他們自己的万世基业。

奇凤鳴和奇文英二人的思想和主张也不同。奇凤鳴狹隘民族观念浓厚，封建保守性强，奇文英性格粗魯，遇事蛮干，不計后果。但在“反共”問題上，两人的主张又能一致起来。奇文英部駐五字湾的韓营长(五台保)奉奇文英命令，向解放区府谷地区不断挑衅、搶劫，并向省府报功，傅作义为使蒙旗部队更积极的“反共”，于是宣布奇文英为蒙边司令（时在抗战前一年）。奇凤鳴因惧怕紅軍，所以竭力反对这样做，他对奇文英說：“人家与我們蒙旗毫不相干，为什么我們要出境欺負人家，再說共产党不简单，由南方打到北方，我們实在惹不起。”奇文英当面称是，实际还是那样縱容部下到解放区乱刀乱搶，最后在一次战役上，韓营长被俘，奇文英才知道紅軍不是好惹的（韓营长后来被以礼送回，并向他說：我們共产党不打你們蒙古人，希望你们也不要打我們）。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綏包相繼淪陷。德王在归綏召集各蒙旗的王公，准备宣布成立伪蒙疆自治政府开国大会。奇文英、奇凤鳴又暂停了他們的爭端，相約同去归綏，在这个傀儡政权中准备爭得一席。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伪政权的老官僚們，自居“劳苦功高”，不把他們看在眼里。一般不

明白西部伊克昭盟形势的，认为“皇軍”赫赫的战果，伊克昭盟弹丸之地当然不在話下，再加上两个协理不过是王爷之下的仕官，更加鄙視。吳鶴齡这个心高气傲的反动头子，对伊克昭盟参加會議的王公协理当面諷刺：“过去你們就想不到蒙古的自治，今天就来赶現成。”这使远涉归綏的奇文英、奇凤鳴很扫兴。他俩的政治活动和听取會議的結果，大失所望。日本人蛮橫狡猾，伪蒙官吏爭权夺利，一片大捧“皇軍”声中，絲毫沒有他俩的份儿。才使他俩失望而返。

奇文英回了神山，远离抗日前綫，偏踞一隅，看风使舵，奇凤鳴住在准格尔旗北部一带，正是日伪和抗战派角逐的地方，他为了自己地盘利益，明里和抗战派拉攏，暗中还向日伪方面偷送秋波，两面討好，以图自保。他支使駐河套的部队，假称归順了日伪，为的是保全河套稅收和粮草，实际权力当然仍在他手中。

国民党特务滿天飞，他們借机詭詐，威胁奇凤鳴日甚一日。奇文英看到有机可乘，也假造許多投敌的罪状来陷害奇凤鳴，国民党中央鞭长莫及，只囑靠近准格尔旗的特务机构調查和防范。一九三七年底馬占山东北挺进軍的騎六师、騎三师、騎一旅、特务营等約五千多騎兵，由后套經达拉特旗、东胜县抵准格尔旗沙圪都，途中解决了刘牛的部队和康王府，并把刘牛、康王俘虏，帶到准格尔旗。当时准旗人心惶乱，官兵情急，力主抗拒馬軍。但奇文英束手无策，典什已死，奇凤鳴主张让馬部駐屯，自己严守中立，开始和馬部派人联

絡，声明此点。

馬占山开到准格尔旗时，已偵察到准格尔旗軍力雄厚（約三千之众，在抗战开始后，奇文英又收編了四、五百地方汉人部队，成立护路队，奇凤鳴也不示弱，收編了薩拉齐县保卫团四、五百人，枕戈待旦，冲突起来，强龙也难能战胜这两个地头蛇）。因此，馬才几次表示，决不危害准格尔旗两协理的权利，他的軍隊保証和保安队保持永远友好关系。

主軍和客軍虽然暂时安定下来，但国民党軍并没有放松破坏奇凤鳴和奇文英軍力的活动，結果斗争愈烈。他們二人收編的汉人保卫团也让馬占山乘机拉过去了。奇凤鳴收編的薩拉齐县保卫团，归馬占山編成騎兵第二旅，旅长刘盛伍，奇文英收編的护路队归馬占山后，編成騎兵第三旅，韓遇春为旅长。这时馬占山看到准旗兵力分散，不能集中，态度就硬起来了。吓得奇文英慌忙調动他的部下，集中在神山。奇凤鳴部在大营盘駐屯的楊章連营，和馬占山部騎六师冲突起来，奇凤鳴一方面集中自己的兵力应援，一方面向伪蒙軍呼吁，伪蒙軍第四师的十二团赶来应援，目的当然在爭取奇凤鳴投降日本。在大营盘激战結果，馬占山軍損失很大，敗退回沙圪都，他的挺进军司令部，挪在府谷的哈拉寨。他开始又来了个和平攻势，向奇文英尽力拉攏，說：“我們和您友好，共同抗日。”对奇凤鳴說，“这是場誤会，我决不侵犯您的权利，請您回万和堂主持您的地方秩序。”（那时因战争发生，我叔父顾虑万一失敗，家管受累，将后方挪在准旗河北

將軍審子堂)。奇鳳鳴自然不愿完全放棄在河南岸的利益，又移回河南萬和堂，和馬占山又重新有了來往。

一九三八年秋天，聽到傅作義駐紮河曲，奇鳳鳴派我和秘書李碧青帶著禮物去哈拉寨和河曲活動。我先去哈拉寨送馬占山一千兩大烟，馬受禮後，表示了諒解。到河曲謁見傅作義，送了一匹走馬，傅也同樣表示諒解。我認為大功告成，在由河曲返旗途中，順便可以拜訪奇文英，談判一下今后的團結問題，我認為准格爾旗環境這樣惡劣，這兩大實力派應該共同為今後打算，同舟共濟。

但奇文英的態度則是吞吞吐吐，不愿給我一個干脆的正面答復，我很懷疑，忙掛電話（奇鳳鳴和奇文英府雖相距二百華里之遙，但已設下電話綫，能直接談話）報告給我叔父我在神山。我叔父在電話中很嚴厲地命令我立刻回來。于是我猜到他們關係的嚴重性，在兩個月時間內關係更加惡化了。

我返家後，才知道奇文英不止一次地向國民黨報告說我們叔侄危害抗戰、通日有據的罪狀。但我叔父明知奇文英也和日偽暗通聲氣，他認為：自己旗內的家事，不應該對外人宣揚。實際上，他在表面上是盡量克制，內心對奇文英卻恨透了。

一九三九年春天，剛過陰歷年，歸馬占山指揮的先遣軍，在總司令白鳳翔親自率領下，突然開到召灣，白率他的手槍隊和衛士要進我家。但他看到萬和堂房上炮樓內布滿了保安

队时，就在半里多路外下了馬，派副官持名信片进来交涉，說：“北上抗日，途經这里，特地来看望西官府（西协理），別无他意。”我主张让他們在外面駐扎。李碧青秘书向前进言：“白司令是全国聞名的英雄，况且北上抗日題目正大，我們应尽地主之誼。”我叔父打不定主意，亲自上房看了看，来的軍队并不多，认为放进来也沒有关系。誰知后面源源不断，繼續进来不少，形成主客顛倒，众寡悬殊了。

我們猜測到“白司令”的北上抗日是个招牌，国民党根本就沒有高級軍官率領部队敢于挺进敌后，奋勇抗日的事。我們受騙了。几日后，晚間的崗哨，双方逐漸增多，保安队一个哨，他們就是两个崗。保安队站两个崗，他們一定增加成四个。每日亲自查看，都是如此，使我大吃一惊。这一种不安的預兆，我报告給叔父，他說：“事已如此，听天由命吧！”我又不断拜訪白凤翔，白对我很客气，表示出一付豪爽坦白的“綠林英雄”的姿态。他不断叙述他在西安事变时，活捉蔣介石扮演“捉放曹”的那个角色。

我和他的几次談話，也摸不清他對我們的態度，他的部下同样是守口如瓶，但在一次談話中，白透露出：“奇文英报告过‘中央’，但‘中央’不能听信他一面之詞，我已和您的老人（指我叔父）結拜为金兰之好（这是我从他口中得悉的），我一定帮助我这个老大哥。”第二次又向我提出时，态度虽然溫和，口气是很坚决的，他說：“您們要果斷，愿意归順日本，可以帶上你們部队全渡河，我決定給你們一个

方便。要抗战，命令河北部队和日本打一仗，不论战争胜败，皆可以洗刷你们的嫌疑。”这算是最后的警告了。时李碧青秘书说：“白司令烟瘾很大，应该送他些人情，好替我们说话。”我叔父前后送了白凤翔不少大烟，并将自己一匹乘坐的大青马送给了他，他再三称谢。这是当时官场中的人情世故，也是恃强凌弱的应得的报酬。

数日后，奇凤鸣看情况不妙，打算去哈拉寨谒见马占山。但白凤翔、李碧青一力阻止，说：“那样一来，事情更难办了！”

在这个紧张的时候，我的岳家送来了新娘子，要求我们快些结婚，我当时是十九岁，在举行结婚典礼时，白凤翔和他的部下军官都送了礼。表面上还是和和气气，一点芥蒂也看不出，实际在附近驻防的白部同我们的保安队早有了磨擦，互相防范得也很严了。几乎每个人都是弹药满身，枪不离手，火一点就着的局势。

我家万和堂，离河仅有数里，时黄河已开，高龙渡口的南岸，被白凤翔部抢占，已切断我们向北走的退路。一日，日本军在河北巡查过来，隔河和白凤翔部战斗一阵。日本野炮在次日隔河轰击南岸的白部，我们的几间房也被炸塌了。白凤翔偕同我叔父迁移到离河三十多里的新召。我随家眷到西河头。这样我们兵力更为分散，我叔父跟前只有几个卫士。当晚，白发动缴我们械的战斗。我叔父在他的重兵包围中，自然容易解决。他解决驻新召的一队人马（约三十多人），

战斗就打开了。我听到枪声这样密集，就忙着布置战斗，一面派出二十多人，赶紧去新召支援。半夜后白的部队包围了我的住所。我身边仅三十多人，但仍沉着抵抗，白的迫击炮、重机关枪等轻重武器，都用在我的头上。其它驻屯外地的保安队，聞枪声已退入沙漠，故損失輕微。

由半夜打到早晨，白部不断增加人馬，我們毫无外援，包围圈子愈来愈小，情况不妙，我只好令将后墙挖开，让我的新婚妻子和亲属們，在我掩护下撤退。她們的撤退成功了，而我和几个射击手，再也无法逃跑了。忽然白部止住枪声，說：“奇凤鳴的手令，要奇子祥繳械投誠。”这时我已負伤，只好順水推舟的遵照命令了。

我被当俘虏送到新召时，白立刻接見，一面令軍医給我洗大腿枪伤，連呼：“誤会，誤会。”但他再也无法自圓其說了。

“子祥呀，你的叔父性格粗暴，你們保安队有意識地挑釁，我怕出大問題，才不得不繳收你們的枪，等事情停息后，你們的家产、枪炮子弹一样也少不了，完全奉还給你們。唉！我太对不起我的老大哥了。凤鳴大哥在一气之下，吞下了金戒指，軍医搶救結果，看来性命是不要紧了，唉！”白凤翔表示出异常为难和惋惜不忍的样子。我也表现出万分歉意說：

“誤会太深了。”我二人真像舞台上的一对老小丑，互相一吹一唱地各自欺騙着对方。

白凤翔同意了我侍奉我叔父，我会晤我叔父时，他的脖

項腫起，面部青黑色，噪着嘶啞，我不由伏在他身上号啕大哭。我这样悲痛还是平生第一次。因在我童年父母双亲早逝，全凭我叔父撫育，他对我如严父般监督、慈母般爱护，偏疼偏爱。有时孀母对我有所忌妒，他总是袒护我，說：“子祥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不用給他气受！”当我年龄逐渐大了一点时，他开始培养我，信任我。已让我参与了軍政要务。

但他今天看到我放声痛哭时，用嘶啞不清的声音，严厉制止我。他說：“男子十五岁夺父志，你應該挺起骨头来。”因为跟前不断有白的卫士来往，我們都不敢多說。

次日，瞅外人不在跟前时，他忿怒地說：“你在我身边，打算父子同死嗎？”随着咬牙握拳狠狠地說：“目前我还一下死不了，你想办法，赶紧走开，頂起我的天地，对那些狼心狗肺的仇人，决不能留情。”說着他一比划，我孀母从枕头中取出一支馬牌樓子，我忙接过来別在身上。我只含泪說了声：“您別胡思乱想，多加保重！”

我自从受到这一段“庭訓”后，一心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撑起我們的“天下”。恰巧白凤翔得到一个情报說，“奇凤鳴的残余部众，集合在沙漠里，要凭險和国軍对抗。”白凤翔立刻召見了我，謙虛地留我吃飯喝酒，慢慢地他才說：“这是次严重的誤会，我为了对得起我的凤鳴老大哥，决定保你担任保安队旅长，管轄你們原有的部下，枪支馬匹财产都交給你，你的老人，实在不适于带軍隊了，你年青有为，

拿起来干吧！”

我虽然连称“谢谢您的栽培”，但我根本不相信这个胡子头儿，能将吃进去的肥肉吐出来。接着他说出第二套话，

“你能收拾起你的保安队吗？听说，跑在沙漠里的保安队，还要对国军进犯，那样一来，我保举你当旅长，恐怕‘中央’批不准，我又不忍再派军队进沙漠里缴他们的武器。唉，你想想看怎么办？”我说：“我实在收拾不起他们的，但在您大力帮助下，试一试看吧！”我表示出很为难的样子。

白又问：“那末河北的保安队呢？”我说：“我用我叔父的名义和您的威力，想尽办法，多给他们解释，最好把他们调在一个地区听候您整编。只是我离不开我叔父，他是那样执拗。”白正色向我说：“尽忠不能尽孝，你办的办法很对，赶紧就这样办吧。”

事情刚定下来后，白部守高龙渡口的樊大队长匆匆赶来报告：“河套的保安队，听见奇风鸣遇险，他们请了日本人替奇风鸣报仇，在炮火掩护下，几次打算渡河，看样子今晚一定要强渡，请司令增派援军。”我看他神色仓皇，禁不住失笑。白在听报告时口中含着一支香烟，看来很悠闲自得的样子，但不时他偷看一下我的面孔。于是计划又改变了，让我先去河北了。

我和我叔父就此诀别了，我连夜奔到河北。我叔父在我走后次日，由马占山派专人来接，不管他身体怎么软弱，架在马上就走。白凤翔亲自率领着部队送我叔父到哈拉寨。途

中經過沙圪都住下時，納林得力格擺下酒宴招待。我叔父和白鳳翔話不投機，順手拿起一支烟槍狠狠地在白鳳翔腦袋上撻了几下，白措手不及被打得昏倒。白的副官、衛士齊奔上，立刻將我叔父捆起毒打，時我叔父雖吞金未死，但身體異常衰弱，在他們拷打之下，身體受了重傷，所以剛一到哈拉寨扶下馬時，已奄奄一息。馬占山得悉，忙叫軍醫打針吃葯已無濟於事。馬只說了一句：“又給國家增加了麻煩！”是的，要給你們增加些麻煩了。

我叔父死後，馬占山和白鳳翔假惺惺地派人來向我謝罪，並要我來扶靈。我派人將我叔父靈柩運回埋葬了。我從此打起報仇雪恨的旗幟，召開了河套軍官士紳的會議，我繼任了我叔父的西協理兼保安總隊長，宣布了投日。幾個月後，將我們隔在河南已歸奇文英收編的保安隊活動過來，甘心助紂為惡，參加了偽蒙政權。日偽自然樂於接待我，並給我加了正式委任，借此他們可以進一步號召伊克昭盟王公。

不久，奇文英就派來使者——奇副官和我談判，希望我們一南一北，共同維持准格爾旗。如抗戰派勝利，他一定支持我，使我的權利不受一點損失；如日偽佔領了伊克昭盟，那就要求我大力維持他的權利了。這個協定是滿好的，虧他至工心計地想出這末一套玲瓏剔透的妙策來。

但奇文英畢竟是個粗直人，常常暴露出恨我的意思來。他曾給他的部隊下命令，陳述了我的罪狀，這個文件也同樣發給暫時歸他收編而以後又跑過河北找我的二百多保安隊。

有一次他忽然召集了附近駐防的保安队，正顏厉色訓話一陣：“最近奇子祥將河套人民的錢，每亩按十块白洋强逼出来，都交与日本人。大家看他把咱准旗要卖了！”实际日本人在抗战八年中，未向我要过一个錢，要我用这块地方維持自己的队伍，他們是打算扔下餌子釣大魚，想怀柔整个伊克昭盟的王公和人民呢。

我虽然正式归順了日伪，还未忘情于国民党，和奇文英与日伪暗送秋波一样，但我采取的是远交近攻的办法。对远在后套的傅作义，勾勾搭搭，时派代表联络，求得他諒解。对馬占山的挺进军，是利用每一个可能利用的机会发动进攻，在冬季黄河封冻时，日軍汽車到过河南，我就协同他們进攻。但在夏季时，我只率領自己的本部人馬强渡过黄河，几次和馬占山的新編騎五师慕兴亚部，在河南岸七宝窰子、新召等地展开过爭夺战。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白凤翔从我叔父死后，他就开往后套，旋归順了日本）在准格尔旗迫害人民，蹂躪地方，引起全旗蒙汉人民的公憤，我又打着报仇雪恨的旗帜，这样可以算“师出有名”。并借此以博得群众——尤其一些落后的蒙古人拥护，从而企图达到自己吞并全旗政权的目的。傅作义在我思想里还有个好印象，同时我估計他是想利用实力派，如我的企图——夺取准格尔旗的軍政大权成为事实时，他自会順水推舟予以承认。我如拥有准格尔旗这样的兵力，就是以后无论誰胜誰敗，对我的政治地位也不至于輕易动摇。这是我当时的思想

动机，也是当时伊克昭盟各旗每一个王公的两面派手法和目的。在今日看来是很卑鄙的。

在权利比赛上，奇文英和我虽是两个阵营，但各不相上下。权，他抓得更紧；利，每日横征暴敛，无限制地摊派和用尽心机覓利的办法。最有趣的是提拔他全家，大有鸡犬升天的模样。他是准格尔旗代理扎薩克兼东协理、保安司令、伊克昭盟警备第一区司令，以及国民党准格尔旗的书记长，什么主任和委员之类，数不胜数，他的名信片上有一大堆头衔。长孙奇涌泉西协理兼警备副司令，次孙奇玉泉军需处长，三孙奇茂泉特务营长，哥哥奇炎山保安副司令，侄儿奇子理第二团长，两个女婿都是“达庆”（等于区长），真是“满朝朱紫贵，尽是一家人”。

这样自然会引起部下军官的忌妒和不满。加上他这些子孙都是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只知吃、喝、嫖、赌、抽大烟，日益加重人民的负担。在奇文英死后，就连他们多年的老军官都貌合神离，不愿替他们出力。当骑四师援助他们时，就连骑四师师长刘春芳也为他们担心。

在抗战八年中，奇文英不断和日伪联系，在我投日伪后，他和日伪取得联系多半是经过我这个关口。他前后派的人很多，最主要的一次是派他侄儿——第二团团长奇子理来河套的那一次。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初，渡河消灭了挺进军五师守河部队四个连，马占山主力出动和我激战于新召、七宝窰子等地。马军怕奇文英部乘虚解决他的后方，动员奇文英部也

开往前方协助他作战。奇文英为了应付，派了三、四百人由奇子理带着开到离前綫不远停下来，奇子理偷偷单人跑到我那里，提出共同消灭挺进军、前后夹攻的计划。日军队长专门请他吃了饭，成立了临时协定。他代表奇文英希望日军配合行动（出河南仅是我的孤军作战，日人因沙漠和黄河天险，不利机械化部队活动，并没有出动）。但因奇子理事机不密，被部下几个汉人侦知，正打算报告挺进军，奇子理就把这几个汉人活埋在沙漠中。马占山得悉后，忙让奇子理率部回神山。他们在神山都集中起来，准备迎击马占山。恰巧那次河套遭水灾，我不得不撤回河南岸的部队，才避免了事态扩大。不久，马占山和奇文英又“言归于好”。实际上是剑拔弩张地对峙着。陈长捷曾提出用“中央”骑七师协助挺进军消灭奇文英，因傅作义不同意而作罢。

我和奇文英始终保持着一一定关系，我丝毫没有表露出怨恨他的样子，怕他认真协助马占山来对付我。他最初常无理地对人谩骂我，当奇治国当了王爷，和他发生了权利纠纷时，他对我的态度又立刻改变过来，表面上再也不骂我了。

在奇文英尽力布置他的“家天下”时，已引起了准格尔旗王爷和王爷的母亲的怀疑。本来王爷老太太和奇文英早已不睦，加上奇文英无视王府，一切政令全由己出，自己子孙又都提拔成旗内高级军政官员，一时都说奇文英有“篡位”企图，使这个老少孤儿寡妇深深不安，只好争求外援，投拜

在馬占山門下——王爺奇治國拜馬占山為干父。馬滿口應承支持王爺，分散奇文英的勢力。

一九四三年奇治國已年滿十八歲，是可以正式繼位管理旗政的時候了。但奇文英拖延不想交出大印。并向盟長報告准格爾旗王爺癡呆，不能管理旗政。可是早已和奇文英鬧矛盾、幾乎兵戎相見的東北挺進軍領導人，都愿支持奇治國。同時在准格爾旗河南部有潛勢力的兩大家族——奇尙斌和奇致中（那森達賴的孫子）也愿意擁護王爺繼位。奇治國有內外這些勢力的支持，胆壯起來，決定親自去扎薩克旗盟長府辦理接收旗政的事。奇文英在不得已情況下也同意了奇治國母子去會見盟長。

奇治國和陪他一塊去的奇尙斌在盟長府活動得還不錯，由盟長府上報蒙藏委員會和綏遠省政府備案，正式委奇治國為準格爾旗扎薩克，回旗接印視事。

王爺接印，是在准格爾旗德盛西隆重舉行的，馬占山和他的高級軍官都親自出席，我也曾秘密派補連保去慶賀。奇文英是在無可奈何下親自捧上王爺大印出席的。交印典禮是馬部五師師長慕新亞組織的。會場里充滿了陰森和殺氣，布置了數百個持手槍、提機槍、武裝整齊的國民黨士兵，圍着大印，表演得賽如鴻門宴。當司儀喊交印開始時，奇文英雙手剛把印交給奇治國，就聽到馬部特務營長徐國華一聲號令，幾百支大小槍完全沖向主席台，打開機頭，大喊一聲，使許多參加會的人膽戰心驚，尤其害怕的是奇文英，手足無措，

不知該怎样才好。接着馬占山讲了話，他說：“从此奇治国就是准格尔旗的当家人了，你們都要拥护，誰要不服从，媽的巴子，我馬占山就要以武力对待。”說了一陣威吓的話后，又獎勵了几句奇文英，說：“老司令是有功的，替你（指王爺）看了多少年門，实在是个大忠臣，你應該爱护。”老馬对奇文英软硬兼施地耍了一套，最后才表演奇治国袍笏登場。

在王爺大婚問題上，又发生了糾紛，奇文英竭力主張娶他的外甥女儿，馬占山也贊成，奇治国母子虽不大愿意，也不敢违抗，于是择吉成礼，奇文英利用外甥女儿做內綫来監視王府。矛盾愈加发展。奇治国听从了奇尙斌的意見，大力扩展軍隊，除将自己駐在王府的郝德明扩編成大队外，委任了奇尙斌、奇致中两个大队，讓他們扩充兵力，来对抗奇文英。这样一來，全旗百姓們的負担倍加深重。当时，准格尔旗河南地区人民，以树叶糠菜充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沒褲了穿，言之令人心酸。王爺登基，稅务加重，人民抱怨情緒更大。

一九四五年春天，登基还不到三年的奇治国，因烟色过度夭逝了。爭权夺利的巨大风波又起。奇尙斌力主由王府有势力的人团结一起，支持王爺老太太摄政，同奇文英对抗。当时在王府的官員为保持自己的权利都同意了。但奇文英为了得到王爺的大印，誘惑奇致中說：“我們是家人父子，胳膊不能向外扭，你取回印来就給你个协理。”奇致中是那森

达赖的长孙，十五岁就掌起偌大的家政，他常想利用乃祖的余蔭，以及朝三暮四的手法，在准格尔旗爭得一个政治地位。因此，奇致中权利熏心，演了一场“逼宫”，把印夺来交给奇文英，誰想奇文英得印后来了个翻脸不认賬，大印到手就踢开了奇致中。

日本投降后，我已担任了国民党騎兵第二旅旅长，我对奇文英虽有仇恨，但认为他不是杀害我叔父的主凶人。主凶人我当时认为是白凤翔。因此，在白凤翔投降日本后，担任了东亚同盟軍总司令（防地是后山黑教洋堂），在他常来往包头时，我几次派人打算在街头上刺死他，但未成功，后因他贪色过分，得癆病而死，我也算去了一番心事。同时我认为国民党的組訓处、桃力民办事处，都是分裂蒙旗前車之鉴。如蒙旗内部再起冲突，我們誰也解决不了誰的武装，只能便宜了分化我們的国民党。我們不如团结起来，爭取內蒙古自治，以爭取自己的政治地位。說实話，我当时还没有刺杀奇文英的心意。例如，在我去包头西麻池謁見傅作义回来，就写好手书，派黃俊德（河北部达庆）、孙致远到神山，敦請他来党三窰子（我在河北部的駐地）共商准格尔旗合作事宜。他也应邀来到，相見时我特地对这位长辈表示了尊重，命令部队吹号排队迎接，我也用了晚辈的礼节叩見了他。当时他很滿意，在欢迎他的大会上讲了話，表示推誠相見，永远合作。随即偕同我去了归綏，同住在南順城街杜家的院內。每日同去应酬，参加过很多次蒙旗會議，那时好似以往

的隔閡从此一笔勾銷了似的。但是环境不允許我們那样去做，何况他和我都是权利心很浓厚的人。我在党三窑子接待奇文英时，我的嫡母責备我忘了不共戴天的仇恨，許多部下进言是：奇文英阴险毒辣，我又要受他的暗害。王府老太太对我是痛哭流涕，硬說奇治国是奇文英用毒葯害死的（因奇文英給奇治国王爷介紹了一位厨师，当王爷有病时，这个厨师就返回神山去了，奇治国死后腹部黑青，似受毒死的），坚請我替他儿子报仇，莫忘了老官府（指奇凤鳴）的遺囑。这使我左右为难，不知該怎样应付她們两位老人家才好。

奇文英向我談奇致中，囑我應該小心防范。他讲的旗內斗争糾紛問題，此起彼落，但誰是誰非，他也鬧不清楚。总之，我看他对我的一切談話还算是誠懇的。最可笑的是日本投降后他的野心，他曾向我提出仿效西北“五馬”，在准格尔旗成立一个騎兵軍，由他担任軍长，我和奇涌泉各担任一个騎兵师长。他几次向我劝說：“西北五馬能独霸几省，我們要团结在一块，力量也不弱，你們年青人要能拥护老汉的話，咱們要求傅长官不成，再向‘中央’要求。”我給他解释：“‘中央’和傅长官絕不容許我們合在一起，尤其是我們准旗已負担这样重，养活不起这么多人馬。最好还是我們先拥护和支持內蒙古自治。”最后我同意在綏省供应的基础上，可以要求和活动，事情活动得如何，我也沒有过問，大約遇阻了罢。因此他又怪怨我不向前，背后噴有煩言。他扫兴而去，后又派其孙奇涌泉和參謀长陈鎮波去重庆等地活

动，直到奇文英死后才返回（这是后話）。

一九四五年冬天，八路軍自卫反击綏包，我守了中立，同时也和八路軍建立了关系，我是看风使舵，誰胜归誰。因而引起了傅作义对我的怀疑。这时奇文英又乘机活跃起来，收集了我不少“通共”的資料，四次上报国民党中央和綏远省政府。此事发现和証实后，又引起我新仇与旧恨，立誓要消灭他的决心更为坚定。我亲自去了大营盘——准格尔旗中心地，王府衙門所在地。召集反对奇文英的奇尙斌、奇致中、郝德明等协商。王爷老太太不用說，是一力支持我消灭奇文英的。

在和这三位团长商議时，奇致中首先开口，坚决主张我們共同出兵，攻打神山。奇尙斌翘起大姆指夸贊奇致中的勇敢主张，那时奇致中几番表示了大义灭亲的意思（因奇文英是他爷爷的叔伯兄弟），可是郝德明皺着眉头半响不說話。我征求他的意見时，他說：“这样很不好，兴师动众，死伤人馬。再說，老司令已近六十岁的人了，等他死了以后，他的后代实在不成器，那时还怕不是我們的天下嗎？”我看他說的話也有理，一时拿不定主意。尤其我考虑，两方用兵战斗，国民党更有理由插足准格尔旗，那时准格尔旗会立刻变成县了。組訓处和桃力民办事处的影子，又反映在我头脑中了。但奇尙斌和奇致中还是坚决主张說：“攻打神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事情始終未肯定下来。当我在大营盘时，河南老乡成群結队跑来，跪在我跟前控告达尔古、达庆逼迫

要粮草。事情是这样的：馬占山的挺进军，在准旗征下粮草数万石，百姓們拖欠交不起。日本投降后馬軍已全部开走，但这些欠粮，奇文英仍然下令追索。百姓們不敢控告奇文英，只提达庆、达尔古。我利用这个机会，鼓动他們到綏远省政府等上級衙門告奇文英虐民的事。經我派人到各地鼓动之下，不少的人曾来綏远警备司令部、省府告过状。张国林曾向我的部下說过，这样是不济事的。其实我在政治上这样败坏奇文英名誉后，还要出奇制胜，暗来一手。

奇致中看到我不同意出兵攻打神山的計劃，就向奇文英报告在大营盘开会，商議攻打神山，因为他坚决不同意才作罢。奇文英迫于几方面形勢（我曾写信要求奇文英減輕人民負担，交出财务賬目，公布收支情况），又奖励奇致中“忠貞”，将奇致中提升为准旗财务处长——管理准格尔旗各种稅收的負責人。这样既能收买奇致中，又可以应付我。

我已下了决心准备刺杀奇文英，将我的后方設在大营盘（当时我的部队駐防归綏公喇嘛，距离后方太远了），駐扎下輜重队約七、八十人，由郝士英队长負責，并选择好十二个人，差不多都是我的卫士和副官，其他人我記不清名字了，有武耀宗（副官）、王庆保（副官）、郝士英（队长）、王二銀世（队长）等輪流去神山，名义上交涉粮草等軍需事宜，实际上打探情况，准备伺机下手。

这时奇文英和王府老太太正在爭执准格尔旗王位屬誰的問題。奇文英力主应由他自己来繼位，王爷老太太有我在背

后支持，力主应由我来继任。王爷老太太曾准备到郡王旗（时郡王旗图王担任盟长）给我打围王爷。奇文英得悉，也亲自打算去盟长那里，那时正是一九四六年阴历三月间，他们都打算在三月二十一日伊金霍洛祭成吉思汗陵时，届时各旗王公都到，可以活动一番。奇文英是阴历三月十五日由神山起身，途经暖水、西召赴伊金霍洛。这时武耀宗正在神山，打听得很清楚，他连夜返回大营盘，计划一番，十二个人一齐出发。每人带一支手枪和一支长枪，都马不停蹄地赶到暖水，侦察好奇文英刚走过不久，他们十二个人，分三路（每路四人）埋伏在三个要隘口，王庆保和武耀宗等四人，伏在一个沟里，让那两人凭借断墙残垣高地接应，王、武二人跑下沟底路口，一会观察到奇文英率领二十多人骑着马走过来，王庆保、武耀宗赶上去迎接，奇文英一见，猛然一惊，因为他认识是我的副官。他一手拔枪，一面勒马返回时，已来不及，王庆保左手持枪，右手还敬了个礼，武耀宗已端起枪来，一下正打在奇文英的肩上，王庆保第二枪打在奇文英的脑上，奇立时身死。跟随他的卫士纷纷拔出枪时，坡上开枪了，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死伤五、六人。只有一个跟奇文英的“烟门子”，摔下马来，说：“你们还要打死我吗？”这时王、武挥了一下手，说：“你快去吧，不准乱说。”于是王、武二人捡起死者的手枪，会合了埋伏的八人，上马急驰而去，暖水的保安队听说刺死了老司令，忙追了一会，也就返了回去。

这十二个人星夜赶回党三審子向我报告，我奖励了王庆保、武耀宗等直接刺死奇文英的四人每人五十两大烟，郝士英、王二銀世等八人每人二十两大烟。

我当时最不應該的是派了两連人进駐准格尔旗奇文英心腹地納林，打算威胁他的部队归順，我还給他們几个軍官写了誘降信，这样一来我刺杀奇文英的事就都暴露出来了。

我正在党三審子布置拉攏奇文英部下的事情时，突然由归綏派来国民党綏远省党部委員高乐山（他和我有很好的友誼），說是奉傅作义命叫我去归綏共同协商准格尔旗善后事宜，我当时犹疑很久，但认为高和我是“心腹之交”，去也沒有什么。我到了薩县，謁見了董其武（和高同来誘我的）、何文鼎（駐薩县的六十七軍軍长），他們一直在欺哄着我。我和董、高偕同到归綏后，立刻被軟禁在騎二旅駐綏办事处內。几个月后又轉到軍法处，軍法处长刘鑫和姓牛的主任法官，审判了我几次，他們对杀死奇文英案，倒不重視，注意的是和八路軍的关系。我忽然回忆起和董其武共坐大汽車去归綏的那一段晤談。董在途中不断問我，刺死奇文英关系不太大，主要的是有共产党作怪嗎？（原意如此）他特別关心的是共产党。于是我恍然大悟起来，蒙旗內部斗争、残杀，在他們看来是司空見慣的事，本不足为怪，可怪的是“通共”嫌疑罪大。

最后我受了一年零四个月軍法处監獄的“优待”，不了了之。我没有什么罪状，奇文英还是一死而已。

当我被哄骗离开旗下时，傅部骑四师由托县渡河迳抵准格尔旗的神山，和奇炎山等会商后，全力讨伐我的部队。我驻纳林的部队完全退入河套。大营盘辮重队还摸不清头绪，都让骑四师缴了械，郝德明驻王府部，开枪抵抗。这时辮重队内的郝士英假称替骑四师联系缴枪，乘机逃到郝德明部，一面抵抗，一面撤退到河北地区。刘春芳最后查清跑了郝士英，在忿怒之下，捆起郝士英的随从楊膺亥，听了奇致中的建议，立刻当做凶手枪毙了。实际楊始终未参加这个凶杀案，但却做了准格尔旗贵族上层斗争中的牺牲品，成了替罪羊。

骑四师开到河北（奇文英部到大营盘就停止前进）用杀死奇子祥的威胁口吻，让我部缴出了重机枪和迫击炮等重武器，就算功德圆满的开拔了。

这时乘机要挟的人真是不少，最会弄钱的莫过于陈玉甲了，这位“蒙古通”是吃蒙古饭发家的。他奉傅作义命调查这案件到神山时，跪在奇文英灵前抚棺捶胸大哭：“老大哥您死的太冤屈了，兄弟我一定替您报仇。”他接见干孙子奇涌泉等时，牵着手抽抽咽咽地哭个不停，确实感动了神山的一家，为了替老司令报仇，送了他不少“人情”。随着他又去了楊家湾，向奇致中讨好说：“奇子祥和奇文英斗争中你持的态度太对了，准格尔旗就数你有前途，我和你通家之好，无条件帮你领导准格尔旗。”奇致中被打动，也送了不少“程仪”。接着他又去党三寨子向我家中说：“神山攻击的

很厉害，你们应该很好的活动，否则你们的人是够危险的。”我家送了他三件板子（三百两大烟）。

现在那十二个刺杀奇文英的人，除郝士英在后山被鄂友三乱兵打死外，其余都还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份武耀宗（现改名武振东，在固阳电机厂工作）来看我，带来酒肉，和我灯前话旧时，不由引起我无限感慨和无限歉疚，我不能设想我那时个人英雄主义和复仇主义那样强烈，在今天——换了人间，才唤醒我的恶梦，从而也认清了自己的罪状。

关于刺杀奇文英案两文的补充

奇 尙 斌

一

奇天祥写的材料，說到准格尔旗由西协理丹片尔开始就建立起保安队，应该訂正。丹片尔是我的叔高祖，他担任东协理时，正是清朝，那时清廷是不让蒙旗随便成立军队的。当时对抗归化城将军貽谷，是用的把式将，就是准格尔旗的群众，拿着火枪土炮，貽谷的军队是清朝的正规军，都是快枪洋炮，军火悬殊，抵抗不住，丹片尔被俘拿至归化城而惨遭杀害，所组织的群众武力也被打散。

那森达赖当了准旗的东协理，辛亥革命以后又加为輔国公銜，正遇上匪首三林子、四林子二人带有一小股土匪扰乱伊克昭盟后山等地，那森达赖为了防御这股土匪，并为扩充自己的势力，才成立了牌兵，带兵者称为兵官（等于地方部队），使用的枪支大部是自造火枪，仅有少数快枪（就是毛瑟、套筒等步枪），这些快枪，是那森达赖向各处私自购买

的，这是保安队的起源。

奇寿山在准格尔旗执政沒有半年，阴历正月初四政变至三月二十七日被奇文英消灭，共八十三天。

奇文英在那森达賴未死前，我没有記住他当过东协理和团长，我记得他那时当过暖水营长。

奇文英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消灭奇寿山时，奇寿山部的郝巨斌和韓根栋，为人阴险，野心勃勃，背叛了奇寿山，里应外合，沒有一天的時間，就把奇寿山消灭，郝、韓二人就算是奇文英的有功之人，当时奇文英虽然沒被任准格尔旗要职，但实际上軍权在手，就发表郝巨斌为混成团长，郝茂林、楊漳蓮、黃得山和郝允恭为四个营长，韓守信、韓根栋二人为直属連长，其他軍政人員大部沒有动。

在奇文英的操縱下，不久即召开旗务會議，召集衙門仕官、团长、連长、五对（参領）、章盖（佐領）、达庆（区长）、达尔古（乡长）等人員参加，我那时担任达庆。形式上是全旗會議，实质上是奇文英的独裁會議，郝巨斌、韓根栋是幕后參謀。

在會議上只是几个上层人員在搗鬼，拟将奇文英为东协理，原来老仕官“加克尔齐”（管旗章京）宮布扎布为西协理，奇凤鳴为“加克尔齐”，当时奇凤鳴口头答应，内心不服，會議的結果曾經上报沙盟长請求批准。

沙盟长接文后，深知奇凤鳴拥有一部兵力，恐怕准格尔旗的冲突不能熄灭，首先保荐奇文英为东协理，維持现状，

西協理和“加克爾齊”未便發表。以後，沙盟長認為要徹底處理，須派專人前往准格爾旗重新調查。當時也考慮到，准格爾旗沒有三個月就發生了兩次軍事衝突，也算是伊克昭盟大事，必須和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商討處理較為適當。

以後盟長派員（名字我已記不住了）赴綏時，又將准格爾旗情況了解了一番，才到達綏遠。那時正遇奇鳳鳴派副官王公蓋在綏遠為之活動西協理，省府和盟長大員研究後，決定奇鳳鳴擔任西協理。據說奇鳳鳴給沙盟長奉送禮洋八百元，才把西協理拿到手。又安排宮布扎布為代理扎薩克印務，只是管印而已。軍政大事都是由東西協理主持。安排典什為“加克爾齊”。准旗內部衝突至此才算暫告一段落。

奇文英和奇鳳鳴官已到手，首先爭奪軍權。奇文英早顧慮郝巨斌軍權大於自己，雖屬他管轄，一旦尾大不掉，很難統治全旗，最後就想方設法除掉郝巨斌。

一九三二年奇文英派郝巨斌團長赴綏遠省府交納本旗的大煙稅和結算准格爾旗在歸綏市的房租，一九三三年春天，奇文英借口郝巨斌交大煙稅時貪污二千多兩大煙，將房約私藏在綏遠，以此為理由，將混成團部槍支全部收回，部隊全部歸奇文英直接管理，以後又借機把郝巨斌暗殺。

韓根棟認為奇文英為人陰險，作事毒辣，先暗殺郝巨斌，然後就可能殺害他。逼迫無奈，前往綏遠省府想投奔一條活路，到歸綏後傅作義不在，由王靖國代理主席，韓根棟向省府報告奇文英在准格爾旗無辜殺害郝巨斌等所作所為極端惡

劣，請省府處理。省府一面派委員李實齋前往准格爾旗追查郝巨斌的死因，一面委韓根棟、郝允恭、黃得山、郝茂林為四個營長，直屬王靖國管轄（番號我記不住了）。

李實齋來到准格爾旗，把奇文英請到楊家灣，也沒有鬧出個明堂來。

同年陰曆五月在大營盤（王府所在地）召開楚格拉會，全旗軍政人員都參加，研究征收大煙稅問題，奇鳳鳴征收東北部大煙稅，奇文英征收西南部大煙稅，典什“加克爾齊”征收中部的第七牌一個達慶牌的大煙稅。他們三人為什麼能得到瓜分大煙稅地盤，乃因為有軍權有實力。

應交奇鳳鳴的第四牌和第六牌的大煙稅地區，因郝允恭、韓根棟駐紮，收煙稅時感到不便，奇鳳鳴考慮到有問題，耍了個手腕，讓郝允恭為他催征四、六牌的大煙稅。結果給郝允恭、韓根棟創造了獨攬大煙稅的機會，郝、韓從此就有了財政基礎，因而准格爾旗東部又出現了另一個獨立的局面。

奇文英和奇鳳鳴雖有矛盾，當郝允恭、韓根棟在准旗霸佔了大煙稅和不服從命令時，他們就又團結起來，在一九三三年陰曆十二月間和典什三方面出兵，把郝、韓兩部完全消滅了。

奇文英於一九三六年擔任代理扎薩克，有意想把小王爺奇治國母子置於死地，好篡奪正式扎薩克的地位。

一九四〇年，王府衛隊的楊明亮和衛隊營長楊漳蓮先後譁變，投誠奇子祥。奇文英就向國民黨中央電報奇治國母子

已有投日伪行为，請求处理，国民党中央責問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准格尔旗小王爷奇治国母子究竟如何？沙盟长复电謂“准旗小王爷奇治国母子投日伪問題，我負責处理，决出不了意外”。他派人将奇治国母子接到扎薩克旗，让奇治国在伊克昭盟中学讀書。但奇治国母子认为必有歹意，痛哭流涕，見了沙盟长后，奉送了厚礼，所以沙盟长也不提奇治国母子投日伪的問題，只是想办法給奇治国打鬧扎薩克。后来国民党中央批准奇治国袭职扎薩克。

一九四四年奇治国十八岁，已被批准为准格尔旗的扎薩克，就打算回到准格尔旗就职，但又恐怕奇文英不交代旗务。此时，奇致中和我，也受奇文英压迫，正沒有办法。我于阴历八月中旬前往扎薩克旗，想让沙盟长撑腰，到扎薩克旗后，沙盟长已决定奇治国回准格尔旗就扎薩克，这給了我們一个好的机会，奇致中和我都是准格尔旗保安团长，有一部分兵力，沙盟长认为奇治国回旗有我們拥护，所以就向国民党中央报告，說奇文英在准格尔旗弄得一場糊涂，現在把奇尙斌逼迫来扎旗，奇致中也有很大的意見，正在抗战期間急需处理，否則可能发生意外，奇治国回旗就可能解决准格尔旗的問題，并請令准格尔旗駐軍馬占山总司令协助。国民党中央采納了沙王的意見。

一九四〇年阴历十月初旬，沙盟长派东协理阿木固伦率領老瑞排长带兵三十余名，护送奇治国回旗。奇文英在沙盟长和馬占山的威力之下，不得不交出旗务，双方研究，十月

下旬在德盛西举行了奇治国扎薩克接印就职典礼，馬占山率領慕新亚师长亲来德盛西监交印务，在典礼上全旗軍政人員参加，馬占山主持一切，慕师严密戒备，旗內軍政人員排队立于院內，一个桌子上摆着旗印，馬占山、奇治国、奇文英三人站在桌旁，就像演戏似的，奇文英双手把印端过来，奇治国双手接住放在桌子上。接着就是馬占山讲话，大致說的是从今天起奇治国是准格尔旗的扎薩克，他要处理旗內行政事务，你們大家听他的話，誰要不听话时，媽的巴子，我要杀头。奇文英在准旗搞得不錯，給你們看門看得很好，又是你們的老前輩，你們要很好的尊重。会就这样結束了。

奇文英交印后，还想把准格尔旗大权一手操縱，就想把他的外孙女儿嫁給奇治国，亲自說恐怕奇治国不愿意，就托馬占山进行。馬占山于阴历十一月中旬請奇治国到哈拉寨，我与之同行，見了馬占山，馬对奇治国說：“奇文英想把他的外孙女儿給你为妻。”奇治国听到后一再推辞，极不愿意，馬占山接着說：“奇文英在准格尔旗有軍权，有实力，你和他虽有意見，不利用他就要找麻煩，你應該將計就計，用刘备的方法去作，让他賠了夫人又折兵，你是扎薩克，媽的巴子，这个不好，想娶三个五个女人未尝不可。”在馬占山再三劝解下，奇治国无法推辞，只好遵命。

騎四师来准格尔旗捕杀奇文英的凶手时，只抓住楊脑亥一人，第二日在大营盘枪毙，这是奇致中的主謀。騎四师由党三窰子开走很长時間后，据人說，奇子祥怕騎四师把凶手

郝士英抓住为他的人証，就由綏远派王秀秀給家里送話，要把郝士英杀死，以后桂保子前往二道壕将郝士英夫妇打死，尸体扔到黄河內。

二

刘映元写的《奇子祥刺杀奇文英的前前后后》，事实 and 經過，据我了解基本相符，但我回忆了一下，个别問題还有一点出入。

奇寿山政变发生于一九三二年阴历正月初四日，到阴历三月二十七日，就被奇文英消灭了。

我記得奇凤鳴没有当过准旗的梅林和管旗章京，只是当过空头团长，駐防于河套（將軍窩子、城奎海子等地）。

奇凤鳴被白凤翔扣捕后，在准旗新召乔金。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据说他的侄子奇子义过继給他为子。

奇文英于一九三六年任蒙古游击第一区司令，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又任保安司令，从这时起准格尔旗才正式有了保安队的番号。

奇文英派奇子礼到归綏跟日本人勾搭，我不記得。但派奇子礼去党三窩子和奇子祥勾搭过。

奇文英遇刺时，共死亡四人。凶手繞道返回党三窩子，以后郝士英由党三窩子返回大营盘原防地。

奇子祥刺杀奇文英后，傅作义派高乐山已經把他叫去綏远，騎四师到达党三窩子时奇子祥不在家。

（政协伊克昭盟委员会、政协准格尔旗委员会供稿）

奇文英的一生

白凤岐

奇文英出生于没落贵族（台吉）家庭，幼年寄居舅父家中，学了一年蒙文、两年汉文。十八岁时当了木匠。家中以农业为主，常与他人以木工换农工。到二十五岁，跟随了他亲伯兄那森达赖。这时那森达赖已升为准格尔旗记名协理，不久正式任东协理。他同那森达赖去北京住了半年，回来后成了那森达赖的随从。一九一三年奉那森达赖的命令，打了北洋政府设在准格尔旗五道嘎包的柴炭税卡和府谷古城的柴炭过境税局，第二年又去暗杀了老赖果三台吉罕将，因此有功，那森达赖委他为五队梅林。一九一八年他辞职回家务农，不时出去带帐房赶会赌博和收赌款。一九二一年夏季，那森达赖委他为巡防马队长，不过带队只三十余人。一九二七年冬季，王英进攻准格尔旗，那森达赖委奇文英为前敌总指挥。在此期间，准格尔旗正章京阿拉吞扎布曾与王英勾搭，反抗那森达赖。那森达赖即派奇文英协同赵祝千佛爷去沙圪堵见阿拉吞扎布，并由阿引见同王英会了面。王英的军队撤走后，那森达赖派人杀死了阿拉吞扎布，也怀疑奇文英与阿拉吞扎

布有勾結，派黑尔脑亥和楊光普到神山去刺殺奇文英。當時楊光普在村外等候，黑尔脑亥持槍進入奇文英住室，奇文英的隨從十餘人看見黑尔脑亥星夜前來，認定必有要事，都走來想聽一聽。黑尔脑亥看見人多不敢下手，假說傳達那森達賴的口令，請趙佛爺同奇指揮明日速回西召，有重要事相商。說畢就走了。趙奇二人看見黑尔脑亥行動慌張，猜想那森達賴暗派兵殺了阿拉吞扎布，此時莫不是對他們也要下毒手嗎？這時那森達賴的隨從副官黃拉坨勝給奇文英送來一信，黃與奇是好朋友。黃的信中說，他聽到那森達賴說奇文英不應該與阿拉吞扎布接近，成了阿拉吞扎布的心腹，就派隨從黑尔脑亥和楊光普刺殺奇文英，奇文英將信內情況告知趙佛爺，說他要到西召與那森達賴講理去，趙佛爺勸他不要太忙，明日到召上看情況再說。奇文英第二天到了西召，趙佛爺回了廟。奇文英到了那森達賴的院內，叫出黑尔脑亥連打帶罵說：“爺爺頂命去見王英，你孫子們坐享太平，還來殺我。”那森達賴聽見就喊：“烏力吉巴雅爾（奇文英的蒙名）不要打了，別人看我們弟兄和睦一致很眼紅，要用計離間我們，你聽了誰的話，如此發怒。”奇文英很生氣地說：“王英的軍隊全部撤走了，阿拉吞扎布前晚被人殺死。”那森達賴听了假傷心地說：“是哪里來的變兵殺了，定要究辦。”接着就給了奇文英大烟土五十兩、銀洋二百元，還拿出黃緞一匹，讓奇文英給趙佛爺送去。另外，給了奇文英的隨從一些銀元和大烟。這樣，奇文英與那森達賴就言歸于好了。

一九二七年冬，那森达賴的二儿子奇子俊，由馮玉祥委任为国民革命軍第二集团軍蒙兵第一路司令，次年四月奇子俊回旗，任本旗西协理，改編准格尔旗部队，委任奇文英为騎兵第三营营长，增补了人馬。秋后蒙兵第一路番号取消，奇文英改为准格尔旗地方騎兵第三营营长。一九二九年奇文英在駐地暖水建立市鎮，召集了附近十余家富戶，修盖了鋪房、街道，招集各地商人在此經商。奇文英自己开設了福和泉、福义泉、福庆堂等商号。

一九三二年阴历正月初四日早晨，那森达賴被阿拉吞扎布的儿子奇寿山刺杀，奇文英最初未表示抗議，原因是阿拉吞扎布生时与奇文英頗亲密，他也曾几乎被那森达賴刺杀。奇寿山派人到暖水請奇文英到了沙圪堵，称奇文英为叔父，奇文英住在沙圪堵福順成商号內，每日和奇寿山交談，談了三日，奇文英要回暖水，奇寿山送給奇文英大烟五十两，給奇文英所帶的部队发了薪金和补助办公費，发給連珠子弹五百粒。又以准格尔旗临时政府的名义改編奇文英之騎兵第三营为准格尔旗騎兵团，委任奇文英为团长，西召、德盛西两个連归奇文英指揮。奇文英回了暖水。

那森达賴被杀事并无人过問，奇寿山的执政有了初步基础。但是掌握准格尔旗的軍政大权，非报盟长加委是不行的。盟长沙克都尔扎布让奇寿山亲到扎薩克旗政府見面。此时，和奇寿山一同刺杀那森达賴父子的段得胜、楊青山、楊保保、楊那尔色等十余人(这些人原是奇子俊的护兵)，杀了那森

达賴父子后，就橫行霸道起来，想扩充自己的势力，便从駐外边的营、連着手，一面用金錢收买，一面拉攏士兵，段得胜去活动駐德盛西的奇玉成連，被奇玉成赶走，楊青山等以金錢大烟收买暖水奇文英团的第一排排长楊納彥泰。楊青山到不尔洞沟，将任保子的老婆硬行娶回。

旧历三月十五日奇寿山帶領卫队三十余人，銀洋三万余元，以祭成吉思汗陵为名去見盟长。到了扎薩克旗盟政府，見過盟长，奉送了礼物，由盟长沙克都尔扎布委任奇寿山为准格尔旗东协理代理扎薩克印务，接委后就便于三月二十一日祭了成吉思汗陵。

这时候德盛西駐防的奇玉成連长，因段得胜勾串該連官兵，到暖水团部汇报情况，奇文英也說出楊納彥泰被勾串的事，两人經過一天一夜的商討，决定劫杀奇寿山。当日派奇海风連长去西召，先与那森达賴的胞弟台僧二喇嘛接洽。二喇嘛說他是佛門子弟，不敢参予杀人的事，奇海风去和楊青山連长說知此事，楊青山很同意这样办。两人研究决定，奇寿山不日回来，要亲切的招待，派全連官兵东送到四道柳树附近行事。这样决定后，奇海风回到暖水报告給奇文英，在四道柳树附近两下夹攻，一网打尽。奇文英听了不同意在四道柳，因为这里川寬不易包围，决定在四道柳的西山霍已免沟下手。第二天給楊青山写了一封帶有命令式的信，内容是“照两連长的决定办事，包围的地点改为霍已免沟門，希你連坚决执行勿悞，本部即日开往此地等候”。派了一个农民送

这封信，誤把信交給了奇寿山的卫士。奇寿山当时就召集随从等人开会，共同决定改道而行，他們是走五各免尔梁、五兰不拉、大路崙、三道噢包返回沙圪堵的。第二天早上楊青山連长准备送行队伍去見奇寿山，始知奇寿山已走了。

奇寿山半夜偷走，奇文英急忙召集奇玉成、楊青山、奇海风三連长研究，下定决心攻沙圪堵。攻打的办法，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布告全旗軍政人員和蒙汉人民，說刺杀那森达賴的奇寿山一伙兵四出扰害人民，霸占民女，奸淫擄掠，无所不为，希望全旗父老兄弟共同消灭这一伙坏人，安定地方。第二，对駐沙圪堵的各营、連用說服招收办法，写信給郝茂林、楊漳蓮、郝允恭三个营长。再派地方老蒙民，到沙圪堵附近的官兵家属和沙圪堵街上进行宣传，內容是：現在奇寿山帶領的奇子俊卫队挑拨各营連官兵，互相制造仇恨，四出扰害人民，以致地方軍民不能安居乐业，希望各营、連长和全体官兵与我們共同消灭乱匪，成功之日，你我官兵原职原薪，駐原防，論功行賞，决不食言。这样写了几十份送到沙圪堵附近，亲串亲，友串友，不几日地方人民和軍隊都知道来打沙圪堵。第三，派人写信到府谷哈拉寨和駐軍段团联系，請他們援助。如此决定后，各回原防，将前时积存的金錢全部拿出来散給士兵，大摆筵席，定于旧历三月二十八日出发，兵分两路攻沙圪堵。

这一部署被奇寿山探悉，即召集有关人員，研究防守，决定楊漳蓮营长带全营前往哈拉不拉，防禦北部进犯之敌，

郝茂林营长带全营官兵前往霍昌梁一带抵抗西部来犯之敌，郝允恭营长带领全营官兵前往石籽弯一带堵击南部来犯之敌。各营负责固守阵地，如有紧急，有卫队支援，即时出发前往阵地防守。旧历三月二十九日清早，北路奇玉成部攻打哈拉不拉，守军杨漳莲部的官兵不作抵抗，节节后退，中午西路奇文英部亦到，如答信号一般打了两三枪就停下来，守霍昌梁阵地的郝茂林营的三个连的官兵，更与奇文英部走到一起，访问起亲友来。这些部队虽经过奇寿山改编，但还是那森达赖的旧部原封未动，只是增添了一些士兵，很快就归顺了奇文英。

郝茂林营的第二连连长杨红同保、排长杨福荣，因反对奇寿山被枪决。这一伙士兵都不满意奇寿山，到了下午五点钟全部会合一起向沙圪堵反攻，到六点左右进入那森达赖驻地杨家湾，一部攻入沙圪堵，打死杨青山、杨保保、孔猛肯、王仙保、黄喇嘛等五人，在杨家湾活捉了段继胜、杨纳尔包等二人。将奇寿山围在天聚德商号院内，这里是奇寿山设立的临时准格尔旗公署，奇寿山枪法好，将进攻的兵打死三人，其余再不敢进攻此院，到晚十时奇寿山偷了夜间口令，持大小枪两支，和盟长委他的东协理代理扎萨克委任状，准备要逃走，这时候奇寿山的亲随郝敬业，要求同走，奇寿山说：“人多了不好走出，我一人先到山西省境内的河曲台子塬，你明日上午急速前来，我在那里等你。”说毕，就向山西省的河曲方面逃去。

这时院内的馬夫王二小出来就到楊家湾报告，奇文英住在那森达賴家，正和那森达賴的老婆七太太談話，他俩一听说出賞格捉奇寿山，但不知奇寿山的去向。郝敬业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即去寻找他胞弟郝拉圪胜，郝拉圪胜是郝茂林营第一連連长葛茂荣的护兵，郝拉圪胜听了他胞兄郝敬业的話，就去告知他的連长葛茂荣，連长当夜去报告了奇文英，請求亲自去捉奇寿山，得到奇文英的允許。葛茂荣召集了郝敬业、郝拉圪胜、黃猛肯等，第二天早晨，四人一同騎馬追赶奇寿山，走到山西省河曲县境内的台子塢附近，即派郝敬业持枪去杀奇寿山，他們在一边埋伏。奇寿山一見郝敬业就問“你因何这时候才来？”郝敬业回答：“腿疼走不动了。”两人慌忙起身就走。未走半里，遇到一个深塢，郝敬业退到奇寿山的后面，提起連珠枪，向奇寿山的脊背，一枪打去，正中心部。葛茂荣連长听了枪声，急忙赶去一看，見奇寿山已被打死，就雇了一輛牛車将尸体拉上回去好請功領賞，因牛車走的慢，就委托車夫送楊家湾，他們四人第二天早上回到楊家湾报功。見了奇文英和七太太报告了打死奇寿山的經過。奇文英当面表揚了一番，就命令葛茂荣連长将奇寿山的尸体拉到沙圪堵，經過检查，奇文英下令买棺木埋在沙圪堵的东沙梁上，賞給葛茂荣等四人每人銀元宝两錠，那森达賴老婆七太太給每人銀洋一百元。

不久，在沙圪堵召集全部軍政人員开会（奇凤鳴未到，他采取了“两不反对坐待胜利”的办法），奇文英讲了話，

最后由韓遇春出面，大家推举奇文英担任全旗领导，当时奇文英也有顾虑，怕有奇寿山方面的人士出来反对，又怕盟长、綏省府不同意。他以稳步前进的办法，用全旗人民和軍政人員名义上报盟长和綏远省政府批示。第二天，将奇寿山沒收的那森达賴的銀洋元宝清点，发了軍餉，每个兵十五元，官佐以职別发給。剩下的錢物，設立起准格尔旗财务处管理，财务处长暫由梅林王凤鳴代理。旧历四月十一日，召开高級會議，参加會議人員为奇文英、奇炎山、奇玉成、王凤鳴、錢玉山、郝巨斌、韓遇春等人，會議开了三天，主要討論了那森达賴执政二十余年公私不分問題，會議決定，将那森达賴的财产分为公家六成，給他家留四成。立即清点，除金銀烟土外，一律納入清單，限四月底查点完毕。又确定在四月十四日那森达賴被刺百日，准备祭奠，是日上午十时召开祭奠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員集中了二百余人，由奇文英主祭讲了話，說那森达賴为准格尔旗立了大功，被人刺杀是我們的不幸，等等。說完开始祭奠，将刺杀那森达賴父子的段继胜、楊那尔包，在坟地执行枪决。祭奠完毕，旗內高級人員，衙門仕官、台吉（貴族）在那森达賴南院（奇子俊住室）开会，又以全旗人民名义上报盟长和綏远省政府，請批准东协理代理扎薩克奇文英、西协理宮布扎布、管旗章京台吉奇玉成。五月六日接到綏远省府的批准回电，五月十五日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派扎薩克旗管旗章京送来委任状，这是用金錢活动的結果，花費的主要數目是：敬貢盟长銀洋壹千元，盟长府的大

小管事人員另有股份，共計三千七百余元，又給送委任狀的管旗章京銀洋一百元。五月二十日在財務處召集旗府人員開會，擺宴慶賀，正式宣布這批新官上任。

奇文英、宮布扎布、奇玉成三人決定經濟收入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地方財政收入，是牲畜稅、賭博稅、地盤稅、地租等，第二部分是煙稅、訴訟費、罰款等。這樣劃分後，就宣布第一部分地方收入歸財務處管理，第二部分歸他們私人所有。正式成立了准格爾旗財務處，全旗經濟歸財務處管理。東西協理用款時，先向財務處借用，到年終結賬時，如是公用的報給財務處，登記在出項賬上，如是私用的款項，照數歸還。財務處和東西協理府形成鼎立而三。財務處以保護財經和討要欠賬為名，養有騎兵十餘名，接管民間詞訟、捕人、管押人等等。一九三二年冬季，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命令伊克昭盟沙克都爾扎布盟長，委任奇鳳鳴為准格爾旗西協理，沙盟長即派仕官兩名，持了省府命令，來到神山東協理奇文英家，協商此事，互相研究如何安置宮布扎布問題，大家研究以宮布扎布為掌印官府，稱為副王爺。宮布扎布也同意。盟長府的兩位差官又去萬和堂奇鳳鳴家通知他為准格爾旗西協理，奇鳳鳴喜出望外，就便送了這兩人大煙土和白洋，請盟長即日發來委任狀。同年十二月，沙克都爾扎布盟長發任免文件，是免去奇文英代理准格爾旗扎薩克職，委任宮布扎布為准格爾旗掌印官之職，免去宮布扎布西協理職務，委任奇鳳鳴為准格爾旗西協理。

十二月二十日在准格尔旗大营盘王府召开了封印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掌印官府官布扎布、东协理奇文英、西协理奇凤鸣、管旗章京奇玉成和东西梅林等政府行政人员，照例结算全年财政收入和支出。就便研究如何发展准格尔旗的经济，扩大收入，决定下年种大烟问题，为与綏远省府联系，先让奇凤鸣去綏远省政府探听一下。这种议事形式是那森达赖死后的第一次执行旧例的会议，那森达赖在时，是一家三人掌握全旗军政大权的家天下，现在废除了这个形式。

一九三三年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举行开印大会，照旧例摊派了各项捐款，进行了各项仪式完毕后，由奇凤鸣汇报綏省府允许种大烟，就便决定收烟税问题，每亩征收银洋五元，干烟土六两，以达庆牌（区）为单位收烟税，丈量地亩，造册上报协理。确定亩数后，每亩上缴银洋四元，干烟土五两，由达庆（区）达尔古（乡）从征收的款、烟中，按每亩留下银洋一元、干烟土一两，作为开支费。这样收过两年后，将留用银洋一元的規定取消，只留干烟土一两为费用，名为吃烟，由达庆自收自用。又研究划分征收范围问题。准格尔旗共有十三个达庆牌，按职权划分，东协理奇文英分了西部六个达庆牌（区），东部六个达庆牌为西协理奇凤鸣所有，中间一个达庆牌为管旗章京奇玉成所有，大营盘王府附近七个达尔古牌为衙门梅林所有，东西协理管理的界线以十里长川流水为分界。这个規定当初只限于征收烟税。不过两年，就形成了东西两个准格尔旗，由东西协理各管其半，各自为了

扩大私人的經濟收入，常越界受理人民的訴訟、罰款和接受賄賂等等。

一九三四年冬季，奇文英帶了大批大烟土，去山西省見閻錫山，請求補助枪炮子彈等，閻錫山允許發給七五迫击炮六門、晋三八式枪一百支、子彈一萬發，为了即時联系，允許架設電話，从河曲接綫，接到神山奇文英家。一九三五年春，河曲到神山的電話已接通，至此准格尔旗神山和山西省經常以電話通信。一九三五年旧历五月在大营盘王府召开旧例楚格拉大会，研究旗內按電話費用在軍餉項下借用。准格尔旗軍隊，那森达賴在時不發軍餉，只有往沙圪堵新軍每兵每月一元銀洋的補助費，奇壽山執政時每兵每月銀洋七元，奇文英執政每兵一次發了十五元銀洋，以后，減为每兵每月銀洋兩元五毛，因架設電話用款，借用兵餉銀洋一元五毛，以后只發給每兵每月銀洋一元。會議決定由財務处长奇宏智帶款五千元，前往天津購買安裝電話的器材。电杆由当地号用，接到哪里，由当地砍伐群众的树木使用。旧历九月从大营盘財務处开始架設電話，先通东协理府神山和西协理府万和堂，一九三六年春，普遍全旗各兵营，坝梁、德盛西、納林、沙圪堵、暖水、西召、五字湾、新召湾、大沟門、董家圪旦都接通電話。一九三七年春，北通綏远省的小教場，西南通榆林、神木，西北通东胜县，东南通山西省太原。十月架設至准格尔旗四队沙塔营，年底被挺进军破坏。一九三八年架設至榆树壕、高家塢、五尔免沟門、羊市塔、府谷县境

哈拉寨，形成准格尔旗四通八达的电话网。

一九三三年冬，掌印官官布扎布病故，扎薩克奇治国年幼，扎薩克由东协理奇文英代理。一九三六年奇文英去綏远省見了省主席傅作义，委奇文英为准格尔旗“剿匪”司令，回旗設立司令部、副官处、軍需处，委任他胞兄奇炎山为副司令，下設三个中队，九个分队，外設机炮队，共十个分队，将原有四百余人扩大到七百余，将庫存枪支和閻錫山發給的晋造枪全部拿出发給各队。一九三七年春，奉綏远省府命令“剿匪”司令部撤銷，改編为准格尔旗保安司令部，任命奇文英为保安司令。

旧历十月东北挺进军馬占山部退到东胜县，馬打电话叫奇文英到东胜县开会，奇即派中队长楊滿福到东胜参加會議，馬占山提出挺进军要到沙圪堵，馬亲自給奇打电话說：“我軍到貴旗沙圪堵，路經德盛西、納林、暖水等地，請老哥为本軍軍法总官，本軍如有违法乱紀扰害地方，扰害人民者，即拿法办，处理后，再报本軍部。我到沙圪堵稍作整理，即到貴府拜見。”奇文英回答說：“將軍到沙圪堵后我去見吧。”說完即开会研究警卫事項，決定由团附楊光普負責，以电话通知各队，馬占山軍要来我旗沙圪堵駐防，各队严加防守营盘，急速将外出的官兵，即日調回部队，严防丢失馬匹枪彈，队长負責保护营盘等等。十月二十二日馬占山同騎兵第六师师长刘桂五已到沙圪堵，騎兵第三师师长井得泉已到府谷哈拉寨。住了月余，因給养困难，派兵四出要粮，見

窖就开，見草就拉，猪羊肉等等食物无所不要，一不如意，非打即罵，这就造成了全旗的混乱状态，各地电话报告搶夺人民財物的事陆續不断。奇文英接到各地电话，日夜不安，即派团附楊光普和沙圪堵的商人张三銀祥，一同去見馬占山、刘桂五，报告馬部不守紀律，主要提出李广亨的別动队，馬占山第二天就将李广亨部收枪解散，但馬部依然在准旗四出搶掠，危害人民达数年之久。

十一月初刘桂五提出向准格尔旗要战馬三百匹以补缺額，馬价由軍部現付，奇文英无法，三次交了二百余匹，刘桂五追要不息，奇文英請馬占山、刘桂五到神山家中吃飯，就便将自己的好馬各送一匹，一面报告当地不出好馬，也沒有馬場，現有的好馬已交完了，再无法交足数目了。馬、刘在神山住了两天，临走說請你再交二十匹馬吧。馬又向奇提出借草，奇即派民車送草三万斤。

一九三八年旧历三月挺进军全部出发，开赴綏远打日本軍，只留少数后方留守人員。馬占山临出发时打电话給奇文英說：“本軍現开往前方，不日回来，这里留下后方留守人員百余人，請老哥对他們多加指导，兄弟回来謝老哥吧。”奇文英回答：“將軍放心出发，后方由我負責。”說完話就让白凤岐电话通知住沙圪堵的队长奇志高，和駐五字湾的中队长韓守信，要他們和挺进军后方留守人員取得联系。但是这些留守人員因主官領導不在，更不守法紀，四出騷扰，以要粮为名，捉鸡、打人、要大烟，无所不为，群众痛恨入骨。半

个多月后，馬占山帶队回沙坨堵，房舍欠缺住不下，就决定挺进军大部移駐府谷县境的哈拉寨，馬占山提出要奇文英接通五字湾至哈拉寨的电话綫，奇文英即派人帶了材料接通。馬占山亲到神山和奇文英研究今后如何往来，經常取得联系，以解决军队和地方的矛盾，决定准格尔旗召开有关供給军队給养問題的會議，軍部派員参加，軍部如有召开地方性的會議，要准旗政府派人参加。这样决定后，比較接近了一步，也是互相利用，相互防范的办法。全旗混乱局面安定了一些。

一九三八年秋季，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委任奇文英为伊克昭盟游击第一区司令，下設騎步兵两大队，军队由奇文英自行編制，奇文英委任奇致中为騎兵大队长，奇尙斌为步兵大队长。同年十一月国民党軍事委员会派員来調查伊克昭盟各旗王公是否和日本軍有勾結，沿边調查完毕，去河曲县見傅作义，这时傅部全軍計劃調往陕坝，必經之道是伊克昭盟的准格尔旗、杭錦旗和东胜县，傅亲自給奇文英打电话請他参加后勤會議，奇即派白凤岐去。傅对白說：“这次會議准备解决两个問題。一是你旗西协理奇凤鳴有无投降日本軍的情况，要有，由你司令处理。如沒有，由你司令写下証明书，你将此事告知，让他快一点答复。二是本軍开往陕坝駐防，道經你旗，要你旗筹备草料。官兵給养，本軍自带，准备好行軍住地，建立兵站。由此到东胜县，有多少路程，以每隔三十里立一兵站。”又說：“你是本旗人，对本旗的路程村庄完全了解，

你下去到參謀處，去見參謀長，互相商量寫出計劃，關於立站和宿營地點，每站用草料多少，你們商量決定。這件事很重要，須保守秘密，不准與其他人談說。”白鳳岐會見參謀長，寫好建立兵站的地点，按距離設立八個兵站。每兵站用草兩萬五千斤，料八千斤。研究第二個問題時，參謀長說：

“中央派來委員查你旗西協理奇鳳鳴已投降了日本，互相往來甚密，還派員到敵區住下聯繫。傅長官有令，讓奇文英司令解決。如無此事，寫下一個保證書，要你司令負完全責任，這是國家大事，請你打電話問一下如何辦，明日下午召開會議處理。”白鳳岐將此情用電話告知奇文英。奇說：“我們不能辦，也不知詳情，請傅長官辦理好了。”奇文英早知道奇鳳鳴投靠日本，他倆是有密契的。後來傅派人去准格爾旗調查解決，奇文英派了團附楊光普會同去大營盤和奇鳳鳴駐地萬和堂調查住了半月，亦無真實證據。傅又命令馬占山以和平說服的方法，將奇鳳鳴調到哈拉寨，慢慢的再尋解決辦法。馬占山派先遣軍司令白鳳翔帶隊到奇鳳鳴家住下，動員奇鳳鳴去哈拉寨，奇堅決不去，白鳳翔住了月余，就強迫奇到哈拉寨，走到楊家灣奇鳳鳴給奇文英打電話，說他明日到哈拉寨，奇文英回答明日亦到哈拉寨看他吧。白鳳翔給馬占山打電話報告他和奇鳳鳴已到楊家灣，馬占山回電讓他當晚到哈拉寨，奇鳳鳴臨走時服了毒，到哈拉寨一下馬就死了。馬占山給奇文英打電話，讓急速來哈拉寨。奇到哈拉寨將奇鳳鳴的屍體放到黑界地二里半的一個舊窖洞里，將門封

閉，奇鳳鳴的家屬聞知就逃往黃河北岸的黨三審子投了日本軍。日本軍給奇鳳鳴的侄子奇子祥一個西協理名義，擴充軍隊占領此地，將他叔父奇鳳鳴所帶的軍隊，大部收在黨三審子，不願投日本軍的奇寶山、楊漳蓮兩部，帶了全隊歸了奇文英，改編為十二分隊。楊漳蓮調神山司令部，連長郝德明編為王府衛隊隊長，駐大營盤，保護少王爺和老太太。

一九三九年夏初，日本軍和偽軍進駐大營盤，馬占山部先後打了兩次，將日偽軍趕到黃河南岸岸邊。兩次戰役，王府建築破壞不堪，因之王府少王爺和他的衛隊移駐垣梁營。同年五月，衛隊奇玉林隊長帶了全隊二十餘人，因與挺進軍磨擦，跑過河北黨三審子投了奇子祥。馬占山派副官主任到神山和奇文英說，軍部探悉王府老太太與黨三審子奇子祥有聯繫，恐怕有變動，研究決定，奇文英派軍需白鳳岐，挺進軍部派馮金英將少王爺、老太太，接來神山奇文英處附近住下，衛隊郝德明部一同住在什拉塔爾居慶爾家。一九四〇年春，少王爺同老太太，移往扎薩克旗沙盟長處居住，這時因西協理奇鳳鳴死去出缺，由奇文英提名奇涌泉為西協理、奇尙斌為記名協理，經盟長沙克都爾扎布委任了。

一九四〇年秋，蔣介石電召奇文英赴重慶，他就帶了孫子奇涌泉、侄子奇子禮、妻侄龔占彪，一同前去，到重慶住了兩月，蔣介石讓奇涌泉等三人入學，奇文英派奇涌泉、奇子禮、龔占彪等到軍校報名入學，共學了一個多月，就成了蔣介石的信徒了。他們領回電台一台、卜浪寧手槍兩支。蔣

介石派來參謀長陳鎮波，湖北省宜川縣人，是在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老特務，電台台長劉又仁，領得密碼兩本（有蔣介石辦公廳第二處一本，第四處一本，經常與這兩處取得聯繫）。以後又同傅作義、朱綬光等有了密碼，用無線電聯繫。一九四一年舊曆六月奇文英和陳鎮波、劉又仁、奇涌泉、奇子禮、龔占彪等回旗。此時本旗記名扎薩克奇治國已年滿二十歲了，一九四二年春回旗執政。因舊王府破壞不能居住，住在德盛西舊章京家。冬十一月，馬占山同奇文英帶了新舊旗印，去德盛西送交，奇文英將代理扎薩克任內的一切文件賬簿全部交給奇治國。駐軍供應方面，還是奇文英負責。准旗駐有東北挺進軍、二十二軍左世允部、暫三軍第三師等部。

一九四三年秋，國民黨兵站總監部派來孫致謀為準格爾旗糧庫庫長。國民黨中央電令伊克昭盟警備司令陳長捷負責征購統計糧草。陳長捷給准格爾旗分配了軍糧四萬石，每石為三百斤，連同附加是一千五萬斤。派來催糧員、接收查驗員，住在神山奇文英司令部，每日清早向各地糧庫要收糧數目。這年准旗受了嚴重的旱災，收成不足五成，陳長捷的催糧人員每日向奇文英追要軍糧，在奇文英家內打罵達爾古和群眾。准旗第十牌的群眾無糧可交，就集合了兩千多人到神山請求減免。群眾說我們是無糧可交，現在只有一條命了。後來催糧人員被群眾逼走，陳長捷對奇文英大為不滿，奇文英也因此事事提防。

一九四二年，陳長捷下令向各旗要運輸力，向准格爾旗

要牛車一百四十輛，一应俱全，車夫工資等全部由旗供給。陳派李智廣為準格爾旗牛車大隊長，隊部人員和家屬住在旗黨部房內，管理調遣所有牛車，給挺進軍拉糧，給陳總部拉軍用品。

一九四三年六月，挺進軍出發去黃河南岸邊的七卜爾塞子打日偽軍，馬占山來電要准格爾旗部隊全部出發配合作戰，奇文英即調部隊協同挺進軍一起出發，到了新召附近決定挺進軍攻正面，旗部隊攻右面進駐宮机林。旧曆六月十五日，七卜爾塞子戰役勝利結束，將日偽軍趕過黃河北岸，奇文英接到捷報後，就命令旗部隊全部調回神山，以訓練為名，防守神山司令部。這時伊克昭盟“三二六事變”已經結束，陳長捷也不那麼神氣了。他的牛車大隊長李智廣聽得全旗部隊集中神山的消息，帶了家屬連夜逃往東勝。奇文英因此更是害怕了，就在神山附近挖了戰壕，作了防守工事，派人通知西部，如東勝方面有何變動，即來神山報知。一面通知駐西召、高家壩、榆樹壕、暖水等地的留守人員，在各要口嚴加防范，過往人員一律不准入境。東勝方面的軍政人員，不論多少一律不讓到神山。如帶緊急公文，派當地群眾傳遞信件解決。造成道路不通半月有餘。陳長捷更為不滿，奇文英也積極防范，這時陳長捷即電馬占山負責解決。馬電話邀奇文英到哈拉寨開會相商，奇當日派白鳳岐到哈拉寨去，馬力保陳長捷絕不敢用兵，並電話和奇文英商討，決定一部分隊伍回原防，至第三日奇文英命令韓子誠團長帶隊回到五字灣，其餘還是駐

在神山附近。馬占山即电陈长捷，說明神山方面情况已經緩和了。陈长捷派东胜專員陈国楨到哈拉寨見了馬占山，挺进军部派副官主任馮金英协同陈国楨帶了一部分礼品到了神山，只說在征购統計粮方面出了大力，完成任务，使抗日軍队增加了力量，又能按計劃訓練了軍队，对国家对人民是有利的，拿出奖章一枚，二十响手枪一支交奇文英收訖。奇文英认为这是陈长捷的鬼把戏，敷衍了一回。第二天陈、馮两人走的时候，奇文英給送了礼品和大烟土。此后，还是提防东胜方面的行动，駐在各要口的保安队还是照旧盘查不让通行，如此两月余，这一場风浪才平息下去。至此关于地方行政事务由东胜專員公署办理，軍事方面除直接用电报外，凡是面商的要事，均归馬占山主办，这样逐步緩和了紧张局势。一九四三年冬，陈长捷离开东胜撤销伊克昭盟警备司令的名称，这才解决了奇文英对东胜方面的提防，地方上才安定些了。

不久傅作义以馬秉仁为团长組成慰問視察团来神山，見了奇文英說带来一部分救济款，說是救济貧苦人民，先統計附近的一个达尔古牌，奇文英将这个命令下达本神山的达尔古超圪斗林，即速統計报来，每戶发給一至五元法币，群众不要这买不下半斤米的救济款。馬秉仁在神山开会詢問陈长捷在准格尔旗的压榨后，說傅长官知道你們受了这些苦难，因此才派我来慰問大家，一面看一下群众的生活。我們現在是处在敌軍压境之下，同心协力打败日本是我們的責任，傅长官对你們很关心等等，說了一大堆。参加會議的人請求馬团

长去当地調查一下最好。为什么要請他下乡查看呢？原来神山到准格尔召一百华里，东胜边界到羊市塔一百五十里，是三个达庆牌(区)的范围，內有三万七千余人。“七七事变”后，自馬占山退到准格尔旗，高双成部二十二軍到达拉特旗，陈长捷暫三軍等部，都是过往必經之道，軍隊来往不息，更兼陈长捷的压榨，人民苦到极点，这一区域内的上等戶一年能吃五个来月米，下余七个月以菜代替，穿的衣服是一半棉布一半羊毛，中等戶一年能吃两个月米，穿的衣服大部是山羊毛做成的口袋片，下等戶一年也吃不上一頓淨米飯，穿的衣服沒有冬夏之別，冬季穿的破皮袄和破山羊毛口袋片，到夏季还是穿着，到暑伏天热得受不了的时候就脫下来，赤裸裸地在地里劳动。女人在家无衣服，出門时在腰带上挂上很多破布条和破布片，以遮下部，甚至还有有的妇女破布条和破布片亦沒有，有人去时，她們坐在炕上，拿上用具或木板等遮羞，只說話而不能行动，行路人要喝水吃飯，須自己烧火做饭。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上下条綫不挂者是常事。为何这样痛苦呢？主要的是常年軍兵来来往往，除大吃大喝以外，还要搶粮食和掠夺財物等等，兵灾加天灾，使广大人民掙扎在飢餓的死亡綫上。据統計在这几年內准旗和出外餓死一千余人，狼吃了二百四十多人。所以大家要請馬秉仁亲眼去看一下，不想馬秉仁代表傅作义来准旗并不是慰問救济人民，而是要向准格尔旗征兵一万五千人，什么慰問視察都是假的，要壮丁是真的，他还哪里有心思去乡下看呢。奇文英送了馬秉仁大烟土請他

向傅作义說明准格尔旗的天灾人祸，征兵困难的情形，好容易才把馬秉仁打发走了。

一九四二年十月間，傅作义命令奇文英在准格尔旗征兵二万人，奇文英以組織地方自卫軍的办法来应付，請准国民党中央，編了三个团，第一团团长楊三升格（楊常荣）兼教练官，在神山北部的窟伦沟庙上召集訓練，第二团由楊福林負責，在羊市塔訓練，第三团由郝章保达庆負責，在他家二里半集訓。其他达庆牌未确定整訓，但也有連排长等等的任命。奇文英的司令部自己印了二万多套胸臂章符号，发給全旗青壮年帶上，这样就把傅作义征兵的事給頂回去了。傅作义对奇文英很不滿。

一九四五年二月，准格尔旗王爷奇治国病故，四月初准格尔旗的行政由奇文英代理，綏远省主席傅作义派陈玉甲，伊克昭盟盟长派协理监交旗印，至此軍政两权原归奇文英一人掌握，軍隊和地方行政的冲突暂时平息。七月奇文英和故王爷奇治国的母亲研究王爷后裔，商妥提出三个人的名单：一是奇福海，二是白銀不利，三是奇庆保，呈报盟长，在此三人內批准一人。經過半年有余，才有回信，内容是白銀不利年迈无子，奇庆保年龄太小，不能执事，只有奇福海正在考虑中。全旗贵族其他当权的人也同意奇福海继承王爷，但是盟长迟迟不决。一九四六年旧历三月初，盟长图布陞吉尔格勒（时沙王已病故，郡王旗图王任盟长）命令奇文英和故奇治国的母亲到成吉思汗陵开会研究继承准格尔旗扎薩克人选，

奇文英接电后，通知老太太同去，于三月十六日起程赴会，住到暖水，十七日道經准格尔旗西部的以力色太沟門王家圪楞被奇子祥派出的郝士英、武耀宗等十四人，隐蔽在水渠內狙击刺死。

（政协伊克昭盟委员会、政协准格尔旗委员会供稿）

国民党反动派在河套地区的最后挣扎

——我任伪安北县长期间的片断回忆

王 元 魁

一 征兵征粮

我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元月当了一年多伪安北县长，现在把这一期间的片断回忆记在下面，反映一些蒋介石王朝复灭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在河套地区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祸国殃民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七月间，我带着一个秘书两个随员到了安北县，第二天写了一张大红纸的布告，就算到任视事。按旧社会的惯例拜会了一些地方士绅，如参议会理事长、商会、农会等会长后，参加了几次大吃大喝的宴会，才开始工作。

刚一到任，摆在我面前的主要三大任务：一是征兵，二是征粮，三是修筑防御工事。初出茅庐的我，毫无经验，一开始就感到棘手。

征粮，在开征以前，县里召开了乡长、指导员会议，分

配了征粮任务，每乡由乡长和指导員負責，帶領警察自卫队分赴各保各戶催征。一九四七年的征粮工作，由于沒有經驗，沒有完成上边所要求的任务，在开征过程中，經綏远省政府三令五申地来电斥責，大意是自开征以来，各县征粮进度很快，有的县分基本完成上級分配任务，独該县进度迟緩，殊属玩忽功令等等，要求迅速安排力量，加紧催交，限期完成，倘再延忽，即以貽誤軍机論处。电令頻繁，差不多每日接到，甚至半夜三更来电催征，完不成交粮任务，就有撤职查办的危險。还是主办征粮工作的田粮科长有办法，这些人多年来就在基层搞征粮工作，方法多，手段也相当恶劣，完不成任务，田粮科也有責任，也要受到連帶处分，田粮科长重新写了計劃，規定了方法步驟，首先是召开了第二次乡长、指导員會議，連夜通知到乡，責令星夜到县，会上宣讀了綏远省政府电报，接着是各乡簡短的汇报征粮情况，我在会上大罵一陣，然后严厉地宣布：如果完不成征粮任务，即以貽誤軍机論处。然后再把各乡未完成数字在会上宣布，并重新規定限期，要求必須限期完成。會議开了一整夜，天明散会后馬上分赴各乡，开始行动。會議的結果总算起了点作用，有的乡长和指导員怕受处分，自然是唯命是从，到乡以后便不择手段地追逼起来。但有些奸詐的乡长和指导員，他們和地主、富农都是相互勾結，不是虛报征粮数字，就是由仓库保管員开假入庫凭据，包庇地富，几年来的經驗証明，只要是开了入庫的空头支票，粮未入庫，也算完成了任务。甚至为

了請功，还故意唆使开假証明，以便虛报完成任务。这种情况，乡、县、省都很了解，是个公开的秘密。到征粮工作结束后，即使报告完成数和实际入庫数相差很大，也算完成任务了。当然这主要是地主、参議員等有权有势的人能如此。对于絕大部分的貧苦农民，尽管他們一年到头连口粮也不够維持，保管員不用說不給他們开空头支票，交粮时还对他們挑剔刁难。老乡們往往把粮挖窖藏起来，乡长和指导員的对策是翻箱倒柜，挖地三尺进行搜查，結果窖被发现，粮食被搜刮一空。

征粮工作进行到这样的程度，距离上級要求任务还是差得很远，电报催促，依然頻繁，省田粮处派来督导駐县坐催，田粮科长又得出主意，調回各乡征粮人員再开会，这次更下狠心了，会上对于征粮不力、完成任务不太好的乡长和指导員押到看守所，这叫“砍一斧震百枝”的办法，自然也起了一些作用。征粮人員怕坐看守所，在散会后馬上回乡对貧苦农民使用了种种更加残酷的手段，誰不交粮，就不让誰回家吃饭，直到写下交粮保証书，并按上脚模手印才释放。或者对不交粮者，在严寒的三九天剥掉衣服，鎖在碾磨坊里让挨冻，直到保証交粮为止。有的甚至逼着不交粮的人吃馬粪。这种种手段，真是可恶已极。这当然是对一般貧苦农民采取的办法。对那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富农、参議員、退職种地軍官就不同了。县、乡干部惹不起他們，安北县有所謂“三司令”，就是这类典型人物。一个是太安乡（黑泥池）的

“赵司令”，即赵熾昌；一个是太真乡（刁老胡同）的“武司令”武俊峰；一个是太安乡的“梁司令”梁九洲。赵是一个世袭地主，曾經担任过什么軍的“司令”，現职是綏远省參議員。武系当地土匪司令，梁是曾任王靖国部的团长，后又挂名东公旗（烏拉特旗）一个什么“司令”。这些人都在安北县拥有大量土地，雇人种地，还兼有部分武装，对这一类人物的粮是无法征起的，即使办法策略一点，也得县长亲自出馬，登門拜訪，讲些客气話，希望他們帮忙，交上一点粮，以便起带头作用。如果搞僵了，他們就会向綏远省当局控告你，結果还会使你受到上司的申斥，說你不会办事。

一九四七年的征粮工作，由于我还没有經驗，沒有完成任务，在一九四八年綏远省召开的春耕會議上，安北县是属于受到申斥的县分。国民党統治时期的征粮工作，是对人民的罪大恶极的政治經濟压榨，我所能回忆的仅仅是一个县分的片断。

征兵，实质上正是老百姓叫的“抓兵”或“抓壮丁”。因为老百姓不愿意当反动軍队的兵，所以不抓是沒有兵的。这种情况也反映了人民在国民党的残酷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側面。

一九四七年的征兵工作，也是由于沒有經驗，事先沒有保守好秘密，走漏了消息，到实际发动征兵的时候，壮丁多半逃走了。因此，从各县的征兵情况来看，安北县又算落伍了。

一九四八年的征兵，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有經驗了，方法也多了，手段也更恶毒了。征兵命令下达后，我注意了保密，把征兵令鎖在柜子里，当出动抓兵的那一天，我利用夜深人靜的一个晚上，在老百姓睡入梦乡的时候，突然召集了一个紧急而又短促有警察局长、县政府各科长参加的會議。在一間小屋里，把門鎖上，宣布了征兵令，并分配了地区、數額，配备了警察和自卫队，散会立即出动，突然袭击，使家家戶戶毫无預防，結果，按原計劃的數額，絕大部分都抓来了。只有个別人越墙逃跑了。

回想起来，我在伪县长任期内，一共抓兵两次，緝捕逃兵几次。抓兵固然是一件头疼不过的事，但交兵就更为头疼了。兵既抓起，还必须履行交接手續。新兵抓到，还得等待团部办理驗收手續，当时河套各县的新兵，得交到五原駐軍的团部，他們一天不驗收，县里就得看管，否則新兵逃跑了，还得补抓，补抓就更为棘手了。因此对被抓的新兵，必须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关押，有的关在一所大院子里，或者是几处碾磨坊里，认为有逃跑可能的，还必须关闭在粮仓中，或者在冬天还必须剥掉新兵的鞋袜，大小便还得武装看管。方法使尽，到头来逃跑的还不在少数。根据經驗，总是在上級控制的指标內，县乡是层层加码，总得增加抓的數額，一般总是要超額三分之一。一方面准备补逃跑缺額，一方面准备补充部队驗收时被淘汰的缺額。

团部派来接兵大員，还带着医务人員，驗收时是在一个

廣場上，对新兵的检查还相当严格，从生理上、体格上、年龄上都要經過檢驗，每个壮丁是希望自己驗不上，在最后正式宣布不合格的，馬上就欢喜了。但經驗收合格的新兵却是面色蒼白，愁眉苦脸，低着头。旁边打探的亲友也咳声叹气，落下泪来。

不愿当兵的壮丁，总是想尽方法躲避，有办法的利用亲戚朋友关系，在机关里花钱討取証明，冒名职员躲避。没有門子的只好留发留胡，隐瞒年岁，蓬头垢面，經常逃避。但是县里主管兵役的民政科长，是一个接交新兵的“能手”，他为了順利完成交接手續，总是在检查驗收新兵的前一天，对这些留了长胡长发的壮丁，找来理发匠，来个削淨推光，在驗收时就减少了許多麻煩。但是不愿意当兵的壮丁，仍然会出现装疯、装哑、装残废等現象。这就用拳打脚踢来对待，对装哑的人是拿木棒，打中要害，使你出声，在百般折磨下，一般的都是“在数难逃”的。

驗收新兵时，按規定县参議会、县党部、三青团均派員到現場監視，其目的是防止有“舞弊”事情，实质上毫无作用，军队不理这一套。不过县里应付的好一些，接交就比较順利一些，应付的差一些，刁难就多一些。搞僵了，那就麻煩了。因此地方上像参議会、商会等单位事先就有意識地对接新兵的人格外招待，这是在接兵时所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另外，在平时也还得做些准备，如军队走私粮时，县里还得給予方便，事前买军队的帐，到了征兵的时候，军队也就适

当让步。因为当时安北县的西山咀設有軍警联合稽查处、警察派出所，西山咀是包头通往陕、甘、宁的必經口卡，来往行人車馬，必須經過检查，有县府的証明，就可以通过了。

交接新兵的最后一关，县里还得派警察将新兵送到五原或包头，再度經過檢驗，才算完成任务。安北县征的新兵，多半是送到五原团部，在沒有正式交接以前，中途逃跑的还記县里的帐，差額必須由县續送补齐。到五原經過檢驗不合格被淘汰的也記县里的帐，照例补齐差額。就是因吃賄賂中途放走的，也算县里的帐。好在县里在抓兵的时候，已經准备好了这些缺額，否則，交不够应征名額，还得繼續去抓。

一九四八年的征兵工作，由于有了經驗，如期如数完成了任务。

壮丁被抓以后，壮丁的家属扶老携幼赶到县里，哭哭啼啼，有的人死了妻子被抓了，留下无人撫养的孤儿；有的被抓走了以后，家中只剩老母一人只有餓死；有的是七八十岁的老母亲，就是一个独生子还被抓了兵，苦苦哀求留下她的儿子。抓兵的结果，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妻离子散，生离死别。我記得在抓兵后的一个早晨，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娘驀地闖进我的办公室，跪在我的面前，号啕大哭，哀求放回她的儿子。在一次驗收新兵的廣場上，两个死掉媽媽的孤儿哭着要他們的爸爸。这类事很多，回想起来，不胜內疚。

抓兵的结果，在河套地区广大农村中，青壮年几乎十室九空，田园荒蕪，留下的只是孤儿寡妻，老弱殘废。在河套

抓到的新兵，要送到张家口、平津一带参加战事。军队押送新兵时，所使用的手段更为残酷。为防止中途逃跑，首先采取杀一儆百的血腥手段，将壮丁押解至烏拉特前山的曠野里，要在新兵面前枪毙几个新兵，并宣布被枪毙的是潜逃未遂，好叫准备逃跑的其他新兵看了以后，不敢逃跑。当然这也阻止不了壮丁的逃跑，只要一有机会，壮丁仍然是不顧死活，挺而走险地逃跑。如在一九四八年安北县緝捕逃兵的总数就有三百多名。

有雇用和卖兵的，老百姓叫做“雇壮丁”和“卖壮丁”。“雇壮丁”多半是有錢有势的人家，不愿自己的儿子去当兵，花錢雇用壮丁来頂替，也叫做“买壮丁”。另外，是有些貧苦家庭的儿子，生活沒有出路，只好“卖壮丁”了。

二 修筑碉堡

国民党在“反共”高潮中到处修筑防御工事，名之曰“防共”，因此只要到达一个城鎮的附近，就会看見到处碉堡林立，安北县自然也不例外。我們接到陝坝专員公署轉发綏远省保安司令部繪制的工事图式以后，由于征兵、征粮工作迫在眉睫，修筑工事就暂时耽擱下来，但是陝坝专員公署三令五申催修，只好唯命是从。农村中壮丁被抓尽，老弱妇孺一齐上陣，修筑工事征集民工，虽不比抓兵，但是由于农民沒有吃的，餓着肚皮修筑，的确是有困难的，既然派不出来，

仍是采取抓民工的方法。县里出通知，警察、自卫队四出乱抓，限令到齐。根据乡的大小，将各种防御工事包到乡，派警察监工，完不成任务者，唯乡长是问。没有米吃的也由乡里解决，按指定日期开始修筑。全县境内的防御工事都已经保安司令部确定，基本上是沿黄河一带、五加河、乌梁素海畔，并在重点地区的西山咀和县城的新安镇（爬子补隆）做了不少防御工事，西山咀的卧羊台上做了高碉一座，五加河大退水渠的西山咀和大桥两侧做了母碉和子碉，沿安北到五原的公路两旁也做了碉堡，新安镇的桥南空地上还做了一个叫做日本式的三三碉堡，县政府的围墙加厚一层土做围墙，四角也做上明碉和暗碉，工事竣工以后，陕坝专员公署的专员陈国楨还做了现场检验。陈本是一个多年官场中的老奸巨滑的人，他为了邀功，当然就不顾人民的死活，但也只讲形式，并未考虑工事的使用，工事虽然勉强做好，没过几天，均先后倒塌，劳民伤财，怨声载道。有的碉堡虽然未塌，也被做了地下厕所。

三 包头撤退 河套混乱

一九四八年秋，从全国整个形势来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不少城市先后解放。傅作义在察绥地区的统治也摇摇欲坠，军政人员终日惶惶，市场上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傅作义在平津应付局面，留在绥远的董其武以及刘万春等已成

囊中之贖。各县市的国民党軍像鄂友三、乔汉魁、郭长清、楊作舟之类到处奸淫搶劫，特别是楊作舟（楊三秃）、郭长清（拴子）之流，原系土匪出身，居然担任了十三旅旅长等职，这些所謂軍隊，也只是見了解放軍就逃跑。鄂友三盘踞大青山后一带，到处奸淫妇女，他們奸淫妇女的代号叫“吃糕”，只要問一声“吃糕”沒有，就知道是强奸了妇女沒有。老太太和未成年的女孩也被他們奸污了不少，老百姓給鄂友三送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外号“鄂毛駱”，由于他杀人不眨眼，又叫他“鄂閻王”。当解放軍围攻綏包形势紧急的时候，傅作义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坐鎮包头，还加上另一个副司令馮欽哉。邓宝珊还有一些他自己的基本部队，就是陕北榆林的二十二軍一部，馮欽哉完全是个光杆司令。听说在包头紧张的时候，包头軍政当局整日召开軍事會議，在一天晚上开完軍事會議，說是“死守包头”，就在这天夜晚，他們就乘夜深人靜的时候，逃之夭夭了。包头市內机关团体的人在听到汽車噪杂声后，才从睡梦中起来逃跑，包头市长高云山連市府大印也未顧及带上，等到逃出城外以后，才派人取出。

包头的国民党各机关一齐向河套撤退，带枪杆的軍警和鐵路警察等先是逃到烏拉特前旗的哈叶胡同和公庙子一带。

解放軍进了包头，秩序井然，秋毫无犯，商店照常营业，居民一針一綫也未損失，解放軍的优良作风給居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人民对国民党各机关的仇恨更加深了。

包头撤退，引起了河套地区的混乱，安北县是河套的大门，首当其冲。駐在公庙子一带的軍警和各机关，吃住都发生了問題，因此有的陆續往河套走，有的派人到安北要粮要草。安北县政府几乎变成了留人大店，有的到达安北以后，稍事休息，就逕往五原、陕坝，繼續西逃，有的暫住在安北听候消息再往西逃，整个县城吵吵嚷嚷，乱成一团。

邓宝珊派員到达安北，带着要粮要草的証明文件，口头上上传出了消息，說安北县对前綫支援不力，并且說在公庙子开会时，安北县长應該撤职查办，这是对我的威胁。事实上不論撤退下来的机关也好，军队也好，大都空口要粮。但是只要有求，我就不敢不应，因此，我也并没有被撤职查办。

河套的所謂士紳們，听說邓宝珊撤退到公庙子一带，为了保卫河套，由王乐愚（王英的五弟）、赵熾昌等乘坐着架着重机枪的汽車，通过安北到公庙子去慰劳，并且說邓宝珊劳苦功高，还要坚决保卫大后套呢。

大約就在他們出发慰劳的第二天下午，邓宝珊带着十几輛汽車滿載部队由公庙子撤退到安北县城，部队奉令連汽車也沒有下，說明前綫十分紧张，只有邓本人下了汽車，連休息也沒来得及，就接电话。他穿着布便鞋，鞋的兩側还系着短布帶，紧紧地捆在脚上，他打电话时手有些顫抖。我們見面后，同他的随从把他安置在耶穌教堂美国传教士根塞尔的住室。根塞尔已去他乡，就占用了他的鋼絲床鋪。邓未談及軍事情况，只是問我包头撤退下来的各单位，县政府是否給

予妥善照顧，我答已予照顧，并无困难，他点了点头，表示对包头撤退下来各单位的关怀。接着又从鋼絲床上起来，在地上踱来踱去，若有所思，随即唉声叹气、惋惜地对他的随从說：“不讓他們开枪，他們偏偏要打……”显然是指王永清团的事，因向解放軍开枪，遭到沉重的打击。現在王永清部已下落不明。邓随又說：“写信雇人到山后去找部队。”并且追問山后的地理，能否找到，最后决定由我找熟悉可靠的人送信去，馬上雇人前往。

前方沒有来電話，消息有点沉靜，我們和西山咀電話連系，也无动靜，这时候邓要理发，我們馬上找来理发匠，理发以后，邓很客气，还叫随从送給理发师現洋一元。

時間並沒有过了多久，西山咀来緊急電話，說在前山发现康健民的騎兵，在山咀可以看到，西山咀烏梁素海的大退水以西是国民党軍，一河之隔，情况自然紧张起来。听說邓宝珊原計劃是要在安北停一下看形势变化的，現在消息既然这么紧，就准备撤退。

这里也談一談馮欽哉，他也退到安北来了，一到安北就看风水，据包头撤退下来的人談，他在包头視察陣地时，看到包头西北門有缺口，认为风水有問題，因此就表示包头不能坚守。到了安北，下了汽車，他又在捏指占課发表怪論，在我們招待他吃飯的时候，他大罵河套的县长，說什么不支援前綫，都是飯桶。又問“河套人口多少？”我們答“大約二十三万。”他又表示“二十三万，那么以全河套的人力，

也无法挽回殘局。”接着又說“要看辽西一战。”当时我在暗暗地想，此人大概又在占課了。

将近黄昏的时分，邓宝珊命令我們將西山咀大桥烧毁。在安北县宰猪杀羊慰劳了始終未下汽車的軍隊以后，邓下令撤退，馮欽哉也早已乘坐吉普車溜了。

邓宝珊和軍隊决定撤退，我們当然也不得不走，但是没有撤退令，“县长守土有責，县长与城共存亡”，我的思想上发生了矛盾，退吧沒命令，不退吧，怎么办？陕坝专署电话連系不上，請示省府，軍用电台早已撤走，最后还是决定撤退。为了慎重計，請示了邓宝珊三件事：一、率領警察和自卫队撤出县城到太余乡，不出县境；二、除窖藏公粮外，仓儲公粮一齐散放；三、看守所囚犯一律释放。此外并提到县府重要公文帶走，一般公文悉数焚烧。邓表示同意。邓撤走后，我們也撤出了县城。

这里还須說一个人，就是西山咀安北农場負責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員朱霽青。他是东北人，他曾經把东北人移来河套种地，在西山咀附近占有七百多頃的土地上创办了安北农場，一个年近七旬的老头，国民党中常委跑到一片人烟稀少的河套来种田，其意图我不了解。由于經營不善，农場的土地大部荒蕪，移民也东离西散，沒有离开的移民，維持生活也成了問題。他的农場經營不好不要紧，但却給县政府带来了麻煩。首先是每年应交公粮，总是扯皮，一个小小县府对于一个“中常委”來說，不但不敢慢待，而且是必恭必

敬，这是一方面。其次他住在安北，县政府还必须予以保护。这一次撤退，当然更得引起注意。我们把朱的情况报告邓宝珊，在情况严重的时候，我们还派人把他请来。他和邓见了面，谈了一阵。邓撤退时他未相随撤退，当我们撤出县城以后，他就离开了农场，下落不明。传说他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化装潜逃了。

四 馬鴻逵的騎兵援包

我們連夜撤到黑柳子，当时估計如果解放軍进入河套，我們就沿黃河再向西撤退。如果解放軍迅速占領臨河陝垣等地，我們无法西撤时就渡过黃河，退到伊克昭盟再作打算。当我们撤出的第二天，解放軍并未进入河套地区，原来解放軍在烏拉特前山猛攻国民党逃軍后，即向东撤退了。

安北县政府在撤退的当夜发生了大火，烧毁了部分房舍。起火情况不明，可能是县里在撤退时烧毁一部分不必要携带的公文，因为不慎而引起的火灾。

解放軍既然沒有进入河套，我們也不能再向西撤退，只得返回县城。撤退虽然已經請示过邓宝珊，但毕竟县长“守土有責”，为了慎重計，在沒有彻底探清前方情况时，决定我带一部分人馬星夜赶到五原联系，向陝垣专署請示，一部分留住黑柳子，一部分返县并到西山咀探听包头消息。

到五原县后，才知道五原县府人員也一度撤出，經過电

話联系，陝坝的专员陈国楨又打起了官腔，对我有所指責，說什么“不能擅离职守”等等。其实邓宝珊到达陝坝进一步退走宁夏时，他們也撤退了，事实証明，国民党的軍政人員，已成惊弓之鳥，聞风而逃。我一再申述我是奉邓的命令撤退，而且是情况紧急，不及請示专署，以致如此等等，也就不了了之。于是我带着人馬連夜赶回安北。情况完全变了。县政府房舍烧毁一部，逃走的居民尙未返县，县府一部分职员还在乡下，回去一少部分职员，連县政府都不敢居住，住在几家商店里，只有我們少部分人員算是住在县里，狼狽不堪。

解放軍虽然从前山撤走，但据了解尙未撤出包头。麻煩事又接踵而至，五原县打来紧急电话，才知道宁夏馬鴻逵的騎兵到达五原，是一个姓王的旅长（名字已記不清楚）带着一旅騎兵准备援包，有消息說这是邓宝珊亲自到宁夏搬兵的结果。当时我接到电话的心情是“悲喜交加”，喜的是援軍来到，希望能解包头之围，就可以安定后套局面。悲的是大軍过境，差事如何应付。结果并未出人意料，王旅长电话指示：一、限期三日修复山咀大桥，以便进軍包头；二、騎兵一旅，人吃馬喂必須如数供应，不得有誤；三、住房必須迅速解决。此外，还加上“事关軍事，不得有违”等严格要求。怎么办？当时我暗暗地想着，反正还不是老百姓倒霉，征兵、征粮、修筑防御工事等差役刚刚完了，什么母碛子碛毫无用处，現在又命令修复山咀大桥，真他媽的“做官不知民受苦”。

旅长命令只得服从，考虑到限期太急，只好连夜赶修，一方面命令警察局派警把安北县的铁木匠一齐带到西山咀，征用了附近的树木，并让警察局自卫队前往督工，另一方面，考虑到如果在限期内完不成任务，又将马七渡口的停泊船只一齐控制，准备搭成浮桥，临时应付。出人意料的是大桥在命令如山的要求下一夜就修复，还得到邓宝珊的来电嘉奖。

西山咀大桥既然修好，满以为宁夏骑兵立即开往包头，哪里晓得宁夏骑兵由五原开到安北便停止前进。安北这么一个小县城，哪里能够受得住一旅骑兵践踏，人吃马喂，天天按规定供应。最使人头痛的是骑兵的马料问题，宁夏骑兵的马料是非豌豆不吃的，但是豌豆有限，当时供应不上，只好给黑豆。王旅长不答应，开口就是骂，说黑豆吃了不顶用，影响马的健康，也就要影响部队作战，我说实在没有豌豆，请旅长还得体念安北实情。王不相信，他很生气，要我把安北全县的征粮底册交出，以便查对，不得已只好把各乡长叫来，在旅长面前求情，才算免于追究。

宁夏骑兵在安北住了几日，仍然未见行动，直等到解放军撤出包头的消息传到安北，他们才离开。原来宁夏骑兵此次援包，马鸿逵还是从邓宝珊的私人关系出发，能够从宁夏开来一旅之众，已不容易，哪能真的去打仗，他们的军事哲学是“不战而胜”，包头解放军撤走，宁夏骑兵援包的任务就算完成。到此，我们才明白了马家军所以迟迟不进的原因所在。

五 牛鬼蛇神的县参議會

在包头撤退以后，安北吃紧的时候，住在县城以韓士甫（安北县大地主）、潘毅生（东北移民）为首的所謂参議員們，听说解放軍到达后，首先要斗爭地主和恶霸，因此在安北沒有撤退以前均已逃跑。韓士甫跑到乡下，潘毅生逃到陕坝，連太安乡的梁九洲也已逃到伊克昭盟。但是解放軍沒有到达河套，局面安定了，他們跑回来，又以“人民代表”自居，向县政府大兴問罪之师。他們企图撤換掉我，一面勾結县党部的書記长田增向省政府告黑状，一面糾合全县参議員召开参議会的會議，想把撤退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

县参議會終於召开了。在即将开会的前几天，梁九洲还假惺惺地来見我，說什么安北县本来不應該撤退，既然撤退了，在参議會开会时承认点錯誤也就罢了，不必固执己見等等，这分明是打探我的态度，摸一摸我的头皮軟硬，好把責任推到我一人身上，以达到他們的預謀。我当时不但沒有表示要承认撤退的錯誤，而且反問了他：“邓总司令都撤退了，你們不也是逃走了嗎？留下安北县的几十名警察和自卫队，还能抵抗？”他說“县长守土有責。”我說“奉命撤退。”这一来梁九洲也就不好再說什么。接着我又負气地說：“我早就准备着撤职查办，就是不撤职，我也准备挂冠而去……”梁九洲見不是路，也就扫兴告辞。

县参议会开会的前一天，主要議題就是討論安北县撤退問題，他們追問的內容不外是：一、为什么要撤退？有沒有上級命令？二、为什么要放粮放囚？三、为什么把县政府的房舍放火烧掉？开会的第一天就請我在参議会上报告撤退經過，原来我是决心不参加他們的會議的，但經過再三考虑，还是参加的好，当时我想参議會毕竟是县的民意机关，还是不惹他們較好，同时撤退、放粮、放囚，虽然口头請示过邓宝珊，但空口无凭，利用这次會議說明情况也好。因此我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参議會，并且根据他們安排的議程作了报告。在报告的前一天，我預先和赵熾昌取得了联系。赵是安北大地主，又是省参議員，他正准备竞选伪国大代表，想要我帮助他竞选，自然愿意替我說話。赵为了給他竞选打好基础，也想借县参议会开会的机会，接近接近各乡的参議員。因此赵接到我的电话后，便自己开了美国式的洋犁（当时老乡称美国的拖拉机叫洋犁）从烏拉特前旗的三湖河畔赶来安北。参議員們都是些地主富农，他們本来是慣于捧敬有权有勢的，現在見了他們的“赵司令”，围着洋犁，欣賞洋犁，羨慕洋犁，把視綫都轉移到赵的身上。大家在公开場合下捧赵的場，說他在傅作义总司令和董其武主席那里有威望，一个安北县連一架洋犁都沒有，赵在三湖河畔种地几百頃，就有几部洋犁，还不是人家有面子。赵熾昌的身分就分外显得提高了几百倍。有的参議員如赵四和尚原来就是赵柜（河套的大地主称柜）的头儿，从赵二鎖（赵熾昌的叔父）如何起家，如何

在三湖河畔的宿菱滩开渠打坝，如何发家致富，一直谈到赵熾昌当了司令等等。

我在参議会上报告了安北撤退的经过，主要说明撤退是迫不得已，而且也口头请示得到邓宝珊允许。同时我也表示愿受撤职处分，但这是綏远省政府的职权。接着就请赵熾昌以省参議員的资格讲话，赵当然替我辩解，大意是：撤退是大势所趋，连邓总司令都撤退了，一个光杆县长顶什么用，是非自有綏远省政府裁决等等。赵的话起了很大作用，当时会议的主持人是議長韓士甫，这个“土豹子”被赵熾昌的讲话吓唬回去了，一言未发。土匪出身的武俊峰等也改变了态度，承认责任不在县长身上。梁九洲心里不高兴，也不好说话。赵四和尚还在为我辩护。被称为“女武训”的刘英士在会后还个别找我谈话，对我卖殷勤，责备县参議會这种不讲公理的举动。只有东北移民的政治商人潘毅生，他以副議長的身分在会上发了些牢骚，他不說撤退反而责备县政府不该把馮欽哉引到他的商号去住。一场风波就此结束。

当邓宝珊返回包头，路經安北休息，我們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便把安北撤退时请示邓的经过和邓口头允许的情况提出，邓給証明了，那时候在座的韓士甫、潘毅生等也就哑口无声。

六 选举伪国大代表

一九四八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作垂死的挣扎，还表

演了伪国大代表选举的丑剧。当时那些官僚政客、地痞流氓，都把竞选伪国大代表看作是升官发财的阶梯，因此到处奔走，进行活动，真是光怪陆离，丑态百出。现在仅就我在安北县任内亲手办理选举情况，略谈一二。

安北县伪国大代表的选举，是在綏远省政府统一布置下进行的。据我所知，全省各县市的代表是经过綏远省政府和省参议会内定的，名单确定后，虽然交到下边进行选举，实际上都是欺騙人民的把戏。如上級决定赵熾昌为安北县伪国大代表，所謂竞选也不过是形式而已。又如五原县决定为辛崇业，临河为郭永龄，晏江为王会文，这些所謂代表的产生都是由綏远省政府和地方派系指定的。

在即将开始选举的前几月，主办选举的綏远省民政厅还成立了什么选举委员会，設置了統一格式的选箱，印发了选票。安北县的竞选人是赵熾昌、张德敏（軍統特务，安北县人）、梁九洲，此外青年党的成员当时也在准许竞选范围，譬如我的同学杜羨孔在北大毕业以后，就参加了青年党，当时他曾写信，要我以同学的关系帮助他竞选。前面已经說过，赵熾昌为了竞选，曾經騎着洋犁跑回安北活动，张德敏与县党部书记长田增关系密切，田增代他四出奔走，当时五原、安北的飯館中整日請客宴会，車水馬龙，五光十色，鬧得烏烟瘴气，一团漆黑。

选举开始的前一天，县里派警察通知各乡选举人在第二天务必到場选举，第二天警察伴随着选民到場，当时安北的

选举地区在新安鎮小学，县政府、县党部、三青团的职员和警察布满了会场，为了完成指定被选人当选的任务，設立了代写选票人，选举一票就暗暗地把票数统计下来，以防万一。这样投票选举以后，用不着开票即可了解某人当选，万无一失。安北县当时的伪国大代表竞选就是这样进行的，因此上级指定被选人的赵熾昌自然当选。开票同样也是形式而已。安北县如此，綏远省其他各市县的情况，可想而知。

記傅部印刷厂伪造人民币事

潘 佳 绪

傅作义部于一九四一年在陕坝成立了一个印刷厂，初名“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印刷厂”，之后，随着傅部番号的变化而变更，到归绥叫“第十二战区长官部印刷厂”。张家口设厂后，叫“张垣绥靖公署印刷厂”。旋又改称“华北总部印刷厂”。

我从一九四四年起，到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止，一直担任着这个印刷厂的厂长。

到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的军事节节失利，就是在经济方面，也是千疮百孔，法币时时贬值，物价一夕数涨，民不聊生。金圆券价格低于解放区的边币百余倍。在此穷途末路的时候，傅作义忽然异想天开，要伪造共产党的钞票来捣乱。大约在一九四八年的五、六月间，有一天上午潘瑞征打电话召我到总部有所商谈。我到总部后，他拿出几种边区票子告诉我，“我们要仿印八路军的票子，来捣乱他们的经济，先试印三千张，限一星期印出。你看怎样？”我说：“我们修好的胶版机倒是伪蒙疆政府原来印票子的机器，原印刷工人尚还在

厂，但是印票子必須有照像制版設備和此項技術工人，現在張家口已經沒有這些設備和人員了。在北平能否找到尚不可知，就是能找到，也不是馬上就可以制出版來，不要說一星期，一個月能印出來就算不錯。”他說：“總參議（張濯清）教如此辦，我們都是外行，那末咱倆一同去見總司令與他研究研究看怎樣”。我說，“用不着我去，你把情況告訴一下就行了。”他說，“我是外行，怕說不清，還是我們一同去。”于是我隨他同去見傅作義。傅并未堅持要一星期印出，只是囑咐想法找人，越快越好。

我接受了這一任務后，又喜又怕。喜的是，廠中正無活可作，如能完成此項任務，不愁今后無活可作。怕的是，找不到技術工人，不能完成此項任務，顯得自己無能，而且又怕被八路軍發覺給廠里扔上幾個炸彈，不是都完蛋了嗎？總之，我在這一段時期里是懷着興奮與恐懼的心情來進行這一反人民的工作的。

東奔西跑，各方奔走，好容易找到兩位照像制版技工，但是人家要求過奢，每月工資一億五千萬元，比一般工人高出幾倍，而且在出發前須各墊付安家費一億元。為了急于實現這一反動任務，就一切允如所求。

人的問題解決了，但自己沒有此項照像機，請客拜托由一家私營印刷所內借得此種機器拉到自己家里（這時我的家已由張家口移居北平），照了兩天。既是仿制，就要一切逼真，才能騙人。不僅版的花紋、顏色要像，而且紙質好壞、

薄厚和色气也要差不多才行。找来的紙样，仅有一种与晋察冀边区票子的紙差不多，于是决定就先行印制晋察冀边区票子。我带上这两位技工和工长张玉宣回到了张家口。

印出第一批（数目記不清）后，我派工长张玉宣亲自送交总部，据他回来說，首长都很滿意，着即大量赶印。我听了后，也很高兴，遂即加紧工作。大概出厂的共計四批，前三批是送交总部經理处，第四批是交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第三批是由我亲自帶了两班武装战士坐汽車（鐵道中断由保安司令部派車派人护送的）送往北平的。从此，我就留在北平再未回张家口，但对这一工作并未放松，經常用电话与厂里联系和指导。

北平被围的第一夜，炮声隆隆，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坐臥不安，并不由地发笑。我爱人問我：“你还笑什么？”我說：“我笑我自己，我从前在太原上学，因加入共产党而被学校开除，跟着抓我，我跑到河南躲避。現在如果打进城，又被共产党杀掉，不是落了个两头不是人，你說，可笑不可笑？”北平和平解放协定公布后，我的心情似覺和緩，但总担心伪造人民币一事的罪恶行为，恐不能見恕。过了几天，张玉宣找我說，张家口来人說，厂里印的票子已被发现，銀行布告說傳匪伪造晋察冀边区票子，假票子在哪些地方与真票子有点不同，希望群众注意。但群众哪里能識別出来，于是不管真的假的一律拒絕收用。他說：“印票子我們厂里主要是我們两个人的責任大，八路军将来恐不能對我們饒恕，

不如早些走。”我問：“往哪走呢？”他說：“我們往南跑，先到石家莊再說。”我考慮了一下說：“不能走，南邊沒有我們依托的熟人，而且我們的家都在北平，我們走了，她們怎麼辦？印票子固然罪惡大，但是我們是執行命令的，我們沒有花過它一張，只要不慫辦傳作又，我想不會單懲辦我們。”話雖如此說，但我自己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可是解放已經幾個月並未查戶口，也無人問過印票子這件事。

一九四九年的四、五月間，鄉友茹志章由原籍來平。他偕同郭靈墅來到我家，我備了一些酒飯留他們來吃，又有幾位鄉友找茹志章亦來到我家。正在談話的時候，忽然進來兩位公安人員，一男一女，男的笑着問：“你們正在開會？”我說：“這位同志（指茹）才由家里來，多年不見，我留他吃點飯，其他的人也都是到我這里看他來了，並不是開會。”他問：“你現在干什么？”我答以賦閑無職業。他又問：“過去干什么？”我說：“偽華北總部印刷廠廠長。”他說：“印刷廠都印些什麼？”我說，“我們是營業性質，軍政工商各界的活都做。”他笑着又問：“你們印過什麼票子？”這一問，使我一怔，我已想到不說實話是不行了，因為人家早已知道了。于是我說：“印過晉察冀邊區票子。”旁邊站立的那位女公安人員說：“啊！印票子，那你可有錢花了！”我說，“印票子就自己有錢花，那末，現在人民銀行印票子，是不是銀行行長就有錢花呢？”那位男同志對女同志說：“說這些話干什么？”隨即對我說：“你們快吃飯吧，打擾你們，

我們走了”。

关于伪造人民币一事，在我的思想上老是认为罪恶深重，难以饶恕。但在这十余年来，除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間，曾有两位公安人員到我家詢及此事外，再沒有任何人对我提过此事。这說明，只要坦白交待，必能得到党的寬大处理。

（政协烏兰察布盟委员会供稿）

記蔣雁行任“綏远都統” 期間的几件事

关 钟 麟

蔣雁行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十月，继潘矩楹由北洋政府參謀本部參謀次长調任綏远特別行政区都統，到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九月被蔡成勛接替为止，他担任綏远都統为期不到一年。他在綏远呆的日子虽然很短，但是也給人民造下好多灾难，并且从他的一些作为和个人“遭遇”当中，很可以看出北洋軍閥集团的內部矛盾，以及他們收編“土匪”，扩充实力，种植鴉片，聚斂財富，勾結日本帝国主义和宗社党以为奥援的許多具体反动事实和内幕。

我出身于呼和浩特新城滿族中的官僚地主家庭，从綏远中学堂^①毕业后，便以新城地方士紳的身分与軍政官員周旋，被选为归綏县議會議員和山西省議会议候补議員。蔣雁行統治綏远期間，我的五号院內住着蔣的參謀处长周良材，三十七

^① 綏远中学堂原名启秀書院，貽谷担任將軍时改为学堂，专门培养新城滿族子弟，一九一四年与旧城归綏中学堂合并而称为綏远中学堂。

号院内住着蔣的副官处长张凤朝和綏远陆军混成旅旅长王培煥，我同他們不断在一起打牌吃飯，特别是在蔣雁行收撫卢占魁的时候，經蔣的中校參謀也是我的亲戚索景斌（热河淪陷前湯玉麟的參謀长）介紹，让我随軍做文案工作，曾去过黑窖洋堂和烏兰脑包，由于以上这些关系，亲身经历了当时綏远的几桩重大事件。惟恐年代久远，記憶模糊，还查对了《綏远通志初稿》和內蒙古图书馆保存的有关书籍档案，并且訪問了屠厚川（义源）和荣耀宸（祥）等比我年岁大的老人。此篇稿件，是从好几方面的资料归納整理而成。失真遺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同志們予以指正补充。

蔣雁行接任前后的綏远情况

蔣雁行的前任是潘矩楹，潘在綏远的統治于一九一五年后半年开始发生了动搖。是年秋，卢占魁带着三十多个人从外蒙古回来，到了武川西区的同兴公^①，沒有几天就号召起三四千人馬，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蒙汉联軍，把綏远陆军混成旅郑金声团包围在包头鎮內。冬天北洋政府派馮占元的第四支队前来援綏，郑金声团始敢开出包头，到后套駐扎，防守五原，包头归綏間亦断絕了商旅往来。第四支队开至后山，在公义明被卢軍战敗，馮占元受了撤职查办处分，由李

① 固阳老年人兰瑞和賈子政以及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參謀本部調查員胡大才都說是卢占魁初到同兴公时，只有二三十人。

际春率领残兵败将撤回包头。包头于一九一五年底开始戒严，到一九一六年二月初，在萧汉杰的“淮军”没有到达以前，整整关了五十多天城門。

一九一六年以后，卢占魁在后山点起的野火，越发成了燎原的形势，连归綏新旧两城也实行宵禁。卢占魁組織“独立队”，正在袁世凱筹备坐“洪宪皇帝”期間，潘矩楹为了鎮压地面，于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三日(旧历乙卯年腊月初九)杀害了秋天扣捕的国民党京議員归綏中学堂校长兼《一报》社社长王定圻^①，只是在归綏給紳士学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卢占魁的军队于王定圻被害的前七天占领了薩拉齐县城，于王定圻被害后的第二天又攻陷了托克托县城，并且有一部分过了黄河，在一月二十八日夺取了东胜县城^②。潘矩楹在辛亥革命期間，破坏过二十鎮官兵配合吳祿貞第六鎮官兵在北方的起义^③，所以成为窃国大盜袁世凱的宠臣，不料主子正要登基的时候，他在口外連失三城，因此有人认为卢占魁在綏远的軍事行动，是响应了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

薩、托、东三城失陷之后，由于卢占魁不打算据守，李际春的第四支队开出包头，才把薩、托两城收复。但是兵力更加

① 据內蒙古人委參事赵国鼎說，王定圻在乙卯年(民国四年)腊月初九遇害，因为他曾收过尸首。

② 薩托东胜失陷日期說法不一，本文依据《綏远通志初稿·軍事志》所載。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四〇五頁及全国政协《文史資料选輯》第三十輯三一〇頁。

分散，包头越发空虚，归绥一夕数惊，整个绥西除了几座孤城，完全被卢占魁的军队控制。及至二月间多伦镇守使萧汉杰担任了绥远剿匪会办，星夜带着骑兵八百多人开到绥远，以“淮军”当年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那种顽固反动传统，对绥远的“独立队”展开穷追痛击，才把卢占魁的主力赶过黄河，由伊克昭盟压迫到陕北和隴东一带。

萧汉杰的队伍于六月间东开，卢占魁在秋收的时候，又率领主力回到武川西区同兴公。并且参加了陕北三边高石秀^①和隴东庆阳张九才的“哥老会”部队，弓富魁也由續西峰（桐溪）派进里边，被王朝烈收编的白彦山部亦投奔了卢占魁的大营。这时卢的人马约有一万人上下，因为里边有了国民党的成员，故北洋军阀把他们目为匪党。他们看见萧汉杰东调，潘矩楹无能为力，遂决定进攻归绥，把队伍由大青山后向东移动。这时袁世凯已死，潘矩楹在朝中无人支持，段祺瑞遂让蒋雁行指挥蔡成勋第一师的褚恩荣旅援绥，并任命蒋雁行接替了潘矩楹的都统职务。

蒋雁行来到绥远，在十月初旬，由他的同乡归绥道尹申葆亨和潘矩楹的人办理交接手续，他本人即赴绥西督战。由卢占魁号召的各个大小“独立队”，不能协同一致从大青山各沟向前山出击，而是分出好几千人去攻打达尔罕旗王府

^① 高志清，字上修，为西北一带“哥老会”的大龙头，因此人雅称为高石秀，一般又通称为高老大或高大哥，晚年依邓宝珊，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总参谋”，抗战期间病死榆林。

和烏兰花^①，只有崔永胜（豁牙老五）的人从察素齐附近出山夺取归綏，迨崔永胜在黑牛沟口被綏远陸軍混成旅王培煥部的炮兵击毙，以致士气受到影响，攻占归綏的計劃遂沒有实现。进攻达尔罕旗和烏兰花的“独立队”，也遇到王朝烈所收編的汪仲臣部的阻挠，未取得胜利。卢占魁赶快收縮兵力，都集結到現在的固阳县境。蔣雁行于察素齐附近获胜之后，指揮軍隊越过大青山向西北挺进，企图趁胜把卢占魁的“独立队”赶走，不料陷入卢部的包围圈中，褚恩荣的一个整营，在毛忽洞全被解决，受了很大的損失^②，于是褚恩荣去防守包头，蔣雁行也撤回归綏。綏远的局面，又恢复了一年以前的那种形势，北洋軍隊的威信，再一次受到重大的打击。

当时国内的情况，是袁世凱于六月五日死后，北洋軍閥内部开始分裂，形成直、皖两大派系。蔣雁行属于直系，和馮国璋的关系很深（蔣称馮为世叔），馮虽然是副总统，但是远在南京。段祺瑞梦想武力統一全国，把注意力集中于对付南方，給蔣雁行調来蔡成助的一个正規旅，比起萧汉杰的八百多騎兵，认为足可以剿除卢占魁的“独立队”，絕不会再給他增拨队伍。褚恩荣和李际春都是客軍，綏远本区只有

① 見《王朝烈报告》底稿，存內蒙古圖書館。

② 給褚恩荣当过兵的东胜老年人閻志恒和跟过錦福的定边老年人王承印都說北洋軍隊在毛忽洞被卢占魁打败，但蔣雁行給馮国璋的信中則称“惟公忽洞一役，小有不利”，究竟是毛忽洞还是公忽洞待考。

由前清綏遠城和土默特旗的滿洲蒙古兵以及外八旗巡防隊編成的陸軍混成旅和玉祿等的四路警備隊，而陸軍混成旅為王培煥把持，四路警備隊也是各自為謀，不相統屬^①，蔣雁行以光杆都統，很難指揮這些複雜軍隊，如果和盧占魁硬撐下去，恐怕比潘矩楹還難於下台，所以当褚恩榮在毛忽洞吃了敗仗之後，他的肅清綏遠匪患的夢想完全幻滅，便被迫對盧占魁採取了收編的辦法。

另外天主教的南懷義神甫、后套大地主王同春所代表的帝國主義勢力和地方封建勢力出來斡旋和平，也更促成了蔣雁行跟盧占魁的妥協。在北洋軍閥方面，很害怕外國人出來說話，段祺瑞幾次派兵援綏，除了把盧占魁部視為政治土匪，主要是為了保護綏遠區內的洋堂。蔣雁行在十一月間寫給馮國璋的信中，特別強調綏遠有二百多座洋堂，由於兵力單薄，很難一一保護，并把收編盧占魁為綏遠游擊騎兵旅也是由於“比國教士二人，屢次請求收撫”^②。

外國傳教士和大地主，深知北洋正規軍的戰鬥力，遠不如“淮軍”、“湘軍”和“毅軍”這些老牌軍隊，如果雙方拉鋸下去，會影響他們教堂和牛圈的安寧，特別是為了在盧占魁跟前討好，所以願意出面擔任調處。外國神甫和大地主的財產事業都在鄉下，和“獨立隊”以及土匪搞不好關係，

① 見胡大才上蔣雁行條陳，底稿存內蒙古圖書館。

② 蔣雁行給馮國璋的信稿，現存內蒙古圖書館。

便沒有方法存占。民国以来的“独立队”和土匪也一向依靠外国神甫和大地主掩护补給，所以大股土匪很少攻打教堂，尤其王同春这个大地主由于和卢占魁、赵有祿和苏雨生等保持密切联系，他的儿子王英也成了土匪头目。当时不仅王同春替卢占魁奔走，武川西区大地主以后成了固阳的大紳士的刘万，也在蔣雁行收撫卢占魁这件事情上，給“独立队”帮了大忙。

收編卢占魁的詳細經過

卢占魁在一九一六年的前半年，曾縱橫晋綏陕甘四省，由山西杀虎口到甘肃吳忠堡的长城内外，到处都插滿了“独立队”的旗号。声势不下于一九一三年起事到一九一四年八月失败的“白狼”。由于卢占魁的队伍是一支蒙汉联軍，主力都参加过外蒙独立，并且卢本人是辛亥革命时光复丰鎮的张占魁（小状元）的部下，受到山西同盟会會員續桐溪和弓富魁等人的很大影响；到陕北隴东又接納了高石秀和张九才这些“哥老会”的“龙头”，还从那里带回一个假皇帝大耳六吉。内部組織和跟外边的联系，都很錯綜复杂。他重返后山以后，不仅引起当时南北实力派系的注視，好多在政治上失意和生活上沒有着落的文人，也把参加卢占魁的“独立队”，认为是一条很有前途的出路。除了李际春第四支队的下級軍官同卢部打成了朋友，連潘矩楹时代的归綏县知事薛

維摩（养田）的科长和收发主任，也出现在卢占魁的軍中。

从一九一五年冬天到一九一六年秋天，卢占魁的部队連續和好几个省的北洋政府軍队作战。从隴东回到后山，农民快要收割田禾，眼看冬季来临，官兵都不想在冰天雪地中繼續打仗，同时国内的“二次革命”已經結束，北方处于张勋复辟前的稳定状态。卢占魁經過崔永胜在黑牛沟的敗績，知道夺取归綏有一定的困难，占領归綏以后能否坚守，也沒有絕对的把握。很需要暂时停頓下来，进行休整，并且观望时局如何演变，以决定下一步行动。所以南怀义神甫和王同春替双方談和，很符合那个时候卢占魁部队里边多数人的愿望。

南怀义神甫和王同春是在褚恩荣退回包头以后，特地来归綏向蔣雁行提出收撫建議的。他們并且到同兴公見了卢占魁，传达了蔣雁行的誠意。以后由武川西区大地主以身家性命作为担保，让西区另一个大地主孙板达子陪着卢的代表錦福（归綏麻花板土默特旗蒙人）到达包头，和蔣的参謀处长周良材进行初步談判。过了一九一七年春节，孙板达子又陪同錦福来到归綏，随行的还有卢占魁另外两个代表，一个是給归綏县知事薛維摩当过收发主任的河南人张靜山，另一个是河南人王忠义。他們来到归綏被安頓在旧城小东街“宴美园”（即現在的大观劇場）对过的天津人兰竹坡所开的“綏远飯店”，由蔣雁行的副官处长张凤朝亲自担任招待，进行了正式协商。

經過十几天，最后决定把卢占魁的軍队收編为綏远游击

騎兵旅，歸蔣雁行所兼的綏遠警備總司令直接指揮，并向北洋政府請准二十萬元，做為招撫和裁遣費用。由警備總司令部參謀處長周良材、副官處長張鳳朝、中校參謀索景斌和少校軍法官劉景橋組成一個編制委員會，我因索景斌的推薦，並經周良材和張鳳朝的同意，由蔣雁行委任為這個委員會的文案。

編制盧占魁部队的委員，於陰曆二月初二那天隨蔣雁行離開歸綏。都統由錦福等領著騎馬先行，我和兩個書記坐著一輛二騾轎車由都統署的兵和盧占魁的兵保護著跟在後邊，車中帶著二十萬塊“交通銀行”現鈔，一萬多張印好的“免死証”和給盧占魁從北京定做的藍色毛呢陸軍少將制服。此外還有三顆官印，編制的是“綏遠游擊騎兵旅”，但是發的印是“統領”和左右分統，至今我還弄不清是什麼原因。我們頭一天駐武川縣城，第二天駐烏蘭不浪，第三天就到達黑窖洋堂。後山一帶經過一九一六年一年的“獨立隊”和官兵騷擾，農民逃亡的很多，好多地主和買賣字號的“牛犖”，都成了沒有人住的破爛園圃，但是城鎮的商人和傳教的外國人，仍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一出歸綏過了蜈蚣壩，就進入盧占魁控制的地區。

當時附屬於盧占魁的隊伍很多，自稱“統領”的就有四五十個，所謂“大青山兩狼山後及沙拉木里河、托城、和林、清水河一帶，匪勢叢集”^①，並不浮誇虛構。蔣雁行只

^① 見胡大才上將雁行條陳。

是把卢占魁收編为旅长，由张耀（喜神老四）和武得功（格尔济老五）担任团长，称左右分統。我記得张耀的三个营长里有段成功（二长条）和白彥山、武得功三个营长里有巴音豹和謝子晋（河北人）。卢的旅部参謀长是张靜山，副官长是錦福，由給归綏县知事薛維摩当过科长的山东济宁州人李子材担任文案。全旅共編制了一千五百多官兵，弓富魁、高石秀和赵有祿等，都分別由蔣雁行聘为都統署的参議。

卢占魁的就职典礼，于阴历二月中旬在黑窖洋堂隆重举行。事先由索景斌給卢占魁和两个团长教了接印的陆軍礼节，并由兵們給筑起一座五尺高的土台，上边搭着紅藍布彩棚，两边插着五色国旗，都是从包头的“大行”（商会）借来，褚恩荣还给派来一队号兵。卢占魁脫下黑大絨皮袄皮褲，把辮子压在制服里边，戴起插有“扫天翎”的将官軍帽，拄着指揮刀，穿着馬靴登上“将台”，軍乐奏起，台下两千多兵也都停止了喧嘩。蔣雁行代表北洋政府监督，給官兵們讲了話，卢占魁沒有表示什么，我看見他“感慨”得流下眼泪。黑窖洋堂的外国人，用摄影机照了好多像。

卢占魁就职以后，蔣雁行就带着周良材和索景斌等回了包头，临行卢占魁挑出三四百服装相同的兵，排成仪仗队欢送，我来时坐的那輛轎車，載了一整車卢送給蔣的礼物，大烟土用裝步枪的大木箱盛着。蔣走了以后，副官处长张凤朝和軍法官刘景桥，带着我們三个办公事的文职人員，在黑窖洋堂住了一个多月，又随着卢占魁的旅部經高台梁开进后

套，到了狼山底下的烏兰腦包鎮。那里有一个能駐一旅隊伍的營盤，是一九一三年薩拉齊知事王建屏和後套大地主王同春因為防堵外蒙軍隊南下給山西陸軍第一師孔庚的隊伍修建的，盧占魁的人都住在那里，事先由王同春派人給修葺粉刷得煥然一新。我們點編委員會的人，則住在包頭廣恒西毛店設庄在烏鎮的櫃上。

北洋政府發給蔣雁行招撫編遺盧占魁部队的二十万块钱，据我所知只用去一半。原先按統領一万、分統八千、營長五千進行招撫，未列入編制的按軍官一百元、士兵二十元遣散，馬匹也按官價二十元收買。款項都由張鳳朝經手，我和兩個書記只造箕斗冊子，究竟張鳳朝把款項如數給了盧占魁和他的左右分統以及六個營長沒有，那就不得而知了。綏遠游擊騎兵旅的編制只有一千五百多人，其餘有七八千人都在裁遣之列，但是這七八千人並沒有解散，連武川縣長王朝烈收編的達賴公的部隊，後來也拉到烏兰腦包附近。當時盧占魁所屬的各個“獨立隊”，有的把遣散費領去，有的干脆就沒呈報名冊，完全听張靜山和錦福的陳述，張鳳朝根本不敢也不願在烏兰腦包外邊查核。這一筆很大的款項就在互相欺騙的情況下，馬馬虎虎做了報銷。

盧占魁的軍隊開入後套以後，完全由王同春的“牛糞”給支墊糧草。至於餉項也不成問題，因為盧占魁的人從陝北隴東轉了一圈，打開不少殷實的商鎮堡寨，每個兵都是滿載而歸，甚至有一兩匹空馬馱着元寶烟土和值錢的衣裳，三年

五載不发餉也足够零花。所以卢部自从收撫以后，紀律保持得很好，有的穿上軍衣，有的仍穿着便衣，都拿出資本和农民大面积地伙种起鴉片。张凤朝和刘景桥回了归綏以后，两个書記为了貪图那里的酒食招待，央求我多在烏兰脑包呆一个礼拜，鴉片快要开花的时候，他俩还没离开那里，我只好一个人带着公文回来办理交待。

卢占魁在烏兰脑包时，各方面派遣举荐去的人很多。弓富魁和赵有祿，也以都統署参議的名义，穿着軍衣在归綏、包头两地，展开了联络应酬。他們跟蔣雁行和褚恩荣的軍官，成天在一块吃喝玩乐。我没有见过高石秀，因为我們到烏兰脑包以前，他和张九才带着那个大耳朵活佛，从后套过了宁夏。我在烏兰脑包时，还发现归綏新城的李春秀把他的軍需长明文达，經索景斌介紹給白彥山担任了書記官，钻到卢占魁的队伍里搞滿族宗社党的政治活动。

宗社党活动与王培煥独立

归綏的新城，居住的多是滿民，所以是清宗社党在长城日外的一个活动据点。早在一九一二年秋天，已經发表了张紹曾为綏远將軍，但是还未到任的时候，就有如意（外号雪花如意）、瑞寿（外号叫麻瑞寿）、文貴和瞎彪子等地方无賴，受宗社党人鼓动，想在新城起事。他們利用辛亥革命时西安屠杀滿城的民族仇恨，在山神庙秘密集合起好多年輕浪

蕩子弟，企圖讓新城滿營的四個營長，即步兵第一營營長阿克敦、步兵第二營營長寧雙安、騎兵營長李春秀和炮兵營長趙嵩秀，胁迫代理綏遠城將軍莖岫和回到新城的前科布多參贊大臣英秀、前达尔巴哈台領隊榮昌（英秀和榮昌都是歸綏新城的旗人）等滿族上层人士在綏遠宣布獨立。如果北洋政府出兵，即和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聯合起來對抗民國。

那時新城四個營的官兵，一到夜晚即離開各自的營盤回家休息。我父親阿克敦有一天正在睡夢之際，被一伙手執刀矛的年輕人從牆上跳下叫醒，讓他穿好衣裳跟上他們去議事。莖岫在將軍衙門聞變，派人把英秀和榮昌等人請來商量，決定趕快讓客軍協統李星閣出兵彈壓。隊伍由大教場從西門進來，在鼓樓上架設了機關槍，跑步到東北城角，即把山神廟包圍。雪花如意一看機謀洩露，從城牆上跳出逃跑，其餘的人都被扣捕，除瑞壽、文貴、賸彪子等三人而外，均取保釋放。後來莖岫把這三個人交給張紹曾處理，張也沒有加以深究，於一九一三年春節以前，便恢復了他們的自由。宗社黨在綏遠第一次的起事，就這樣結束了。

宗社黨經過雪花如意事件，便轉入非常隱蔽的地下活動。莖岫等人所以鎮壓起事，都是為了保全身家。拿我的父親來說，不僅在城里有房產鋪產，而且鄉下有土地和菜園，特別是到了民國時代，仍然有官可作，因此不願意跟着他們生事闖禍，認為莖岫派李星閣的隊伍從山神廟中把他接出，是一件很大的幸事。於是宗社黨以後吸收爭取的對象，就轉到索

景斌、李春秀和明文达这些具有政治野心的少壮军人方面。因为他们不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便是陆军大学毕业，但是民国以后受到汉族军阀的排挤，心中很不服气。一般老朽昏庸的旧官僚，则是愿意风平浪静地度过晚年。李春秀把他的军需长明文达打发到白彦山那里，就是感觉自己在綏远陆军混成旅里老担任营长，没有发展前途。到了一九一六年秋天，他看见袁世凯死去，北洋军阀内部开始分崩离析，就唆使明文达在白彦山那里更加活动起来。白彦山是归綏城西榆树达尔架的蒙人，率领的尽是被张绍曾解除武装投奔了卢占魁的土默特旗的老兵，李春秀很想先把白彦山拉拢过来，并进而将卢占魁争取到宗社党内部，做为自己在政治上投机的资本。李春秀这个人自命不凡，满脑袋升官思想，无怪他以后拿上旗民生计处的财产，向马福祥换取警务处长，在日本占领归綏期间，还一度任过伪厚和市的市长。

卢占魁在一九一七年秋天到陕西参加“靖国军”以前，跟各方面乱拉关系。一九一二年在归綏新城起事失败的雪花如意，从綏远先逃到外蒙，以后就加入卢占魁的队伍。一九一六年春天，卢占魁在后山厂汗髯髯沟打了一个败仗，被萧汉杰的队伍活捉了刘继汉（即参加包头辛亥革命的长毛子），雪花如意也在那次战役被击毙。

一九一七年蔣雁行到北京出席“督军团”会议，那时我还没有离开乌兰脑包，卢占魁的大营盘里，突然由归綏旧城太平召驻北京雍和宫的朱大喇嘛，从包头给领来三个人，两个是

日本人，一个是滿族人，住了四五天以后，卢占魁派明文达把他們送回包头。临行以前明文达悄悄告我，說这三个人是安徽督軍張勳的代表，他們在归綏見了陸軍混成旅旅長王培煥后，又来烏兰腦包見卢占魁，卢占魁叫他跟上他們去徐州見張勳，代表卢占魁进行聯絡。明文达还說，卢占魁給他拿了五千块錢，叫他路过包头置办名貴土产送禮，并做为活动費用。我回到归綏以后，弓富魁和赵有祿住在旧城西順城街“三順馬店”，和王培煥很近乎，除了在三順馬店給王培煥向剛成立起的平康里叫条子，还来新城在索景斌和周良材家中跟王培煥打牌。不久明文达从徐州回来，并且繞道大連，見了前清的肅親王(川島芳子的父亲)。肅親王給王培煥和卢占魁都送了禮物，給卢占魁的是两匹团花貢緞和一柄玉如意。

王培煥是山东人，他跟索景斌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辛亥革命时他任駐防开封的第十鎮二十九混成協騎兵营营长，因为来口外购买軍馬，所以在那个“时勢造英雄”的变动中未曾出头露面，心中老以为憾。他在一九一一年出过口外，知道内蒙地区人强馬壯，如果能掌握到三五千塞上騎士，可以大有作为，所以他随蔣雁行来到綏远之后，很想搞一番事业，除了极力拉攏各部队的軍官，并且不断和内地的大軍閥书信往返。由于蔣的資望較淺，在皖系当权的北洋政府中沒有得力靠山，并且因为收編卢占魁遭到好多人的反对，王培煥隐藏的鋒芒就漸漸地显露出来。蔣雁行起初和王培煥很好，在成立警备总司令部时，还让王給兼任了參謀

长，后来因为王要掌握部队，想把直属于他的混成旅郑金声团调回绥远，而蒋要把郑团留在五原看守后套，据周良材说两个人因此发生了争执，弄得面红耳赤起来。一九一七年春天蒋雁行收编卢占魁完毕，路过包头，向褚恩荣借了一营人担任卫队，就是看见王培焕处处不听调动，恐怕必要时被王劫持。蒋雁行到北京开会时，让绥远道尹申葆亨代理都统，把警备总司令部的事，完全托付给他的亲信副官处长张凤朝。张凤朝不识货色，没有把王培焕放在眼里，遂在得意忘形的情况下，被王杀死，做了蒋王斗争的牺牲品。

王培焕杀了张凤朝，就自立为绥远都统，先向徐州通电反对共和，请“张大帅即日召集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五月二十三日黎元洪免了段祺瑞的职务，王培焕随着冀、鲁、豫、陕、奉、浙、闽、皖八省通电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也正式宣布了他在绥远的独立，并且委褚恩荣为绥西镇守使，把他的混成旅和卢占魁的游击骑兵旅都升格为师，郑金声、王海门、倪海如和喜神老四与格尔计老五等，也就成了王培焕任命的旅长了。王培焕虽然这样兴风作浪，但是独立各省在天津成立军务参议处，没有王的代表前去参加，七月一日溥仪在京复辟，也只任命他为署理绥远都统。王培焕接到“上谕”后，却发出了一个“率同绥远道尹申葆亨、绥西镇守使褚恩荣暨文武各员望阙叩头，仰答鸿庥，伏乞皇上圣鉴”的电报。段祺瑞以后就拿这个电报，做了王培焕附逆的证据，于九月间派蔡成勋带领第一师来绥远查办，结果王培焕做了两

个多月綏远的假都統，最后落了个畏罪潜逃。

张勋复辟期間，王培煥自称將軍，通令归綏新旧两城机关商店，悬挂龙旗庆祝。都統署西轅門外边，曾搭起一座彩台，从旧城把“千二紅”、“二庆旦”和“飞来凤”这些艺人調来，唱演了三天晋剧。

卢占魁在复辟以前，虽然跟张勋和王培煥交通来往，是为了多树立友軍，并非走上宗社党的道路。因为自从續桐溪把弓富魁派来，他已逐渐确定了倾向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复辟期間他既沒有拥戴张勋，也未借此声討王培煥和褚恩榮，而是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据明文达从后套回来和我說，主要是因为官兵都扔不下已經开了刀子的罌粟，所以未曾卷入这一場漩渦里。并且時間只有十二天，卢占魁也来不及考虑一切。

明文达給宗社党活动，結果沒搞出什么名堂，不过他从张勋、肃亲王、王培煥和卢占魁手中，騙了将近一万多块钱，以后在后套买了好多土地，成了临河县的大地主，于一九五一年鎮压反革命时畏罪上吊自杀。

归綏巨商大盛魁經理段履庄和包头地方士紳卜兆瑞，因为蔣雁行和卢占魁妥协，在綏远大种洋烟，把匪患和烟祸交織在一起貽害人民，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控告。他們在一九一七年春天到达北京，以綏远紳商代表的名义，向总統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分別递上了呈文。殊不知黎、段正搞府院爭

執，蔣雁行雖然是個都統，實際上也是個小的督軍，黎元洪因為聯合直系對抗皖系，段祺瑞利用“督軍團”做為後盾，要挾黎元洪，無論總統府和國務院都不會處理這個案件。結果他們呆等了兩個多月，沒有得到府院的答復。段履庄住在大盛魁的聯號打磨廠大盛川票號，生活比在歸綏還要舒服，卜兆瑞住在“三晉東館”，就陷入被困京華不敢回家的境地。

那個時候土默特旗人榮祥，正在北京法政大學讀書，看見日本人所辦的《順天時報》上登出一條段芝貴想要出山的消息。他為了把蔣雁行告倒，便給卜兆瑞想了個“以毒攻毒”的辦法，就是讓“小段”（段芝貴）在老段（段祺瑞）跟前活動，而把蔣雁行撤換。因為段芝貴自從卸任湖北督軍以後，住在天津非常無聊，不能出任督軍，也願意屈就都統。卜兆瑞和段履庄一聽這個計劃很好，因為這樣不僅可以撤掉蔣雁行，而且也能趕跑盧占魁，段芝貴如果當了綏遠都統，可以得到皖系的全力支持，把地方的匪患肅清。由於他們控告蔣雁行沒有得到結果，喪失了打官司的勇氣，便鼓動榮祥這個青年學生去進行此項活動。

榮祥曾為此事，由北京到了天津。時段芝貴在法租界的法國醫院中養病，被榮祥所寫的擁戴的信件打動了心，知道綏遠地區大有可為，便帶病接見了榮祥。說是“蔣雁行連個好幕僚都當不了，那能夠充任邊疆大員”，表示“很願意給綏遠的父老幫忙”，並特地給榮祥寫了一封介紹信，讓他回

北京找京师警察总监吳炳湘（安徽合肥人）聯絡。以后段芝貴派人看望了綏远的代表，还有一个担任过綏远塞北关监督的合肥人虞維鐸，受了段的委托，临时又参加进一个民国元年曾任归化关监督的托克托县人刘兆瑞，和他們策划起拥段倒蔣的运动。正当綏远的代表和皖系联合起来对付蔣雁行的时候，北京发生了复辟的变动。因为段祺瑞在馬厂誓师討逆，打敗張勳后，完全操縱了北洋政府，段芝貴就掌握了軍隊，对綏远都統已經不感觉兴趣，遂派蔡成勳前来綏远，接替了蔣雁行的职务。

（內蒙古文史研究館供稿）

我所知道的“長头发教”

温 立 中

“一心堂”又名“长头发教”。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始改为“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以下简称“圣教会”）。該教正式創立于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一九三〇年春天綏远遭灾荒时，就有山西人黃青云，由五台山銅瓦殿来归綏附近劝告存粮的人家救济餓民，并把他們吸收为道徒。首先参加的有归綏黑沙图村的梁三、保尔哈少村的韓步瀛、毫沁营子的郑儒和察素齐以西薩拉齐县第五区的王琳。他們都是吃飽飯无事可做，想要成为神仙的封建地主。

我是归綏东区五路村人，在私塾念书的时候，被教书的老先生給灌輸了滿脑袋吕洞宾和韓湘子的出家思想。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秋天，因为流行“虎烈拉”时疫，归綏东区被傳染死亡的人很多。黑沙图的梁三借此在上四村（黑沙图、美岱、太平庄、新庄子）和下三村（五路、添密、集賢）大肆宣传“一心堂”的好处，說是留起头发即可免此灾难，所以我也誤入了这个反动会道門。曾穿起道袍，立起善堂，卖过一頃多好地，坐过三次監獄，为发展“一心

堂”的組織，整整地鬼混了二十年。并且还去过天津南开楊家花园朝見過馬冠英和他的老婆賈氏，即道徒們所謂的“老父”和“老母”。

“一心堂”系馬冠英創辦，據說他是山东省济南府长山县大丁王庄人，他的老婆賈氏是同县郵王庄人，概沒有生过儿女。

最早馬冠英夫妇装着討吃的时候，不喊各各奶奶，而說：“誰是我們的娃娃，就給我們一匙半碗。”有人感覺这两个要飯的特別奇怪，便跟他們攀談起来，他們就危言聳听，說是“中国人的劫数快要来到，只有貧穷的和懦弱方可躲过。”并将类似耶穌教聖經上“人們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給他”的話，編成“口歌子”，劝人們裝穷裝“松”，把产业完全卖掉，跟上他們两个去办道。“先渡穷，后渡富，大官小員末后渡”地去“普渡众生，脱离苦海”。

解放以后我經過劳动改造，想到馬冠英夫妇一度住在天津日租界明德里和以后搬到南开楊家花园，在“圣教会”的牌子上面还写着“大东亚佛教总会”七个字来判断，怀疑馬冠英夫妇是“甲午战争”前后由日本帝国主义訓練出的間諜，披着宗教外衣搞破坏生产麻醉人心的活动。他們当然有一套迷信的那說和欺騙百姓的手段伎俩，因此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到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这十二年期間，在华北各省吸收了好几千道徒。

从一九二四年开始，馬冠英夫妇已經成为“神秘”人物，

行动非常詭秘，表示他們来去无踪，把传道的事，完全交给最先吸收的徒弟們去搞。这些人們都留着辮子，穿着蓝布大褂，脚登双脸布鞋，手提一个紅紙灯笼。人如問：“你們是干什么的？”他們說：“是寻人的，从甲子年半夜子时出来，寻六百万年前的兄弟姐妹，他认得我，我也认得他。”并說：“父母叫把产业卖淨，跟上我回去哩。”再要問他們：“父母在什么地方？”他們說：“在距此十万八千里的‘灵山’，若要心誠坐上火車就能到达。”原来所謂的“灵山”就在馬冠英夫妇的山东老家。

大概是一九二八年，蔣介石的北伐軍进入山东的时候，馬冠英夫妇曾在他們的家中插旗搭棚聚集道徒，朝見“老父”和“老母”的善男信女，竟到場一万人以上，国民党軍队的指揮官陈調元，恐怕他們起事搗乱，曾派队伍把大丁王庄包围，用大炮将会众驅散。此事是否在日本人制造“五三慘案”期間，很值得加以考証。后来因为国民党在山东严厉取締“一心堂”，馬冠英夫妇无处存留，便到亲日的閻錫山的統治区里躲避风头，将“灵山”迁移至五台山的銅瓦殿。一九三〇年来綏远开辟“一心堂”的黄青云，就是从五台山派来的。我在一九五三年劳动改造以前很相信关于銅瓦殿是什么普济佛所建的一派胡說。

“一心堂”从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这个“金鸡年”开始，又改变增添了許多新的花样。道徒将辮子挽成发髻，蓝布大褂換成大襟向右的圓領道袍，宣传教义时，改为

手拿一杆黄布三角小旗，上写“奉天命，普天游，登山涉水苦殷求。”人们如问：“你们是招兵的吧？”他们回答：“我们是招兵的，招的是天兵。”人们再问：“你们是卖药的吧？”他们回答：“我们是卖药的，卖的是后悔药。”如把他们让回家中，便宣传开舍衣、放饭、修桥、补路，所谓普救世人的一套大道理。来上三回五回，看见人们招待殷勤，才动员人们参加他们的“善堂”。

来绥远开辟“一心堂”的黄青云，宣传了两年工夫，先提红灯后拿黄旗到处奔走，在归绥东区吸收了一百多道徒。

“一心堂”无忌荤忌酒忌烟忌色等清规，但是必须蓄发和穿圆领道袍，这一戒条好多人就接受不了。并且当几个入了“一心堂”的道徒，真个卖房卖地的时候，引起官厅和乡村大户的怀疑。在一九三一年秋天，曾被当时的归绥县县长郑植昌把保尔合少韩步瀛等处“善堂”查抄，并将韩步瀛、郑儒、刘秉中等二十余人扣起，管押了八个多月没有调查出其它不法行为，把头发剃掉释放。所以参加的人特别稀少，不像当时的“青帮”和以后的“一贯道”那样踊跃。

我于一九三二年秋天加入“一心堂”，在韩步瀛等释放不久以后。除了由于害怕瘟疫，临时去抱佛脚而外，还以一种好奇的心理，想看看他们究竟在搞什么。因为半信半疑，蓄起长发穿起道袍羞的不敢见人。到了一九三三年冬天，黄青云扬言翌年春节，天要告变，果然在一九三四年大年初一（二月十四号）那天，太阳突然完全蚀掉。我只念了四年多

私塾，根本不知道科学道理，便把天文学家早已推算出的星际变化，认为是他们未卜先知。因此才对“一心堂”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心而执迷不悟。除过卖了一顷多好地，在家里设立起“善堂”，招待各处前来的道徒，临走给拿盘缠，还处处勾引和我接近的亲戚朋友下水。于是我就成了“一心堂”的积极分子，被许多道徒拥为出头露面的人物。

馬冠英夫妇和他们左右的道徒，利用一九三四年春节的那次日蝕，大肆妖言惑众，所以这一年参加“一心堂”的剧增，单是归綏附近，就由原来一百多人发展至五百多人。馬冠英夫妇看见自己已经掌握起好几万“善男”“信女”，便于冬天离开五台山铜瓦殿，跑到天津日租界，在明德里赁了好几十间房，筹备成立“圣教会”，把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定为天盘由东向西开始旋转的一年。这一年除了正式成立起“圣教会”，并且出版印行了一本《廻輪传》和一纸《阴阳日历三合对照表》。同时规定道徒们无论称呼什么，都要在前边冠以一个“新”字，例如我这次从“新”北平，坐上“新”火车回“新”归綏，路上见了许多“新”旅客等等。起初觉得非常烦琐。

《廻輪传》据说是一部前知五千年和后知五千年的天书，内载宇宙万物都是“老父”和“老母”所造，乙亥年以前中国的历史，也都是“老父”和“老母”的安排。我们那时为了争取知识分子入会，曾送给保尔合少村的李世魁（即现在内蒙古人委参事室参事李致方）一部，他翻了几页便扔到窗

戶外邊，說里边尽系荒誕无稽之談，劝我們好好养种庄稼，不要相信这些胡言乱語。关于乙亥年以后的事，說蔣介石的中央是假中央，以后要出現新中央，最后才有真中央。另外还有好多藏头露尾，类似《推背图》那样的讖語。当时我們越是看不懂，越认为是天机不可泄露，所以都把这部《廻輪传》，用黃布包起，供在善堂正中所挂的“佛”字底下。

《阴阳日历三合对照表》里边，除了阴历和阳历，还有馬冠英夫妇所創的一种“日历”。每年定为十八个月，每月定为四十五天，一年就成了八百一十天。据《廻輪传》上記載，月光将要逐渐变紅，日光将要逐渐变白，四季和月令都要逐渐延长，总之天地和世道要变成另一种样子。我們完全按“日历”来行事，記得有一年阴历六月天的一个中午，我們西瓜、月餅的大过起中秋佳节。顛倒黑白到如此地步，簡直成了一伙神經病患者。

馬冠英夫妇把“圣教会”設立在天津日租界不久，許是怕人們怀疑他們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結，在一九三六年又将会址設到南开楊家花园，以避外界揣測。这一年我为了表示真心誠意，拿上卖地剩下的三百五十块現大洋，从归綏去到天津，朝見了一次他們，当时一块錢能买二斗五升麦子，我无异将八十七石多小麦，即两万六千多斤細粮，孝敬了这两个活在世上的“神仙”。本来是上了当，还以为得到了莫大的幸运。

朝見“老父”和“老母”，并不像蒙古人到五台山拜佛

那样简单。除了也要拿钱，还必须在杨家花园经过长期的类似和尚的“受戒”。我在那里整整受了半年多“洋罪”，才好容易见到马冠英夫妇。在这将近二百天当中，一直耐心静坐在那里等待传见。杨家花园有好几十间楼房，当时一共住着二三百从各方面前来朝见的人，可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如同在寺院一样。伙食顿顿是小米稀粥和玉米面窝头，每桌只给放一碟腌咸菜。十几个人在一盆水里洗脸，十分肮脏。伏天不叫打开楼窗，把人们热得浑身淌汗。所有这些无非是为了提高马冠英夫妇的身份和地位，把他们供奉成两个不能随便接近的“真神”。

我们从绥远去的四五个人，一共花了一千多块钱，由春天等到秋天，终于得到了马冠英夫妇的召见。其时马冠英已有七十大几，由于养尊处优，并且下过道家打坐修炼的长期工夫，精神显得特别旺盛，说话的声音非常洪亮，真是鹤发童颜、道貌岸然的样子，当时我们由不得肃然起敬。他如同俗人似的，把我们让在布置古雅的客厅的太师椅子里边，不叫行跪拜的礼节。跟我们很随便地品茶谈心，扯了一套“万教归一”的道理。并说他不久就要归隐“灵山”，让我们赶快回去“打枷锁”^①办真事，以逃中国人的空前浩劫。只要穷了和“松”了，就可免去灾难祸患。

我和郑儒等四五个人，这下满以为自己成了半仙之体，

^① “打枷锁”就是把产业完全卖掉，变成一个赤贫如洗的流浪人，去吃其他教徒，直至吃穷为止。

誰也不敢觸犯我們了。不料从天津回来，一下归綏火車站，便被一伙警察宪兵捆起，五花大綁地給扔进单駱轎車里边，押到省会公安局的看守所。原来一九三六年春天，陕北的紅軍东渡黄河抗日，和閻錫山的反动部队，在晋西发生了战事。綏远民政厅长兼省会公安局局长袁庆曾，接到五路和毫沁营子“乡村工作指导員”的报告，說我們平日把田产卖掉周济穷人，这次又突然离开綏远半年以上。我們在天津的时候，正是紅軍和晋綏軍在山西打仗的期間，认为我們有很大的共产党嫌疑，所以便把我們扣捕起来审讯。

跟我們押在一起的，有三个真共产党员，有一个广东口音的，在每次“放风”的时候，拿我們嘲笑国民党，說是“有眼不識真山玉”。我們被捕以后，曾明灯蜡烛地夜审过一次，各种刑具摆了一地，也沒有詐唬出什么口供。后来一看我們这几个人，無論言談举动，和共产党员都迥然不同，所以不再深究，关押了不到一个礼拜，就移送到归綏县政府处理。我們认为这次被捕，是“老父”和“老母”對我們的試探考驗，沒有受到非刑拷打，也是“他們”在暗中保佑我們。

送到归綏县政府以后，县长郝熙元叫我們住到“优待室”里，非但沒有开庭审問，并且把我們叫到他的会客室中，和我們几个攀起了道。据他自己介紹是“还乡道”的信徒，“还乡道”和“一心堂”大同小异，在他的家乡山西潞安府都很盛行。也許是“志同道合”的緣故，郝熙元結果把我們只判了八十天劳役，派到孤魂滩托扣土坯，不知修盖什么房

舍。我們在托扣土坯的時候，郝熙元差不多每天去看我們，叫我們都坐在他的跟前，大談“老父”和“老母”的情形。我們堅決不肯剃頭，他說“你們出去還能再留”，一看抗不過去，便將頭髮剃掉取保釋放。我們當時把歸綏縣長郝熙元，視為是“老父”和“老母”點化他來搭救我們的一個“貴人”。

我們釋放回到村中，迷信越發加深，我原來打算把所有的土地完全賣掉，同村歸綏縣偽國大代表張守儉的父親罵我既不念祖先創業的艱難，又不顧兒女生活教育，完全是個不孝不仁的人，我才保留下四十多畝。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以前，馬冠英夫婦即不知去向，據說他們臨走的時候，曾囑咐人們把各項活動一律停止。可是他的徒弟陶永祥，在日偽統治時期擔任了“聖教會”總會的會長，把會務搞得越發起勁。在華北各大城市和江南的上海、武漢等地，都成立了“聖教會”的分会。綏遠的分会於一九四一年成立，地址設立在歸綏的西五十家街，租賃了從前開過“東悅樓飯莊”的三十多間房屋，派山東人馬天申擔任分会的會長。規定道徒每月納會費五角，出力出錢聽任自願，分会收入不足會務開支，由總會撥款補助。我仍然擔任聯絡員，經常去天津報銷帳目和單據。

“聖教會綏遠分会”成立以後，共登記起道徒一千多人。除了歸綏東区和察素齊及以西薩拉齊縣第五區，托克托縣的黑水泉子和大青山里的二十家子一帶，也有“一心堂”的信

徒。分会还成立了一座“新圣儒小学”，共分为六个年级，招收了二百多学生，功课和普通小学相同，只是免收学费，并且书籍笔墨完全由会上供给。校长叫范景新，是山西晋南人，他和几个教员，都是由天津总会派来的。他们一律不拿薪金，享受一日三餐和每年四季衣服待遇。

“一心堂”成立这座学校的目的，旨在扩大社会影响。正如每年办理冬赈一样，并不劝告念书和吃饭的人入道。可是许多学生的家长以及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就因为这些办学校和办冬赈的“善举”而参加了“一心堂”。自从成立起分会，吸收的道徒已经不单纯是中小地主和富裕中农，许多失意的军人和具有政治野心的人，也多参加进来，如一九五二年从山西来勾引我去晋城开会的那个閻文彩，就曾在晋军中担任过下级军官，他染有鸦片嗜好，抗日战争期间他在绥远，日本投降以后他在山西又搞了些什么，我就不大清楚了。

日本人起初对“一心堂”不闻不问，以后发现成员复杂，特别是冬天放饭时，每天能熬一石小米的稀粥，整整放一百天，每年秋收以后，大青山里的道徒，进城给会上捐献白面和莜面，还有住在城里给会上担水煮饭，办完冬赈方才回去的。因此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说我们跟“八路军”勾通，曾将马天申、范景新和我，都传到宪兵队审问，情势似乎非常严重，把我们跟政治犯在一起禁闭了好几天。及至我们说出“圣教会”的总会曾经创立于天津日租界内，日本人才把我们释放。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回来，首先就把“圣教会”查封，将“新圣儒小学”勒令解散。

一九五一年听见人民政府镇压了许多“一贯道”的坛主，我们吓得把头发剃掉，并且将“善堂”中所挂的“佛”字取下，但是道徒之间仍秘密来往。这一年人民政府结合着剿匪肃特，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二十多年以前“老父”和“老母”叫人们装“松”装穷的话都应了。因此我更加迷信起来，认为馬冠英夫妇真是袖统阴阳八卦，一定不是凡夫俗子，绝对是上天降下来点化人的真神。所以我在一九五二年春节期间，又去晋城出席了“一心堂”在阴历正月初六（二月一日）非法召开的一次会议。当时参加的有五六百道徒。我是阴历腊月二十八由归绥到了太原，三十日晚上赶到晋城的。晋城公安部门当即把参加的人扣捕起来，后来分别递解回原籍。我因解放以后，仍然一贯乱说乱动，遂由归绥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劳动改造三年，这是我为“一心堂”坐的第三次监狱。

我在改造期间，经过党的宽大处理和耐心说服教育，始知我受了反动会道门二十多年的欺骗。“一心堂”的确跟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只是主脑人物不敢叫道徒们知道，因此我间接地搞过不少汉奸活动，还以为是热心为“善堂”工作服务。

（刘映元记录，政协呼和浩特市委员会供稿）

汪睿昌和他創办的蒙文书社

白 彦 巴 图

汪 睿 昌 簡 史

汪睿昌（一八八八——一九三九年）字印候，乳名奥道尔，蒙名特睦格图，还特别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叫古松。昭烏达盟喀喇沁旗人。他的祖父达兰太，曾任喀喇沁旗管旗章京，后来他家沒落了。他自幼很聪明，喀喇沁右旗王爷貢桑諾尔布因此很喜欢他，就收为义子，送他到本旗成立的崇正学堂学习。貢王由崇正学堂选拔优秀学生时，他也被选送北京俄文学堂学俄文，以后又被送往日本东京振武学堂，他在陆军士官科毕业，又轉入东京慈惠医科大学。他学了陆军士官，又学了医学技术，还欲作文学工作，钻研文学，研究古典名著。

汪睿昌通晓蒙、汉、日三种語言文字。

他的摄影艺术也很好，留学日本回国后，于一九一四年开始在北京蒙藏院工作，任荐任翻譯官、首席翻譯官兼庶务科科长。一九二四年创办蒙文书社，自任經理。一九二五年

第九世班禪到北京后，他在北京瀛台兼班禪照料处处长，又兼班禪印經处处长。一九二九年他任南京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科长兼常任編审。一九三四年元月間他勾結日本駐南京大使，于五月間結束蒙文书社，离开南京公然投靠了日寇，他到伪滿后，在錢家店、王爷庙（即烏兰浩特）任兴安軍官学校教授。一九三九年死于烏兰浩特的兴安軍官学校。

汪容昌青年时期，有哈薩巴塔尔，汉名金玉斋，俗称二金老爷者，家境富饒，有权有势，把大女儿金淑貞許配給他为妻，生活所需全由金家供給。金淑貞也在日本留过学，粗通蒙、汉、日三种語言文字，粗会照像艺术。汪容昌一有貢亲王的提携，二有金玉斋的协助，一生享受了奢侈腐化的生活。

从“漠南景新社”說起

“漠南景新社”是汪容昌个人的家庭照像館，不作門市生意，有时候給同乡亲友們照相，經常专給駐京的各蒙古王公府照相，并多照北京的风景古迹，卖给王公府或外国人。又照些雍和宫的多种佛像以及故宮內佛像宮殿等，洗成六寸照片，背面印成明信片，在雍和宮天王殿內托人設攤代為出售。雍和宮的麦达喇嘛佛像是三丈多高的立体，在三层樓的当中一間隔成三段，怎么也照不成全身。北京的好几家照相館，均未能照成全身。外国人也沒有照成。但汪容昌却把

这个佛像的全身照出来了，因而出了名，照相业务发达一时，这些像片多数被外国人买去。他又以“漠南景新社”的名义，石印过蒙汉合璧教科书出售，想进一步用铅字活版印，就计划创造蒙文铅字，先用照相缩小刻铅皮字，试刻了一份黄杨木的字，但未成功。嗣重新描写好美观形体的正楷字，用照相缩小，备刻二号和三号铅印规格的铅皮字，但笔划粗细又未能配合。以后去天津数次，虽刻成铅皮字作了铜模，铸出字来，仍有配合不当之处。费事历年之久，仍感长短都不合格，屡次修改和作废。后来他亲自动手雕刻成一些，给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印送一盒名片，贡王看后，称赞表扬曰：“有志者事竟成，双手万能的雕刻家。”并奖赏新人力车一辆以资鼓励。一九二四年蒙文铅字印刷工作，有了一定的成就。

依他所好的式样来创制的蒙文铅字铜模，并非空前的，据我所知，清光宣之际，蒙人扎拉丰阿纠合一些人在北京设蒙藏编辑局，铸造蒙文铅字，翻印书籍，旋以事阻未果。一九一三年，黄序东铸成蒙文铅字，并呈准农商部备案，专利印刷书报，适库伦都护使征求边才，黄被罗致而去，印刷事业亦未果行。一九一三年，俄国人在哈埠出版蒙文铅印杂志，一九一九年，日本人在东三省也出版过蒙文铅印日报。不过他认为外地有的蒙文铅字不好看，形式上抽搭不展，萎缩不清秀，粗糙而起毛，不精细相称，视之昏沉不醒目，阅者厌倦不爱看。所以他才决心自行另样创造铅字，成功后，

呈請立案，当时北京政府发給奖状，不征捐稅。同时国务院农商部发給專利三十年的專利証书。

蒙文书社的成立

一九二四年春季汪睿昌开始成立蒙文书社印刷厂，因所需成本很大，自有資金有限，不得不向外招股，在京內蒙古人士如貢桑諾尔布、吳恩和、金永昌、张文、楊时芳、刘丕元等，都是参众两院的議員，都入了股，最多者不超过一千元，最少者也在六、七百元，共計約收到股金五千元左右，仅能买必要的三架机器，若要买多量的鑄字鉛而价款相差尚远，只好一方面做，一方面购置。他又繼續創造藏文銅模和鉛字，一九二五年，班禪駐在北京时，段祺瑞給班禪創設印經处，就以蒙文书社的蒙藏文鉛字来印，印經处也設于蒙文书社内。彼时蒙文书社在旧鼓楼大街张旺胡同九号，因靠近北城根，又是个偏僻胡同，为了開設在明显地方，就找到北池子五十七号公产房院一所专給紫禁城发电的电厂旧址，旧鍋炉放在院内一角，内有房屋十四間，四十左右人的工厂房子不够用，又新盖了六大間厂房，印刷书报与蒙藏文經卷。此外还印各色各样大小不同的班禪額尔德尼的照片，有彩色照相和銅板照相两种，約数万张，叩拜班禪的蒙古人买去的很多。以后政治变迁，人事更易，班禪也离开北京了，张作霖駐北京任大元帅时对印經处沒有重視，而官产处要收回公

产房院。张大元帅部下有权有势的文武官员中，如卫戍司令和警察总监等，都是汪睿昌在日本时的同学，他和这些人来往，请了几桌酒席应酬以后，官产处也不来催索房子了。后来这所房子还变成了他的私产，自一九二五年安稳地住到一九五〇年以后国家给了金淑贞约两万元代价收归公有。

一九三〇年秋季，因南京政府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同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等三个机关都需要蒙藏文铅印，遂由吴鹤龄给联络会商，三个单位出迁移费若干，把蒙文书社迁往南京。到京后厂址设在教育部后门外沙帽巷二十二号，因领迁移费过多，重新购置机器，获得一笔很大的资金，印刷业务很发达，生意特别兴隆了一二年。但是他仍然装穷道苦，书社自行出版书籍，停止印刷，完全专给三单位印刷书刊，不断增加夜工，工人初一十五两天的休假都被停止。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的八艘军舰到南京开炮后，工厂即行停工，北方的工徒被遣散回家后，厂内只留下一种蒙文铅字。当时我在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任秘书，实际上却在蒙文书社为汪睿昌出力，给他排蒙文铅字，专给教育部印蒙文教科书。一九三四年夏，他去伪满洲国投靠日寇后，蒙文书社就结束了。

一九三六年，他计划在伪满兴安军官学校印刷蒙文讲义，由北京把蒙文铜模、排字架、手摇铸字机、电动印刷机等运到乌兰浩特。但筹备将近一年，因经费问题未能开办。后恩和布林（吴恩和）到王爷庙同他接洽，将此项印刷工具交给

原蒙文书社的技术工人瑪希巴雅尔携带运往伪蒙疆政府所在地区使用。一九三七年四月間运到呼和浩特市，为《蒙疆日报》排印《蒙文周报》。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将蒙文鉛字又运到张家口《蒙疆新聞》社，繼續出版《蒙文周报》。

蒙文书社出版的书籍

蒙文书社出版的书籍，最多能印五百份，少的印数二百至三百本，版工細致，工本費大，质量虽好，印数甚少。不过汪睿昌在蒙文书社編譯出版的許多文献，对蒙汉两族的文化交流起了一定的有利作用。

汪睿昌翻譯的古典文学譯稿約数种，沒有出版，他死后，其妻金淑貞把这些书稿都当作废紙，剩下的书作为废书报，卖给北京隆福寺街文奎堂书鋪。

蒙文书社出版的书籍，三分之一被外国人买去，日本人买去的都是教材类如教科书、拼音法、字典、辞典、蒙古語会話等。因为施祥庭在日本东京外国語学校任蒙古語文教授，把《蒙古語会話》一书，重印五百本。法国人在北京西什庫天主教堂的一位通晓蒙文蒙語的法国神甫住宿处，每次按目录买去全部书籍一份或两份，連《塔尔巴經》都不例外，我就送去过十余次全套出版的书籍。

近五十年来，已經出版过的蒙文鉛字印刷品中，形体类型各不相同的蒙文鉛字約有十余种，各种多样的蒙文鉛字中，

我认为蒙文书社出版的如蒙译《辽史》、《金史》等书内二、三号蒙文铅字印成品，比一般的蒙文铅字都好。蒙文书社的蒙文铅字连接处结构相称，衔接合缝，字身全部体格大小长短规格相称，形式不同的字头，稍微有点区别处，明显了然，制造精细，因而印成品清秀美观，阅读时不费目力。

汪睿昌剥削工人发财致富

蒙文书社内设经理室、营业室、制铜模和鑄字房、排字作版房、印刷机器房、装订切纸房、书库和照相室。经理汪睿昌兼总编辑、翻译、校勘、核阅。特约翻译伊德钦、吴子兴，译过辽、金二史，另有稿费报酬。又请一位察哈尔的退休总管多成德，满译蒙约一年。副经理张静轩，担任对外交际和联系其他印刷厂，请汉民技术人员写毛笔汉字书签等工作。我任营业主任并担任司账、校对、售书和管理四个厂房工作，估价议价，有时跑外买进纸张材料等，兼排蒙藏文铅字，无所不作。

学徒工人每人每月发给零用钱两元至五元不等，技术工人每人工资由三十元至四十元，工作人员共计三十余人，最多到过四十人左右，徒工们大多数是蒙民，赛音卜合（汉名白子兴）、玛希巴雅尔（汉名白子贤）、吴勒吉图（汉名吴俊明），这三人现在呼市工作，其他在记忆中的还有嘎日迪（汉名庞凤鸣）、汪振鐸、吴俊峰、白子连、金子衡、胡子

升、苏达那木扎木苏等。

工人每天每人只吃一碗清水菜湯下飯。一年三百六十天，主食决不改样，工人要求吃一次面条改換口味是不可能的。金淑貞說，一改样就吃得更多，浪費面。到了发工資时迟迟不发，金淑貞說叫鈔票生小崽子舍不得出錢，拖到第三天給了华威銀行的鈔票，正在休假日，工人們把錢領走后，晚間回来，因鈔票打九折，全都退回来了。在某年的一个寒冷天气，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徒弟，因一碗菜湯不够，向厨房再要一碗开水喝，厨子还說：“这是老爷太太的开水，把大水壺抬来喝吧。”汪睿昌对工人的压榨剝削是十分残酷的，此文不作詳述了。

(內蒙古文史研究館供稿)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五辑

作者 =

页数 = 2 1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